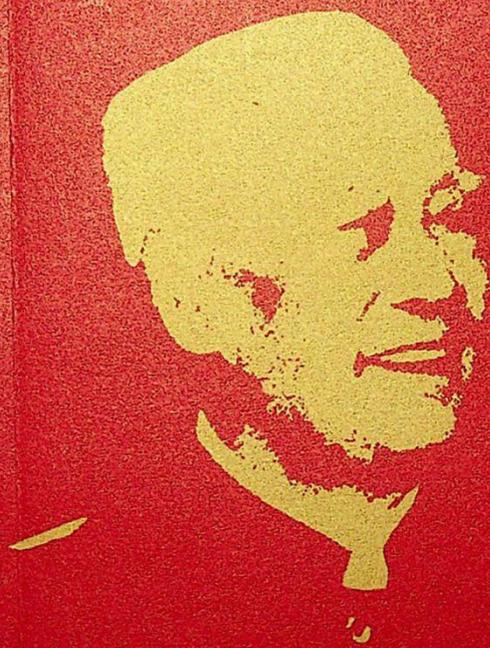


危熱回忆

张邦英 著



◆ 中国社会出版社

片断回忆

张邦英 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片 段 回 忆

张邦英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邦英，生于1910年，陕西耀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安国立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党代表，红26军三团二连政治指导员，中共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游击队总政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关中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延属地委书记，三五九旅政委，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副主任、四部主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书记，晋绥联防军绥德军分区政委、代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中共陕南委员会第一书记，陕南军区及十九军第一政委，陕南行署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民政部副部长。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第一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常委，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

前 言

盛世修志，资治育人，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一些地区组织和同志的建议与促使下，我陆续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是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主要是革命战争年代亲身经历或熟知革命斗争中的人和事。尽管自己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但由于缺乏撰写专著的经验 and 受水平的限制，这些文章我个人感到很难令人满意。而有许多知情的同志，则再三要我将其汇集成册，公开出版，并认为这对多方想了解革命历史的同志和教育后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当然，在撰写这些回忆录时，我总算花费了一定的时间，用了一定的精力。这些文章后经郑广智、郭志文、张时祥等同志的整理、修改，编辑成册，名曰《片断回忆》，并在中共陕西省铜川市委和中共耀县县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于1992年出版。现在，经姜鸿升等同志帮助，我又对书中内容进行了增删，在民政部、民政部老干局及中国社会出版社支持下再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里应当指出，由于斗转星移，时隔久远，在回忆文稿中，难免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请批评指正。

张邦英

2007年8月

目 录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1)
西安学生运动与加入共产党·····	(11)
耀县党组织与进行武装斗争·····	(23)
耀县起义与红二十六军恢复发展·····	(37)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立·····	(57)
绥德地区一段工作回忆·····	(73)
回顾解放陕南的斗争·····	(81)
新疆工作回忆·····	(89)
早期边区工会工作回忆·····	(113)
难忘的一次行军宿营·····	(118)
中央党校学习与成立陕甘省·····	(123)
回忆中央派代表去神府特区·····	(131)
回忆王泰吉同志·····	(135)
刘志丹同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42)
缅怀欧阳钦同志二三事·····	(151)
回忆老战友龚逢春同志·····	(157)
难忘的黄罗斌战友·····	(163)
怀念拓夫老战友·····	(167)
深切怀念蔡子伟同志·····	(170)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176)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是如何从青年时代参加到革命行列的呢？回想起来，这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有其个人的志向和一定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的。

一

1910年，我出生在陕西省耀县泥阳堡村的一个农民大家庭里。该村位于县城以北五里高塬区域的一个塬边上，方圆面积不大，地势却很险要，东、西、南三面环沟，过去筑有内外城墙。据说这里曾是晋朝县治的所在地。县志上有“汉祲栩、晋泥阳、唐华、宋耀”的记载。离解放十多年前，全村仅有六七十户人家，只有一家卖小杂货的货郎是个外来户，其余都是姓张的，分为四大户，共敬一个祖先。村里人相互间多称兄道弟，呼叔唤侄，带有若干封建家族色彩。各家都靠种地和利用农闲季节赶上自家的牲畜驮运粮、煤、瓷器等为生。好些人家终日勤劳，而不得温饱。

我父亲兄弟四人。四叔父是个很用心的人，在县城内与别人合伙开了个“振兴湧”杂货铺，但生意清淡，很不景气，有时稍有收益，有时还得赔钱，只能勉强维持。由于那时官府的捐税很重，兵灾不断，铺子常常关门。因此，四叔父曾一度回家务农或外出赶脚。大伯父和二伯父都在家务农。二伯父是个能干的庄稼人，主管家事，家教很严。我父亲排行第三，人称张老三，官名张纪周，是个勤劳淳厚的农民。一年大部分时间在地里耕作，农闲季节，就和本村农民一块起早贪黑地赶着牲畜到耀县附近的铜川、宜君、富平、三原和甘肃省的正宁等地驮运粮、煤、瓷器等赚点钱。我的那些伯叔母也都是能织会纺、勤俭持家的劳动妇女。

我们叔伯兄弟小时也是四人，一个比一个大一岁，从小就经常跟着大人或单独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家务，如从井里绞水、割草、喂牲畜、锄地是常事，到了严冬季节寒风凛冽，还常穿着空心棉袄、棉

裤去大路和野外拾粪，或上山坡打些烧炕的柴禾，基本上没空闲玩耍，就连盛夏酷暑季节到河里洗洗身子，凉快一下，往往也挨二伯父的训斥。那时，我们全家共有二十多口人，平均每人有六亩旱地（是全县人口拥有土地的平均数）和够用的耕畜、农具。总的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随着家庭人口逐渐增加，居住拥挤，便设法另盖了一院房子，才勉强够住。村里及邻村人们一度把我家看成是殷实之家，而实际是户大家虚，经常在兵荒马乱与官府要粮、要款、要税的催逼下过日子。

我三岁左右，母亲就去世了。在父亲特别是伯母、叔母们的照顾下，自幼一面劳动，一面读书。有时父亲带我到离本村四五里路的雷家堡我外祖母家去过。那时外祖母已七十多岁高龄，一人独居。虽有一叔伯舅过继给她，但不在一起生活。她老人家对我非常喜爱，常把做得好吃的东西拿来给我，总担心我这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受到什么委屈或被野兽伤害。我一去她家，她就留我多住些日子，不愿让我回去，我也常帮她抬水，照看家门边的庄稼，跟着叔伯舅和表兄们到山坡里为她打柴，直到她去世后，我才不去了。这时，我也长大，到耀县县城上了高小。

当时，我家叔伯兄弟好几个，在那时的家庭和社会条件下，他们一般只读了几年小学，便辍学务农了。只有我，既上了高小，以后又进了中学。这除因我没有了母亲和比别的兄弟读书成绩好些外，主要还是父辈们受旧社会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寄予很大希望家里能有个读书人。这样，既可以荣光耀祖，给家里“撑门面”，又可不受别人的欺侮。记得二伯母常给我们兄弟剃头，每剃一次，头上总会有一两处破伤，疼得直缩脖子，而她看到我头上长着两个旋，很喜欢，常对我说：“双旋滚过鸡蛋，长大做个州县。”因此，家里花费了很大力气来供我上学，我自己也尽量刻苦学习，省吃俭用，勉强上完了中学，总算没有辜负家人对我的期望。此后，随着家庭人口不断增加，几位叔、伯父相继去世，家里负担加重，而我们几个兄弟也能独立劳动了，于是也就逐渐分家了。

这就是我幼年时，家庭所给我的教育和留下的难忘印象。

二

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耳闻目睹当地老百姓深受封建地主、军阀、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压迫和蹂躏，十室九空，民不聊生，终年过着灾难深重的生活。

那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地方上大小军阀很多，经常听到或看到的有刘镇华、郭坚、田逸民、井岳秀、冯子明、曹俊甫、高进娃、芦占魁、胡老三等人。他们招兵买马，购买枪支、弹药，争夺地盘，发展个人独霸一方的势力。随时随地征定粮饷，到处拉夫拉差，强占民房、学校，打骂百姓，为非作歹。我小时就曾几次吆着家里的牲畜支差到数十里以外的地方。老百姓经常提心吊胆，惶恐不安。许多人一听说“粮子”（指吃粮当兵的）来了，或者看见大路上过“粮子”，便急忙挟上包袱，携儿带女，赶着牲口，跑到亲戚家或较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等那些队伍过完或驻定后，觉得没有多大的危险了，才敢回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芦占魁的队伍，从绥远开来耀县一带，他们都是骑兵，有些当官的一人有两匹马，人人头上留着长辫子，老百姓称他们是“长髦根”，全是些乌合之众。他们强占民房、商号、学校，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这时我仅有七八岁，跟随家里大人逃到别村亲戚家避难。家里只留两三个大人看家。有一天，我父亲曾被他们剥去上身的衣服，吊在房梁上，用点燃的一束香火头在脊背上烫，逼要钱、财，父亲痛得实难忍受，无奈只好说出了暗藏在一个地方仅有的一点点妇女们走亲戚时穿戴的衣服和首饰，这才罢休。当时的土匪也很多，往往是兵匪不分或明兵暗匪，他们乘机拦路打劫，抢夺民财，常常搞得路断人稀。有许多农民在赶牲畜出外驮运东西时，往往被他们连东西带牲畜一起抢走，空手而归。此种遭遇我家就有过两次。

由于军阀混战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加在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非常沉重，各种捐、税、粮、款多如牛毛。随时可看到官府的差役拿着鞭杆和绳子，在乡保人员的带领、协助下，逐村逐户地催粮要款。

如有交不出的，便遭到他们的殴打、捆绑，逼得人藏、鸡飞、狗跳墙。豪绅地主的高租、高利贷剥削也很残酷，凡借了他钱、粮的，一般都是驴打滚的利息。他们多是逢收割季节或年关要账，这时穷人就愁上加愁。一些还不起租、债的贫苦农民，只好四处求借，春季借一斗，秋后还一斗半，真可谓是：“借着吃，打着还，跟着碌碡过个年。”灾荒之年，更是苦不堪言，缺吃少衣，揭借无门，只好以糠麸、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即白粘土）充饥。像我们那样较好的家庭也不例外。好些人家走投无路，沿门乞讨，被迫流落他乡，以致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时的洋人（指外国列强、帝国主义）趁我国政治腐败、国弱民穷、军阀混战的机会，不断对我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侵略，企图瓜分我国大好河山。我小时就看到洋人在本县传教。他们为掠夺延长石油，强制在沿途老百姓耕地里栽电线杆，引起群众的不满。

记得 1921 年我上初小四年级时，一次老师派我去县城第一高小取宣传品，在街上看见高小的教员、学生们正在游行、演讲、贴标语、散传单。一所天主教堂的门前插着一面旗子，醒目地写着：“救我祖国，同胞一心。亡国条件，死不承认。”由此我才知道英、美、日、德等国在“太平洋会议”上提出各国在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共管主张。我上高小以后，又从教史、地老师的讲课中，得知以往外国人杀我同胞，侵占我土地，逼我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同时还听到一些在上海、北京、西安上大学的学生回来说，北京东交民巷是外国的租界地，巡捕常不准中国人通行，上海黄浦滩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以及洋人如何用炮舰在上海吴淞口、武汉等地威胁我国等等。

耳濡目染社会的黑暗现象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满和仇恨则油然而生。因当时年幼，仅知道要救国救民，而不懂得如何去作。尽管在国共合作的 1925 年，我从高小毕业时，本县已经有了“三民主义”军官学校，也曾和同学们一

起列队参加了在本县城隍庙举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大会，还听了国民军杨虎城慷慨激昂的讲话，但仍不知道怎样救国救民。

三

1925年夏我高小毕业后，和一位同学去西安考中学。乡下人初次到省城西安，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觉得处处都很新鲜。给我的首先一个印象就是西安巍巍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箭楼，还有那一辆辆马拉轿车在青石条铺成的大街上奔跑和发出一连串震耳的咯唧唧响声。

我俩住在红府街耀县会馆里。除准备考学外，还抽时间游览了城内一些比较繁华的街道和名胜古迹。看了南院门、城隍庙。东、西大街两旁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店和摊贩；众多的穿着各色各样服装的人们（也有外国人）在街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城南耸立的大、小雁塔，城中心雄伟的钟鼓楼和城内镌刻着历代名人字迹的碑林，以及一幢幢洋房、学校和公园，使我目不暇接。尽管那时的西安还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东大街还是土路，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却大开了我的眼界，增长了社会见识。对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产生了爱慕感，从而也增强了热爱祖国的观念。

当时在考学校上，似乎没费多大劲，便考取了西安私立中学。该校位于西安东关，是陕西所谓的“六君子”（刘养伯、苏敏生、王敏功、孙仁玉、渊龙文、于君唐）主办的，在西安教育界颇有点名气，就学的学生很多。而在办学的思想方面是比较守旧的，禁止学生参加校外群众性的政治活动。不像有些省立学校先进，可以闹学潮。这时西安处于学生驱吴（吴新田）运动后数月，各校都平平静静。我是带着好好读书的想法考进这所学校的。到校后所读的书，上的课，都是按学校规定的内容，老师讲什么，就学什么。我也未能意识到找些课外的进步书籍去看，接受革命思想。就这样在学校度过了一个多学期。

1926年4月间，西安发生了战争。曾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去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刘镇华，率所部镇嵩军由河南经潼关入陕，围攻西安，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当时正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之际，

在陕西的国民革命军二、三军李虎臣、杨虎城在陕西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下，联合起来据守西安，被人们誉之为“二虎守长安”。在二虎守军奋力抵抗和城内各界人民的帮助下，坚守了八个月之久。在这次围城中饿死了好几万人。直到 11 月，在五原誓师的冯玉祥国民联军经甘肃、宁夏开抵陕西后，才解了西安之围。

四

当刘镇华军队围城之初，我正在私立中学就学，西安当局为防止发生久围后城内吃粮等困难，动员家住外地的学生和一部分市民向外疏散。于是，我和本县一位同学，在一天上午开城放人时，不顾生命危险，冒着炮火，出了北城门，急速向三原方向奔去。一路上汗水涔涔，也顾不上擦。到离城四十里的草滩镇渡过了渭河，才松了一口气。到了泾河边时，遇到驻扎耀县、三原的杨虎城部队正向西安开拔。他们穿的灰军装，戴的镶有红圈的大沿帽，其中一部分部队在泾河北岸休息等船渡河。我当时看到一位支差的农民手里拿着个旱烟袋，走近一个正在抽纸烟的士兵面前说：“老总，对个火？”可那个士兵一听到对火，怒气冲冲，扬手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嘴里还骂：“他妈的，对什么火？！”那位农民被打得鼻口出血。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旧军队中有许多官兵唯恐在火线上丧命，一听说“对火”，认为不吉利，所以火冒三丈。我所遇见的这些情形，对我这个有点爱国心的青年人震动很大，使我对军阀非常愤恨，对人民遭受战争的苦难十分同情。

我回到家不多时，本县有个叫刘峨山的，曾在三原师范读书，由于受民主革命和国共合作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他于是年秋，被派在耀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和一部分进步青年进行反对苛捐杂税和军阀官僚的斗争。我从内心里拥护，认为这一行动是符合农民的要求和愿望的，是救国救民的好办法，从而就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曾在县立第一高小同部分农民代表和少数进步青年一起开了会，又到了乡村向农民进行抗粮、抗款和反对军阀的宣传鼓动，唤起农民群众的工作。还在一次东区召开的农民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心情格外激动，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之后，又和本

村的许多农民一起前往官府设在本村大路上的税卡，这时收税的人员已经不见了，遂砸了税卡，撕了税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农民群众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西安学生运动与加入共产党

我于 1927 年参加西安学生运动，是我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理想和人生观的重要时刻。从此以后，便以党为家，和许多同志一起共同战斗，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迎来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一

当 1926 年西安解围以后，我于次年初又回到了西安私立中学继续读书。这时，正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全国处于革命高潮时期。在中共陕西党组织的推动下，西安的政治形势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革命新气象。各界人民群众反帝、反军阀、反官僚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反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书刊广为传播，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的著作和《共产主义 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向导》等一类小册子，都可以买到、看到。这对许多人，特别对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思想影响很大。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阅读了一些自己能够读得懂的也比较感兴趣的革命书籍和进步的刊物，使自己初步知道一点革命道理。

这时，进驻西安的冯玉祥国民联军，在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不仅装备精良（武器多是俄式水连珠步枪、绿皮大炮和机关枪），而且有苏联的赛夫林、乌斯曼诺夫、希尔科夫等人做军事顾问，还有中共党员刘伯坚任该部政治部主任，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政治教育都很出色。如军事训练上，劈刀、刺枪、打拳、翻杠架、跳木马等都很严格；政治教育上，常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革命歌曲；公买公卖，纪律严明，不骚扰百姓。冯玉祥本人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表，经常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行动、言谈也比较随和。这和我过去所见到的其他军队迥然不同，他们很像一支国民革命军，很受老百姓的拥护，对推进西安等地的国民革命和我个人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西安的学生运动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发展起来。广大青年学生不仅反帝、反军阀、反官僚，并积极反对旧文化、旧教育，提倡读进步书刊，读书勿忘革命。号召参加进步团体，鼓励到社会上去进行革命宣传。许多学校经常召开各种形式的讲演会、辩论会，出墙报，演新剧，提高了学生的觉悟。许多学生纷纷加入学生会，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使西安学联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我所在的私立中学许多学生，就是这样做的。哄走了两个教员，一个是教社会进化课的田杰生，思想非常反动，他用旧的唯心观解释人是如何进化的，以后成了国民党反共能手。另一个是教拼音字母课的高培之，教课中宣扬“君子群而不党”，引起我们班里进步学生的反对，在下面起哄，只好下台，以后不敢再来学校了。我也就是在积极参加各种学运的活动中，于1927年春经由渭阳中学调来私立中学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张汝慎同学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使我懂得了社会的黑暗是由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掠夺造成的。要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坚决推翻旧社会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打倒帝国主义，使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屋子住，为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从而确立了自己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入团不多日，又被张汝慎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指我担任私立中学的区分部书记。实则空有其名，目的在于掩护进行团的工作，更好地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

此后，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和其他同志一起，多次动员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界在国民党省党部、易俗社露天剧场、莲花池公园、皇城等处举行的“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和请愿、游行示威。这时，在私立中学的党、团员，能记起的有张汝慎、陈汝舟、薛明岗、李芝川、曹雯和我等。因为这些同志经常不断出面组织学生的革命活动，曾遭到对学运不满的或有反动思想的一些学生的反对。可他们又不敢公开地进行反对。而在一天晚上，把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写在一大张纸上，趁夜深人静时，贴在一排学生宿舍的墙上，辱

骂我们是“过激分子”、“暴徒分子”、“赤化分子”、“共匪”等。我们不但没有被他们的谩骂、恐吓所吓倒，反而更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

在西安的学生运动中，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起了很大作用。这两所院校都是 1927 年二三月间，在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下，由驻陕国民联军总司令于佑任、副总司令邓宝珊等人创办的。中山学院重点培训政治和群众运动人才，并设有妇女运动班，院长刘含初、副院长李子洲都是共产党员，还设有苏联顾问。中山军事学校重点培养军事人才，校长史可轩、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小平，也都是共产党员。学生也多是进步青年，其中有许多党、团员，学生的生活、学习和学运工作搞得很活跃。省立一中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运搞得也很积极。联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陕甘区共青团负责人吴化子，常到这些学校和其他进步团体作讲演，很受大家的欢迎。

二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了国民革命。西安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在陕甘区党、团组织的领导及于佑任等国民党正义人士的支持下，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蒋斗争。陕西学联发出了声讨蒋介石的通电，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五一”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大会，并且把西安钟鼓楼染成了红色，满城（也叫皇城，是清代时满族人居住的地方）改为红城，将整个五月称为“红色五月”，以表示西安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决心。

在此期间，驻西北的冯玉祥国民联军仍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出师河南，直接参加北伐，与北进的国民革命军共同讨伐直系军阀，受到了陕西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5 月 5 日，他的部队东出潼关，迅速克复了洛阳、郑州、开封等地，与北伐军会师中原。记得还在冯军出师的前半月，西安的十几个学校的学生和其他群众团体数万人，在莲花池公园举行了拥护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大会。会后组织了游行，

并到国民联军驻陕司令部请愿。西安各界还组织了前敌宣传慰劳队（慰劳队中还有妇女界的王淑贞等人），对将士们鼓舞很大。

不多时，从北平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在领导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中，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残酷绞死的消息，激起了西安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悲愤。正在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西安各界人民群众，得此噩耗后，更加义愤，于5月16日，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国民党驻陕联军特别党部，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了追悼李大钊大会。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于佑任首先讲了话。记得他一开头讲：“同志们，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帝国主义刽子手张作霖4月28日在北平绞杀了李大钊等二十多位同志……”他那沉痛而又愤慨的讲话，使我非常震惊，觉得自己的头皮一阵阵的发紧，好像头发都竖了起来，愤恨帝国主义、军阀对革命者竟如此残忍！

西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与学生运动，一直持续到1927年7月间。由于冯玉祥在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倒向了蒋介石、汪精卫一边，开始反共，西安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这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期间，我在党、团组织的动员下到中山学院“暑期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同我们一起学习的多是西安各中学的青年党、团员。当时学院的情况，随着西安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教育的内容和以前大不一样，主要上的是军事方面的课，如单人教练和班、排、连教练很多，一切行动军事化。吃饭时间只给十分钟，哨子声一响，不管吃完没吃完，都得摆下碗筷。政治课几乎没有。院长刘含初等共产党的负责人也不大公开露面了。其他许多学校的学生会和各界群众团体的活动也停了下来，军队等许多组织开始进行“清党”。浓重的白色恐怖阴云笼罩了西安。

记得一次在红城召开的（有许多军人也参加了）群众大会上，冯玉祥的部下国民联军总参谋长石敬亭在讲话中宣布了三条反共原则，大意是：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内作为顾问，不准许

兼任其他职务；共产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违反“三民主义”之宣传。从此以后，西安及陕西其他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在冯玉祥军队的支持下，向革命阵地展开了进攻，先后逮捕、关押了许多党、团员，杀害了党在陕西地区的重要负责人史可轩、刘含初等同志，使西安以及陕西其他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他们这种反革命行径以及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行为，激起了许多进步和同情革命的人士的强烈不满。当时，陕西省立第一中学的国文教员、浪漫诗人柯仲平，在他出的一本小册子里有“人头贱卖了，人头贱卖了，人头贱过冬瓜价”的悲愤之词。

二

在此白色恐怖形势下，西安党、团组织的全部工作，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党的支部、小组等会议，多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或天黑的时候召开。有时干脆几个人边走边谈，也算开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这时党、团内部有一部分人动摇了，有的不干了，有的消极了，有的自动脱离了组织，而绝大多数同志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依然坚持斗争，继续进行党、团的工作。许多学校的党、团组织在上级党的指示下改变了斗争策略和方法，把合法的斗争与地下秘密斗争结合起来，采取办墙报、搞读书会等形式联系群众。每逢革命纪念日或召开群众性大会时，总要设法利用夜晚等机会去贴标语、散传单、挂红旗等秘密活动，扩大革命的影响。所谓挂红旗，就是用印有镰刀、斧头的红纸做成小旗子，在旗柄一端拴条细绳子，另一端系块小石头，走到有电线的地方，把它扔上去，使旗子悬在空中。我们民立中学的同学就常常进行这样的秘密活动。记得石敬亭在红城那次讲话的大会上，我们几个党、团员身上带着组织上印好的传单，趁机撒在人群中。印象最深的是在自己作学校墙报插画栏编辑时，常用灰色比喻的形式在墙报上写些鼓励大家的稿子，说明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要拿起青年人的勇气，努力奋斗，继续前进。为此，曾引起了学校的注意。当时的教务主任于君唐出于同情革命和爱护我们之心，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最近外面的情况不好，你要多加

小心，不要再那样写了，以免遭到不幸。”再就是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我和曹雯一起晚上出去贴油印的小标语、撒小传单。为了不被人发现，十点以后才出发，哪知警察早有了戒备。当我们边走边贴传单，到了东关门内一条大街时，道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突然迎面出现两名警察冲着我们喝道：“干啥的？”我俩顺口说：“是后面崇道中学的学生，肚子饿了，去鸡市馆买饭吃。”警察见到我俩可疑，又喝道：“这时候还有卖饭的？！举起手来！”于是，走在我前面的曹雯张开双手在身上拍了一下说：“什么也没有。”警察信以为真，遂接着喝道：“快回去！”当时吓得我俩心直跳，就怕警察搜身。因为还有些没贴完的标语传单就在我的衣袋里。

西安的政治形势恶化后，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继续进行反帝革命斗争，扩大革命影响，于1927年秋发动、组织、领导西安市各学校举行了一次“非基运动”。许多学生都参加了，手执各色标语旗子，分几路在大街上进行游行示威、呼口号，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经济侵略。同时由各学校派出代表，我当时为民立中学的领队人又是学生的代表，到教育厅请愿，受到杨明轩厅长的接见。然后列队向北大街体育场集中，准备召开大会。会前搭了讲台。当各校的学生开始进入会场时，被西安当局已事先调动好的武装警察所包围，不准许集会。当学生代表与警方交涉无效后，游行队伍遂被驱散。这次游行、集会中有几位同志被逮捕。从此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西安几乎再没有举行过什么群众集会。

我就是在西安的白色恐怖下，于这年8月间在东关女子尊德中学转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是在一天的傍晚，东关地区的几个中学和小学的十三四名共青团员相继来到尊德中学的指定地点等候，待天色完全黑下来后，我们被领进一个室内，排列成前后两行，忽然灯一亮，看到对面墙的中间悬挂着马克思的像，像的下面贴着党员誓词，给人以非常庄严肃穆的感觉。这时，由站在最前面的一位同志带领大家举起右手宣誓。大意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每个党员要遵守党铁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不怕流血牺牲，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通过这次入党宣誓，给我莫大鼓舞，增加了我进行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成为我以后在革命进程中，不避艰险、坚决斗争的力量所在，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

四

在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记得陕西党出版过一个秘密油印刊物——《红旗》。这在当时革命遭受挫折、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对同志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从它短短的几句发刊词可以看出，非常生动，具有很大的战斗性。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是：“霹雳一声，红旗呱呱坠地，指引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奋斗！”与此同时，在陕西党内的文件和张贴的标语、口号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印象深刻的是“以赤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还在一个文件上，登了准备在西安城内举行暴动的计划，并画了个行动路线图，标出军械库、电台和一些夺取得重要目标的位置。这显然是根本办不到的事，而对我这一希望革命早日胜利的幼稚党员来说，既惊讶又高兴。

1927年冬，西安革命处于低潮，学生运动全部停止，民立中学的两个前任党支部书记张汝慎、李芝川先后调去做其他工作，由我接任了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时，虽然党的组织转入了秘密状态，西安等地有些党员遭到逮捕、屠杀，而我们民中的党组织依然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于1928年继续发展了高禄瑞等同志入党。上边同我们经常接头的先是程士城，以后是马云藩（后来叛变了）。当渭华暴动时，上级决定将民立中学党支部改为特别支部，承担东路秘密交通的任务，主要是把上边的文件及时送往临潼县，再经临潼县转送到渭华前线。我曾亲自送了一次文件。西安距临潼县城六十华里，当时沿途敌人戒备很严。我特意穿上“八大块”的学生装，戴上学生帽，把很厚一摞子油印文件用纸包了好几层，然后再用一块大手帕包起来，像课本一样提着走。一路上边走边想，考虑着进县城时怎样对付卫兵的盘查和被逮捕的思想准备。由于我走得很急，不知不觉地走了大半天。这时天色将黑，猛抬头一望，骊山像一片黑云，前面便是临潼城西门，两

旁站着几个卫兵，我心里有点紧张，唯恐文件被查获，只好硬着头皮不慌不忙地向城门走去。没想到他们以为我是回家的学生，连问也没问就进了城。我这才放下了心，迅速地按指定地点和规定的暗号找到联系的人，随手把文件交给了他。接着，他对我说：“这里情况不好，昨天城里已发生捕人的事，今晚说不定要查店，在城门未关前就出城为好。”因此我只好连夜返回。由于来回跑了一百多里路，筋疲力尽，脚上也打了泡。回到学校时，已快天明了。这时校门还关着，我便利用门旁的一棵树攀登翻墙进去，不料被人听见。第二天，学校追问此事，结果在看校门人员的掩盖下，马马虎虎地过去了。待渭华暴动结束后，始知同我们一起在私立中学学习、工作的张汝慎同志，也在参加这次暴动中不幸牺牲了。他那种积极的革命精神，我一直是非常怀念的。

1928年底，我和本县曹雯一同从私立中学毕业。当时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来才知道），党组织用秘信方法把我们介绍到本县一位来自渭南县参加过渭华暴动的冯鸿儒同志那里，接上党的关系。此后，便在耀县青年学生、教职员中从事革命活动。

耀县党组织与进行武装斗争①

耀县地处陕西渭河以北、桥山山脉的南端，是八百里秦川与陕北接壤的一个地方，是通往陕北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曾有这样的说法：“进可以取泾原，退可以入北山。”过去，耀县南门外专门修有牌楼，上面赫然写了四个大字“北山锁钥”，显示了这个地区的特征。这里的老百姓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另外不少的农民喂养大牲畜，有骡子、驴，利用农闲给商人驮脚或贩卖粮食、煤炭、瓷器，以补充生活的不足。那时，老百姓长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和反动军阀的战争浩劫下，兵荒马乱，市景萧条，民不聊生，生活实在困难。尤其北部山区的老百姓，很多都是佃农，他们在豪绅地主的高租、高利贷残酷剥削和土匪经常的骚扰下，更是苦不堪言。广大的农民群众对豪绅、地主、官府、军阀十分痛恨。

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在南方胜利进行了，革命声势震动很大，在陕西就发生了杨虎城、李虎臣的部队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围攻西安的战争，叫“二虎”守长安。战争是在1926年3月开始，进行了八个月，到10月或11月间，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的帮助下，解了西安的围。这一战争的胜利，不仅打击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南伐北攻的计划，而且配合支持了国民革命军以后的大举北伐，对陕西共产党的发展和许多地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年秋，耀县有个刘峨山，他原来是在三原师范读书，思想比较进步，很可能那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其身份一下说不清楚。他在本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一度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步青年进行抗粮、抗税、抗款、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这时，我已16岁，上了西安国立中学还不到一年，因为刘镇华开始围攻西安，西安当局就动员许多人，特别是没有家的人、学生，离开西安城向外疏散，减轻城市的负担。于是我和在校的一位同乡冒着前线炮火的危险，经过三原回到耀县。

回到耀县不多时，我就积极参加了耀县的农民斗争活动，并参加了在耀县第一高小礼堂召开的农民代表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加的会议。会后，到农村进行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税的斗争。在孝义坊的雷家堡召集的东区农民群众大会上，我第一次登台给农民讲演。大会后，我和本村参加会议的人回到泥阳堡，同愤怒的农民一起将设在我村边官路上的税卡砸了，税旗也扯了，给老百姓出了一口气。从此，耀县有了农协和国民党县党部。以后，在本县教育界等许多人员中逐渐形成新旧两种力量：一种是年轻的，有进步思想的；一种是年老的，有封建落后思想的人。进步的和落后之间，进行明争暗斗。

1927年初，正当第一次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西安革命浪潮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这时我继续去西安国立中学读书，由共产党民中支部书记张汝慎（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牺牲了）先后介绍我和本县的曹雯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又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那个时候是国共合作），名曰在民中作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实则为了掩护进行团的工作。1927年暑假我在党、团组织动员下，住了中山学院暑期军事政治训练班。这个学校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校长刘含初。那时，曹雯回了家没有去住。同年秋，我和曹雯在白色恐怖下一同转入了共产党。一天的晚上，在东关女子尊德中学的一个教室里和其他附近中学的十多个同志，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进行了宣誓。这年冬季，我担任了民中支部书记，曹雯也在这个学校担任过团的支部书记，一起搞学生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的文化教育，参加讲演、游行、散传单、贴标语、挂红旗的活动和斗争。渭华暴动期间，我们民中的支部改为特支，我又任特支书记，担任东路秘密交通，给渭华党组织转送文件。我曾以学生的身份用了将近一天一个晚上的时间给临潼县一个学校交通点送过一次文件。

1928年底，我在国立中学毕业。这时，正是陕西省委、西安市委遭到破坏，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时候。组织上把我和曹雯二人用写密信的办法（用药水写在一本老书空白处），介绍到参加过渭华暴动

在耀县西街一个面房帮助亲戚踏箩的一个同志那里（他是渭南人，叫冯鸿儒，这人现在还活着），我们三人就形成一个党小组。翌年我在一高当教员，曹雯在南街女小当教员，分别在青年群众中进行一般的宣传活动。我担任教学中有三民主义一课，常利用向学生讲三民主义谈些革命的道理，传播一些共产主义的思想，曾引起一些反映。有个教员叫李鸿文，过去在泥阳堡当过我的初小教师，特别关照我，有一次对我讲：“邦英，你要注意，在教课时不要出圈子，以免引起麻烦！”我当时经常接触的除曹雯外，多是一些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和小学教师，有杨再泉、安仁、任浪花、张仲良、刘纪峨，还有刘景山等人，同他们谈论一些当时社会的黑暗真相和青年的出路等问题。就这样，过了八九个月。

1929年秋冬之间，冯鸿儒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不辞而别，使我们失去了党的联系。当时，感到失去了精神依托，苦闷异常。为等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一直等到1930年初春，还不见上级来人，我就下决心出去找关系。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一部分同志转入农村，一部分同志转到国民党的部队，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于是我就毅然放弃了教学，丢下自己的书籍、行李，未给学校打招呼，仅给曹雯说了一下，就到陕西讨逆军中去寻找刘峨山，看他是否同党内某些人有关系。这时冯玉祥已经背叛国民革命，跟蒋介石勾搭起来。陕西一部分地方势力组织讨逆军（即讨冯军），有一定进步作用，负责人是甄寿山、杨万青。当我到了所属驻防三原部队的时候，听说刘峨山已阵亡，还有和他在一起的雷天一在该部当营长，我过去对他也比较熟悉，只好在雷营作客。不多时这一部队开到凤翔，营部驻扎在凤翔师范学校，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个穿便衣的人，从一个教员的房子里出来，这人似乎在西安学生联合会作过工作，其穿着、神态很像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人。于是我马上走进他出来的房子，经细致观察翻文件，确认他是我党地下人员，遂经过他联系接上了组织关系。真是高兴极了。随后党组织决定，让我留在部队里作党的地下营委书记，进行兵运工作。并告诉我，他叫周志学，在部队当

学兵队的队长，并告诉我联系的信号、办法。这个同志后来就在这个部队到甘肃拉兵变时牺牲了。

从此我就在军队中搞兵运工作（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营书记官），积极进行交朋结友，建立发展党的组织，联络人员，准备随时举行兵变。1930年秋至1931年春，先后在陕西凤翔、甘肃驻固原、镇原驻防时，介绍了杨再泉、张仲良加入共产党。张仲良当时在该营一个连当文书上士，杨再泉当时是另一连的司务长。不久，到1931年夏，该部被杨虎城收编，从甘肃经过彬县到了泾阳，张仲良同志要求回家，他对这部队也不满意，我说：“好！你先回去一下。”他在回去时经三原武字区和王屈贤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回去后和在县的杨再泉（先走的）、曹雯、刘林圃取得联系，由他先介绍了陈学鼎入党，后由刘林圃介绍了宋子歧。首先建立了阿姑社支部，以后在野狐坡、城内等建立组织。成立了特支，张仲良任特支书记。

1932年春，正值民国十八年大旱之后，这年也是大旱，苛捐杂税又很重。当时，在上级党号召下有十二三个县发动农民进行反抗斗争。耀县在张仲良和唐天杰等同志的领导下，用农民传羽毛信的办法集合了几千人，进行了一次反苛捐杂税的围城“交农”斗争，烧了县城的西城门。在这次斗争中，张仲良同志被唐子封反动军队以共产党嫌疑关押两个多月，没有搜出什么证据，后在陈学鼎、赵连壁等人活动下具保释放。

我当时仍在部队做兵运工作，发展了党的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联络了两个多排力量，有七十多个人，准备进行兵变。其中有个李森当排长（咸阳人，大革命时在本县做过党的负责人，以后到了十七路军改名梁励生。解放战争时期，该部起义时他起了一定作用），曾两次向组织申请兵变，到当时在陕甘边一带活动的刘志丹、谢子长的红军游击队中去，而组织上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这时我就要求自己去刘、谢部队里工作，不久得到批准。我便于1932年6月间离开杨部，从甘肃天水回到耀县，见了张仲良同志，得知耀县党的工作情况。我即去三原县北城职业学校找了渭北特委，还和习仲勋（那时大概做团

的工作)接了头。随后张仲良和我一同去三原武字区长坳下地窑,参加了一次渭北特委关于发展革命武装等问题的会议,那时已经用短枪进行放哨了。约于同年8月间,在泥阳堡成立了耀县县委,张仲良任书记,我当时主要协同县委一起工作,没有担任具体职务。

1932年秋,我们原来所在的杨虎城下属马青宛部发生内讧,当时雷天一所依靠的那部分势力失败,他就乘机带了七八个人和枪及家眷,潜回他家小王咀村。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想利用过去的关系,把他那几支枪搞来,组织游击队。于一天的傍晚去到他家,不料还未来得及开口谈,就被驻小蚯蚓镇杨虎城的一个连的部队包围,并打伤了一个人,遂把我们一起押到小蚯蚓镇。由于当时刘志丹、谢子长的陕甘游击队曾到三原心武地区活动,因此他们便怀疑我是共产党,审问了好几次。我当时有点害怕,怕的倒不是别的,主要是怕他们去抄我的家,一旦抄出家中存放的党内许多文件,那就糟了。幸亏他们没有这样做,自然我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把我关押了三天两夜,就放了。结果枪也没搞到,反而被关押受审一顿,身上穿的衣服、鞋也被他们换成破的,很狼狈。路上先到张仲良家里,他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了,我说了当时情况,他就连忙给我拿饭吃。当我回到家中时,家中存放的党内文件和我过去积累的一些进步性文稿,却被我父亲烧毁了。他们遂将雷天一解到西安,不久,被任命为耀县民团团总。

就在这个时候,组织上考虑张仲良曾被捕过,不便继续在县里工作,他自己也觉得待下去有危险,决定我任县委书记,原拟调他到渭北特委做巡视工作,不知道以后怎样去西安凿井队。1932年冬我任县委书记后,以在孝义坊二高当教员作掩护,继续发展阿姑社、王益、西塬、野狐坡、孙塬、城内等党的组织。先后介绍本村、刘家那的张福生、张考娃、冯瑞秃、刘安、刘行安、张学生等入了党,建立了泥阳堡、刘家那党的支部。1933年春,曾和耀县县委其他同志组织领导了反对地主压迫剥削和帮助农民向地主借粮、借钱度春荒的斗争。同时,组织起西塬、野狐坡、南三保、阿姑社以北的许多农民,拿起土枪、大刀、长矛、折腰子等武器,夜间到地主家里进行分粮斗争。

为了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曾托陈云山用我家里卖了牲口的三四十元大洋去买枪。他是耀县西塬人，在旧军队里当过连长，抽大烟，结果枪没买来，人也不见，钱也没了。这时，我就亲自找到阿姑社和我相好的同学左国章，给他许了好些愿，从他手里搞了一支捷克制造的手枪，暗里交给野狐坡党的组织，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不多时，这支枪被雷天一民团发现收缴，并捉捕了好几个人。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吃了一惊，怕他们进行追查。好在很快就发生了王泰吉耀县起义，我们搞起了耀县游击队，在同雷天一民团一次作战中，又将此枪夺回。这也是敌我斗争中一件有趣的事。

上级为了了解我们武装分粮斗争的情况，渭北特委派了冯西玉同志来耀县巡视工作。一天夜里他跟西塬、野狐坡等地的农民群众一起去参加分粮斗争，不知怎样走漏了风声，还没分粮就被民团冲散了，半夜返回我家时，不慎掉到河里，衣服也浸湿了，过了一天后才把他送走。这期间，我们还做了掩护上边同志的工作。如1932年秋冬之间，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赤色根据地临时工作的程建文（后自首叛变）、周凤鸣（女）、于世庄（女），因为敌人搜剿，由汪锋（中心县委书记）带来耀县，他们都是大城市的学生打扮，在当时的环境下，很不好安置。经我再三考虑，把他们三人安排到城外刘家河刘景山家里（他是我的同学，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曾在西安师范教书，同情共产党），安全地住了一个多礼拜送走了。记得汪锋一人当天走时，我将自己用五块多大洋刚买的一双皮鞋卖了，给他作了路费。

1932年底，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红二十六军二团消灭了耀县照金周围地区的民团敌军，搞起了一部分地方游击队，建立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名曰照金苏区。并相继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指挥部、特委、革命委员会，后方设在土儿梁，后移到当时只有一两户人家的薛家寨。这里山高沟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四周梢林甚多、人烟稀少、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加之敌军、民团常去“围剿”，所需物品等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需耀县党组织经常和照金根据地发生联系，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困难问题。我的村和家里，可以说成了那时的秘密交

通站、情报站、购物站。党员张福生在村边大路旁开的一个骡马小店，成了联络点，往来照金和西安的一些同志，常在这里和我家歇宿。当时照金根据地的修械所（主要修枪、翻装子弹、造炸弹等）的工人、以后曾作过西北工委书记的惠子俊（大家都叫他惠氏）和解放后任旅大替备区副政委的桂生芳，来去西安与照金之间，就是在这里住的。县委还专门指定刘安同志，搞了一副筐担，昼伏夜出，经常为照金根据地购送油印机、油墨、蜡纸和其他纸张、医药、火药以及传递情报等，听说后来被敌人发觉，将他捉去杀害了。此外，还送去那里急需的长于雕刻印章、缮写油印、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卫生厅长的杨再泉和忠实可靠、作战勇敢曾任刘志丹同志通讯员、团长的张富存以及刘崖等一部分农民战士。

1933年7月21日，驻防耀县的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称号在耀县举行起义。起义时，耀县党组织积极地配合了这一行动，并搞起了一支革命的武装——耀县游击队。省委派来杨声（刘映胜）作王泰吉起义的具体工作。起义中间，高岗也到耀县，住在南雷家王泰吉部队政治部。起义前二三十天，省委杜衡（以后叛变）曾来到耀县，在曹雯家里召开了县委的秘密会议，着重讲了王泰吉要进行起义和为什么要起义，要我们县党组织进行配合，作好准备。起义开始的那天，杜衡和杨声一起又在曹雯家里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时张仲良也被从西安派回，参加这次会的有杜衡、杨声、张仲良、曹雯、宋子歧和我。会上对起义中要做的具体工作作了研究布置。县委在起义中做了许多配合工作，组织了事先已准备好的一部分市民代表，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协同起义部队逮捕了一部分豪绅地主和反革命；指定当时在税务局收税的任浪花（又名任天贤）参加肃反，捉拿城内隐藏的反动豪绅，任随即参加了起义部队，以后曾当过红军一个师的参谋长。接着县委又发动农民和市民群众参加在县政府西边大操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枪毙了杀害过革命群众的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没收分配了城内最大的雷、段两家地主的财产和官商囤积的粮食，群众非常高兴。

起义一开始，我就和张仲良、陈学鼎、曹雯等一方面发动组织阿姑社等村的党员群众成立耀县游击队；另一方面利用同北区民团团长赵连壁的同学关系，和他暗中商量，以其当时有病、需要人代替为理由，将他的四十来个人的民团，委托给我党陈学鼎来指挥，还写了个手续。为了把这部分民团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有一天，我们便把游击队员和民团武装调到方巷口，以训话的名义集合起来，民团站在前排，游击队站在后排，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就把民团的枪夺过来了，当时我也在场，还讲了几句话，随即处死了该团反动副团长朱瑞轩，吸收了其中大部分比较好的为游击队员，从而使这支武装就掌握在革命人民手里。

这支武装建立后，首先捉拿和处死了事前由陈国栋带起义部队一排人去捉未成的阿姑社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左善楚兄弟三人，把他家的粮食、财产等分给了群众，并召开了有五六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众烧毁了他家的土地契约和债务契约好几匣子，群众莫不称快。接着，游击队由孙家塬党支部书记蔡凤凯引路，到本村捉了一个作恶多端、企图破坏我党地下支部的兵痞、流氓张廉明，结束了他的性命，为群众除了一害。耀县游击队这支武装，除了收缴北区民团的枪三十多支外，从王泰吉那里搞来俄国造毛瑟枪十九支，我又利用雷天一部下一个军需人员的关系，搞来存放在仓库的七九步枪十来支，子弹四五箱，共计长短枪六十多支，八九十人，两匹马。

王泰吉起义后的第7天，主动向三原进发。我们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于当天将游击队和县委几个负责同志在城北十多里的白家庄集结起来，发动群众，分了地主周老四的粮食。前边的两匹马中有一匹马还是从这个村子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拉来的。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我任党代表、政治指导员。下分三个中队，陈国栋任第一中队队长，安仁任第二中队队长，张治怀任第三中队队长。经过这段紧张工作和斗争后，又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出发了，向东北方向前进，经过墓坳、道东、高山槐附近转移到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的部队会合。一两天后王泰吉的义勇军也到了

照金根据地，一起打了后沟寨子，消灭了张彦宁的民团，接着又和前来进剿之敌孙苍浪（孙友仁）特务团打了一仗。再过了十来天，大概是8月10日左右，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受敌人“围剿”，从武字区也到了照金根据地。这几支部队都会合在一起了。当时秦武山任陕甘边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团特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周冬至为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妙斋是游击队总指挥，张秀山是政委。耀县游击队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为了统一部队的领导，打击消灭敌人，8月14日陈家坡会议决定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下属黄子祥和杨森的红四团、王泰吉的义勇军、耀县第三支队，为主力部队。

接着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在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与以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刘志丹等同志的指挥下，英勇奋斗，同其他部队一起打了高山槐、让牛村，柳林雷天一、庙湾夏老么等民团，转战陕甘边、陕北许多地区，打了许多仗，消灭了很多敌人，很快地壮大起来，成为恢复、发展红二十六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当耀县第三支队和义勇军及一部分少先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团长王世泰）时，耀县的指战员占了半数以上，有“耀半团”之称，在发展陕甘革命武装，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耀县起义是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耀县党的几位负责人忙于起义中的许多工作和搞革命武装，撤走时也比较仓促，对于全县党组织以后的工作没有作出安排。到了照金不多时，由于同我们一起去曹雯当时在游击队作经济员，身体不好，早已染了旧社会一点大烟瘾，这在部队是不允许的，于是叫他回家继续在当地做地下工作，他一回去就被雷天一民团关押起来（回想这个问题，我有责任，当时是我给他谈的。不应该叫他回去，因为他在起义当中已经暴露了，回去很易发生问题，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个人不错，为党做了好些工作。听说现在瘫痪了，可以在生活上适当加以帮助）。为使耀县党的组织继续发挥作用，陕甘边特委于8月间，又派张仲良以特派员的名义和宋子岐一起回耀县白区，进行了三四个月工作，活动困难，张仲

良又回部队，和我们一起行动了一个时期，以后到了三路游击队。耀县党的工作由宋子岐负责。1935年他到陕甘边南区根据地，适逢陕北进行错误肃反，不幸被杀害了。以后耀县党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耀县游击队自成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在一年多时间的革命斗争中，常到耀县以至铜川许多地方活动，相机打击消灭敌人，进行物资、人员补充，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很大地支持、拥护。参加红军游击队的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些同志被当地国民党反动政府民团抄了家，捕押了家里人。我父亲就是被县政府捉去，在监狱里关押了很长时间。无奈我的继母只好勉强住在城内一个亲戚的家里为他做饭送饭，身心受了很大的创伤，很快病逝。他以后因多次受惊，神经失常，跳井而死。

现在耀县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你们和许多青年人，不要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牺牲的同志，要继承他们以往的革命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把现在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搞上去，使耀县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做出应有的贡献。事在人为，耀县的条件也不错，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一定会取得重大成果。

①本文根据1983年耀县县委何云鸿、郭志文、柳育民同志走访我时的谈话录音整理，后经我重新作了修改审定。

耀县起义与红二十六军恢复发展

1933年7月21日，驻扎陕西西安北部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近千人，在团长王泰吉的率领和耀县党组织的配合下，举行了起义。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和振奋人心的大事件，对于恢复和发展红二十六军，促进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起义经过和作用

王泰吉耀县起义不是偶然的。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学习，立志要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麟游起义和渭华暴动，曾一度被国民党关入南京“中央监狱”，出狱后到杨虎城部任副旅长等职，1931年担任了骑兵团团长。一个时期内，他虽然与党失去联系，但是革命意志没有消蚀，仍寻找时机，待机而动。1933年上半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指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其他根据地的斗争也取得了许多胜利，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在王泰吉骑兵团驻防区内的红二十六军、游击队的活动和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等，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正值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后，继续南侵，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在我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了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中愿意同我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冯玉祥、方振武和吉鸿昌（共产党员）将军在日寇攻陷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党的号召，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王泰吉起义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加之，王泰吉对国民党统治和所在部队的现状不满，又受到他周围的谈国帆等革命同志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便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率部起义，打开西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局面。经过他的老朋友、共

产党员何寓楚及李赋言、余海丰同志的帮助，王泰吉于 1933 年 6 月间，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了联系，并对起义作了秘密部署。当时在王部当班长的泰吉的侄儿、共产党员王振民（以后改名王英），在起义前后也从中进行了疏通与党的三原中心县委联系和联络一部分士兵的活动。起义经过两个来月的准备，终于 7 月 21 日，以号音为令，宣告举行。

对于这次起义，陕西省委很重视，除派杨声为代表到王泰吉部任政治部主任进行具体指导和派龚逢春等同志帮助工作外，省委书记杜衡（以后叛变）曾于起义前和起义当天两次来到耀县。这时我任耀县县委书记并召开县委会议，对如何配合王部起义作了传达、布置。起义开始后，王泰吉部队迅速收缴了县城内雷天一民团和胡景铨保安团的武装，释放了许多在押犯人，树起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并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同时，他们在耀县党组织配合下，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没收、分配了伪县政府、奸商囤积的粮食和全县有名的雷、段两家大地主的财物；进行了肃清反动分子的工作，逮捕了高干臣等一部分反动豪绅、地主，没收、分配了他们的许多财产；在县政府西边大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枪毙了镇压农民革命斗争的伪南区区长张恒义，人心为之大快。

在这次起义中，耀县县委在上级指导下，始终把建立革命武装，配合王泰吉起义，作为重要任务。起义的当天，张仲良同志也从西安派回。我们一起在县委会上进行了分工，一面发动党员、农民群众组织游击队，一面利用社会关系，将北区赵连璧民团四十多人争取过来，并作了必要的整顿，打死反动团副朱瑞轩。另外，又从王泰吉那里搞来十九支毛瑟枪，从雷天一的军需手里弄来一部分库存的枪支和几箱子弹，组成一支约有一百人、六七十支枪的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这支武装一成立，即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处死了全县有名的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没收、分配了他家的财物，烧毁了全部土地、债务契约；活捉并处死了在孙家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破

坏该村我党组织的兵痞流氓张廉明；还分了白家庄财主周老四的粮食给贫苦农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起义几天后，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杨虎城其他部队响应，王泰吉部队主动撤离耀县，向三原方向行动。在途经三原心、武字区革命根据地时，受到了当地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慰问，使起义官兵很受鼓舞。但是，这支部队在起义中，存在许多缺点、错误。部队中党的力量过于薄弱，全团仅有党员一二人，起义时虽派去几位同志，但一时发挥不了核心骨干作用；起义的准备时间较短，政治思想工作很差，许多官兵对抗日义举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胜利信心；部队军纪松弛，人心涣散，有相当多的官兵借起义之机发了洋财，不愿打仗；领导用人不当，轻信坏人，起义前未对本部不可靠人员作适当处理，起义中将耀县正在卸职的伪县长、委任为起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开始收缴了雷天一民团的枪，可是他当时见了泰吉同志假装他也要参加抗日，并说我过去在他以前的部队中工作时就向他谈过打红旗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一起打红旗的时候了，便信以为真，不仅将收缴的枪支全部退回，还任命他为第一支队队长，派去打耀县、三原边界的王茂臣反动民团，然而他一开出城就驻扎西塬稠桑，按兵不动，暗中与西安当局勾结，起了瓦解起义部队的作用。指挥上对敌估计不足，采取了向敌人统治中心三原一带行动的错误方针，加之对前来进剿之敌也没搞清，当部队进抵桥头镇辘轳把时，被杨虎城部孙苍浪特务团一打即溃，退到耀县小坵后，又遭敌进击，整个部队被歼、或降、或逃，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时，只剩下一百多人。

在王泰吉义勇军退到照金根据地的前一二天，陈学鼎、张仲良（任耀县游击队正、副队长）和我（任耀县游击队党代表、政治指导员）所带的耀县游击队，经过若干天的斗争，先进入照金根据地，遂在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挥下，于高山槐打退了前来进攻的雷天一民团，毙伤其一部；接着，与义勇军、当地游击队一起，打了照金后沟寨子，消灭了张彦宁民团，收缴了全部枪支。次日，又配合同前来进剿的孙苍浪军队打了一仗。经过这一仗，义勇军又受到一些损失，连

同遣散走的人员，尚余不足百人。不多天，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在敌人“围剿”下，由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带领，从心、武区也到达照金根据地。三支部队与当地革命武装会合一起，共有四五百人，三百多支枪，使照金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六军二团离开后（于1933年5月去渭华地区建立根据地，在终南山失败）的困难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王泰吉起义总的看是失败了，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所剩不多，但是起义本身却是一次重大的革命行动，对扩大抗日影响，发展革命武装，增加红军力量，改变红二十六军二团失败后的局面，鼓舞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打击。

以后，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部队不断吸收新的成分，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成为红二十六军恢复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陈家坡会议与部队统一指挥

上述几支部队汇集照金根据地后，由于当地山高林深、人烟稀少、交通不便，部队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当时我们耀县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分别住在薛家寨下边的黑田峪岩洞和附近山村，吃的多是群众只磨不筛的麸子面饼和包谷渣粥，加之住处潮湿，许多人饭后胃里发烧、拉肚子，有些战士说怪话。虽然部队在当地党政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从周围其他地方搞来一些粮食，及时解决了这一困难，但当时遇到的更重要问题，还是对这支部队怎样领导、以后如何行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对此，陕甘边特委和部队的领导同志，于8月14日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席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从省委前来担任义勇军政委的高岗和特委书记秦武山，团特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以及红四团的杨森、黄子祥、王伯栋，耀县三支队的我和陈学鼎等同志。这次会上

曾发生了很大争论，焦点是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集中行动，可以使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和一支坚强的力量，提高士气，相机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分散行动，就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在当时情况下，有被敌人各个击破、消灭的危险。以黄子祥为代表的极少数同志认为，一起行动，目标太大，困难很多，行动不便，主张各回各地，把他们的部队带回渭北地区去。这种意见遭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经过一个下午又一晚上的讨论，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将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第三支队组成主力部队，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解决了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问题。

总指挥部成立后，先于8月27日在让牛村打击消灭了雷天一民团一部，随后又打了庙湾和柳林镇等地的民团，消灭了夏玉山和瑶曲的民团各一部。经过这几次战斗，使周围敌人不敢对我照金革命根据地轻举妄动，同时也锻炼了部队，提高了作战胜利的信心。接着，部队向西行动，并在七介石附近与强世卿所带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会合。9月25日中午，当部队进至彬县的底庙时，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的民团，仓促出动六七十人前来打我们，被我骑步兵合击，迅速歼灭。随即，部队乘势智取张洪镇。当时挑选了十多名机警的战士，换上民团服装，暗携短枪，并从被俘人员中找了一个曾对红军有一定认识、交过枪的班长宋飞（以后参加了红军、作了领导干部），一起装成民团，沿大路向张洪镇进发，大部队利用秋庄稼作隐蔽，随后紧跟。说好到城下时，由宋飞答话，以其团队被红军缴械放回为由，在敌一时分辨不清的情况下，开城而进。整个部队经过三十多里的急行军，并越过一条深沟，于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到达城下。敌人果然上当，以为是他们的人回来了，岂知乃是红军战士，迅速缴了城门卫兵和城内一部分敌人的枪。此时，民团团总和他的小老婆还在炕上抽大烟，直到见我们的人冲进他们的房间，才恍然大悟，连忙摘下挂在墙上的手枪，同冲进来的我军班长芮四扭打起来，被跟进来的王安民同志当场击毙。部队随即控制了全城。这次战斗共缴枪八九十支，并释放了全部在押犯人，没收了伪县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许多布匹、粮食和钱财，镇压了

伪县党部书记和几个群众最愤恨的反动豪绅，取得了一次大的胜利。次日，部队冒雨返回照金。

部队回到照金时，适逢阴历八月十五，正好这天刘志丹和王世泰、曹士荣、黄子文等同志也由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后返回。大家相见，十分高兴，一起过了一个胜利而又欢快的中秋节。志丹同志回来后，遂被任命为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同他一起南下的杨琪、吴岱峰、高锦纯、牛刚、黄罗斌、刘约山、魏武、王兆相、康健民、王有福、芮四、苏世杰（小名七仔）等二十多位同志，先后也陆续回来，多数又到部队工作，使部队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得到了加强。二天后，部队经宜君西部向甘肃行动，于10月18日奔袭了合水县城。事前，部队曾在合水城东四十里的黑木塬停留了一天，准备云梯等登城工具，同时封锁消息，侦察地形、敌情。18日晚，趁天黑人静，部队悄悄地向合水县城急进，鸡叫前到达城下。由已组织好的三个突击队，从城东面的南北两角登城。北面的突击队首先登上城头，收缴了几名守敌的枪，接着南面的突击队也占领了南城头。随即主攻连紧跟上去，迅速攻占东城楼，歼灭了许多敌人，打开城门，使大部队顺利进城，继续扩大战果。这次战斗除少数敌军和一些伪政府官员从西城门仓惶逃跑外，共消灭赵文智部一个连和部分民团，缴枪百余支。战斗结束后，天色已明。我军一面打开监狱释放在押犯人，营救革命同志，一面向市民进行宣传，扩大红军的影响。同时，没收了伪政府和杜老爷等几家豪绅、地主的许多财物、大洋，逮走了伪税务局长和十几个钱多势大的土豪。部队于当天日暮时撤出，向宁县盘克塬转移。

在我主力部队北上攻打合水之前，由于我军连续打了不少胜仗，尤其是打下旬邑县城张洪镇，对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势力震动很大。蒋介石曾电令邵力子、杨虎城迅速肃清照金薛家寨“残匪”。于是，杨虎城趁我主力部队攻打合水之机，调集孙苍浪特务团和耀县、宜君、淳化等几县民团两三千人，“围剿”我照金根据地。在敌人连续五六天猛烈进攻、炮轰的情况下，我党政领导机关负责人秦武山、习仲勋和张秀山、吴岱峰（当时担任游击队指挥）所带的防守部队，先后撤

离薛家寨，向合水、庆阳方向转移，留下当地游击队在附近淳化、旬邑边界继续坚持斗争。接着，甘肃伪政府调杨子恒部配合陕西驻洛川的冯钦哉部和驻延安的井岳秀部，又对我主力部队进行追剿。这时，我军已打完合水，在由宁县向庆阳一带行动中，继续消灭了三十里铺、城壕川的民团。10月29日，部队在毛家沟门，对尾追我军的甘肃警一旅赵文治团进行了反击。当天，该团约千人，从三面向我扑来。敌人步步紧逼，我军在王泰吉、刘志丹指挥下，且战且退，待退到村后的山上时，又发现庆阳五属谭世麟民团近百名骑兵，已集结在我后侧的北梁上相机而动。在此危急关头，我军立即命令一个连抢占有利地形，顶住正面敌人，同时组织附近其他部队猛烈反击，奋力冲杀，迫敌退却，并乘胜追歼了许多敌人。此时，谭世麟的骑兵见势不妙，不战而逃。这一仗，大挫了敌人的锐气，打退了敌人的追剿。

包家寨会议与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三路游击队

随着我主力部队的发展，为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同志，于1933年11月3日在合水包家寨召开重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部队改编和根据地建设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第三支队、少年先锋队改编为红三团（耀县战士在全团占一半，有“耀半团”、“老三团”之称）的一、二连和先锋队，由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以后叛变）；原红四团改为骑兵团，仍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改编后，四十二师共辖两个团约四百多人、战马近百匹。会议在刘志丹同志提议下，还总结了原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渭北心、武区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必须建立几个根据地，才能使我军有较大回旋余地，依靠群众，战胜敌人，即所谓“狡兔三窟”。为此，会议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三个根据地，成立三路游击队指挥部：以陕北安定为中心建立一路游击队，强世清为指挥、魏武为政委；以陇东南梁为中心建立二路游击

队，杨琪为指挥、高岗以后为政委；以关中照金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队，王安民为指挥、张仲良为政委。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部队根据敌情变化，居中策应，配合当地游击队主动打击、消灭敌人。

恢复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建立三路游击队的决定，对全体指战员是个很大鼓舞。会议结束后，部队在东华池莲花寺进行了改编，并召开了军人大会，欢送跟随主力部队战斗三个月，已全部武装起来的陕北安定游击队，返回安定，建立根据地，杨森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魏武同志表示了决心。随后，部队又相继派张策、刘约三、张嘉珍、阴云立、郭炳坤、李尚勤等同志，去二、三路地区做建立根据地和发展地方武装的工作。

接着，我四十二师主力挥戈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11月20日，我军进至宜君杨家店子时，敌二三六旅五一团的一个连，误以为是我们的游击队，趁次日晨大雾弥漫之际，前来袭击。当时我军有些疏忽，直至敌人进入街里才发现，于是奋起迎击，且战且调动部队，迫敌退到山上与我对峙。午后，我军从正面及两侧向敌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分部队迂回到敌后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将敌连长李文杰及一百余人，全部歼灭。由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很大，伤员不好安置，部队遂改变原定计划，经小石崖、上畛子返回合水东华池一带。

部队在合水东华池地区稍加休整后，遂分兵两路，打击消灭当地及附近地区敌人。师部随三团向东行动，消灭了甘泉道佐铺的民团数十人；袭击甘泉县城之敌未能成功；在向洛河川的葡萄沟口行动中，反击了尾随并企图包围我军的敌二五六旅的一个营，消灭了一些敌人。骑兵团向西北行动，歼灭了新堡、梨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的民团和陕西警备骑兵团二团张廷芝新兵连一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使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安于此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红三团和骑兵团在二将川会合，并再次南下，向正宁、旬邑、淳化一带行动。12月中旬，部队占领了正宁南邑的后沟寨子，收缴了部分守寨民团的枪支，帮助三路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后，又返回东华池一带。在行动中，听说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开到豫陕边境。为争取其一部分武装参加革命，王泰吉同志要求利用旧关系前去活动，用他的话说，就是“出去放一把火”。经师党委在莲家砭会议上研究同意，王泰吉同部队于1934年1月中旬经耀县、铜川到达淳化强家山的一天夜里，同一个警卫员携带两支手枪、两匹骡子和一些旅费，由少数骑兵护送到通润镇他过去的部下马云从处（当时马任伪淳化县三区民团团长），心想先取得他对这一活动的支持，不料被马出卖。不多天，泰吉被押解到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在敌严刑之下，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赋诗抒怀，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从容就义，时年仅二十八岁。每念及此，令人十分痛惜。

王泰吉走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即由刘志丹担任，杨森接任师政委（原政委高岗前不久因违纪调离，任二路游击队政委）。从此，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便在志丹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2月，部队配合三路游击队在正宁揪头塬诱歼了王郎坡民团三十多人，曾一度从淳化过了泾河到麟游地区进行活动。三四月间，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动驻扎中部（黄陵）、洛川、延安、安塞、合水、庆阳等地的八个团，近一万人兵力，重新策划对我军发动“围剿”。对此，我四十二师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相机打击消灭敌人。于是部队由淳化经耀县向东北行动，连续打了瑶曲、小石板、店头、五雷镇、蔺家砭、崖密、元城子、李家梁的民团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消灭其一部或全部，缴枪二百多支，并缴获张廷芝、谭世林的战马五六十匹。

在取得以上一连串胜利后，部队士气高涨，遂配合二路游击队向合水县城前进，装着要打的样子，其目的在于调动庆阳之敌救援，然后趁虚袭击庆阳县城。4月10日，我军进到合水城附近，庆阳守敌二旅五团闻讯后，果然派团副王子义率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匆忙出

动增援。次日，他们赶到合水后，得知我军已向西华池方向转移，随即跟踪尾追，企图予以消灭，并带了许多捆人的绳子。11日临近中午时，我军进抵西华池。该镇处在一条南北狭长小平原南端的半坡上，在坡北面的原边有一道残留的古土城墙。三团和骑兵团分驻在城内外，正休息吃饭，解鞍饮马，忽然从城上哨兵那里传来一声枪响，一会儿又是一声枪响，同时，二路游击队也报告了敌人追来的消息。于是，师部迅速集合部队，将三团部署在北城外和城上的有利地形还击敌人，命骑兵团从东面绕到敌后夹击。当骄横的敌人齐头涌来，距三团阵地百十米时，我军一声号令，骑、步兵相继发起猛打猛冲，顿时一片枪声杀声，尘土飞扬，使敌人乱了阵脚，指挥失灵，不知所措。这时，二路游击队也从东沟畔赶来参战。我军从三面把敌人压到西边的沟坡里围歼，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无路可走，只好缴械投降。此次战斗共进行一个多小时，全部歼灭了敌人，缴获了五六百支步枪、二十来支驳壳枪、两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和二三十匹骡马，取得了重大胜利。战斗结束后，刘志丹同志给部队讲了话。他先说了敌人来的意图，接着表扬步、骑兵这次配合得很好，作战勇敢坚决，打了个满天星，打了个歼灭战，并鼓励大家继续奋战，消灭更多的敌人。

经过西华池等战斗，二路地区的敌情有所缓和，许多地方的群众武装斗争和各种群众组织，也逐步发展起来。4月前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附近重新成立，选举习仲勋同志为主席。5月初，部队又转入第三路地区，配合当地游击队打击敌人。在经宜君杨家店子到耀县北部地区时，炮轰了马栏镇，夜袭了咸榆公路上的铜川黄堡镇寨子，缴获民团二三十支枪，没收豪绅、地主大批烟土、钱财和其他物资。5月10日，又夜袭淳化县城未能得手，师部和三团遂撤到马家山等村。次日中午，我三路游击队侦察员和正在向十里塬前进的骑兵团，发现甘肃敌何高候部两个连，沿大路由西开向淳化途中，停在了离我三团、师部驻地只十多里的三里塬甘嘴子。师部得知情报后，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立即命令骑、步兵迅速包围敌人。骑兵先过沟绕到敌后，三团兼程前往，从塬边沟下向敌正面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冲杀，除少数几个敌人从一条小沟逃走外，其余全部

被歼，缴获一百八十余支枪和部分物资。由于这次战斗激烈，敌据村顽抗，我军伤亡较大，杨森同志头部负伤，师政委遂由骑兵团政委张秀山接替，高锦纯接任了骑兵团政委。

三里塬战斗结束后，师领导分析了当时敌情，估计敌人将会对我发动新的“围剿”。为摆脱敌人，将重伤员交给三路游击队，部队于当天即向北转移。在途经马栏下川的田家洞时，得知敌已开到马栏、刘家店一线的消息，于是，部队夜行军绕过刘家店子，于次日拂晓前，先后到达正宁的南邑、五顷塬。由于走了一夜，加之天黑路险，这时部队人困马乏，吃完早饭，准备休息，突然敌甘肃陇东警备司令部的骑兵马公章部，从漱头塬的下塬袭来。当时我军因一时弄不清周围敌情，即令骑兵团前去迎击，三团二连在五顷塬以东一个山丘上进行阻击，其他部队向东撤退。我骑兵同敌接触后，也向后撤退。敌遂向我二连阵地发动猛攻。经过短时间激烈战斗，我部伤亡三十余人，排长安仁同志阵亡，一部分人员被冲散，其余的随正在撤退的大部队，向两面山下和石底子撤走。敌乘虚而进，搞去我军丢在路上的两件驮载武器和许多笨重物资、驮畜等。这就是许多人常说的五顷塬战斗。虽然我红二十六军在这次战斗中失利，人员、物资等方面受到较大损失，但是这一个时期来，各地的游击队和根据地，却在红军主力的大力帮助下，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顷塬战斗，使我军分成三部分，我和黄罗斌、王伯栋带一部分分别经黄陵、富县西部上畛子、和尚塬等地，向二路地区转移。部队沿途摆脱了甘肃马公章、陕西冯钦哉的追击、堵截，不多日先后在南梁附近会合。5月28日，陕甘边特委和师党委一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杨森同志接任四十二师师长，张秀山同志调特委主持工作。会后不久，为适应当时形势，军委决定红三团和骑兵团分开行动，相机打击消灭敌人。骑兵团先南下到中部、宜君县的小石崖、偏桥，后又北上到陕北安定、靖边等地，沿途消灭了一部分民团武装。刘志丹与红三团则向保安一带行动。6月20日临近中午，三团尚在马子川宿营，驻扎该县的敌

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三营营长高雨亭率部前来袭击。当时，我红三团一连和先锋连与敌接触后，边阻击边向山梁撤退，二连立即从山的另一处跑步前进，抢先占领了山头，双方相持战斗了几个小时。为尽快打退敌人，三团遂从各连抽调部分精干指战员，组成突击队，由世泰同志亲自带领，在全团掩护下，沿山坡向敌发起反击，很快将敌压下去，并打死打伤许多敌人，缴获一部分枪支。这时，我军即撤出战斗，向东华池方向转移。这一仗，不仅教训了高雨亭，而且对发展当地群众的斗争，也起了推动作用。

阎家洼子会议和红二十六军继续发展壮大

在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的一年时间里，部队在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地方游击队，进行大小战斗三四十次，歼敌二千多人，粉碎了敌人几次“围剿”，拔掉了敌人许多据点，并消灭了多年在桥山等地进行奸淫掳掠、苦害人民群众的惯匪杨谋子数十人。在耀县、淳化、旬邑、宜君、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等十多个县的范围内，创建了根据地。主力部队和各地游击队、游击小组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活跃在陕甘边地区、共有一千多人和一定战斗力的革命武装。

1934年7月下旬，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和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带领三支游击队和部分赤卫队南下，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商讨打击国民党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等问题。为此，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甘肃庆阳阎家洼子召开了有部队连以上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除谢子长同志传达了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对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外，着重研究了如何帮助陕北粉碎敌人的“围剿”。在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同志的热情支持下，拨给了陕北游击队一百支枪，并由会议决定，谢子长同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率四十二师三团（当时黄罗斌任团政委）开赴陕北安定、清涧一带，配合陕北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骑兵团仍留在陕甘边地区坚持斗争。

阎家洼子会议后，红二十六军和当地游击队根据陕甘边特委同年8月发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文件精神，在陕甘边军委、刘志丹同志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消灭了许多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并在二、三路游击队发展的基础上，于1934年10月至12月间，将曾在黄龙山落草、不愿投靠国民党反动势力、深受红二十六军影响的梁占奎、贾德功属下郭宝珊的一部分武装，收编为抗日义勇军，任命郭宝珊为司令，派任浪花为政委，同时还派了一部分党员、干部进去进行教育改造工作，使这支部队受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很快成为战斗力较强的革命武装。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团、二团，分别由陈国栋、刘景范任团长，张仲良、胡彦英任政委。还成立了红军干校，刘志丹为校长、习仲勋为政委、吴岱峰为副校长，马文瑞在校任教（以后任陕甘边东区党委书记）。到1934年底左右，我红二十六军已发展到五个团，约一千三四百人，两百来匹战马，再加上各地的游击队，总共二千余人。这时根据地又有了大的发展。

一点体会

我自阎家洼子会议后，即离开部队，到陕甘边特委任组织部长，不久又调到陕甘边南部地区做党委书记和游击队总政委。对耀县起义和红二十六军恢复发展的历史，仅回忆到此。根据当时的斗争情况和切身经历，我深深感到：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为什么能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不断“围剿”中，一步步发展壮大，并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是这一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劳动人民大众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严守革命纪律，百折不挠，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有横跨陕北、陇东，林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山脉，作为积蓄革命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依托；有当地深受地主、官府剥削、压榨和军阀、土匪骚扰，生活极度贫困，具有强烈革命愿望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有久经革命锻炼，胜不骄，败不馁，多谋善断，对党和革命事业赤胆忠心，深受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爱戴的

刘志丹同志的正确领导指挥和其他负责同志的努力，并在对敌作战中，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智而取之、诱而歼之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我军通过各种关系，在一些哥老会、民团、旧军队和其他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以取得他们的同情、中立和掩护我伤病员，为我军购买医药、子弹等方面的帮助。此外，还需要一提的是，在 1933 年 7 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陕西省委和地下党组织因杜衡叛变而遭受了大破坏，使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暂时同上级失去联系，各项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也避免了某些“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使特委和部队在许多问题上，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行动，未走大的弯路、受大的损失。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立

陕甘边南区（以后的关中特区），在陕甘边以及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了便于人们比较确切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情况，仅就我所了解和经历的情况写了这个回忆。

一

陕甘边南区，地处桥山山脉南段、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带，包括现在的陕西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和甘肃正宁、宁县的一部或大部。这里山岭、川峪、高塬、沟壑甚多。靠近深山的地方，森林茂密，道路崎岖曲折，交通十分不便。

过去，封建军阀、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控制较为薄弱，当地人民群众深受封建地主、官府的剥削压榨和土匪的骚扰，生活极度贫困，不得安居，对改变现状具有强烈的愿望。土地革命时期，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在这里进行游击战争，并在照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这一带成为三路游击队活动发展的地区，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党和革命政权，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春，由于局势的变化和区域的变动，陕甘边南区遂改为关中特区。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边南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发展犹如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对甘肃的敌人威胁也很大。同时，这一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又使它成为据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对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早在1931年10月间，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合水太白镇起义部队和杨仲远、阎红彦等同志所带的晋西游击队，就在宁县、正宁、旬邑等地进行武装斗争。为适应“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的斗争需要，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两支部队于 1931 年 11 月间，在正宁的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随即在部队中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古田会议文件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反对不良倾向，进行组织整顿，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1932 年 2 月，为动员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部队又在正宁三甲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仍任正、副总指挥（以后刘志丹任总指挥，阎红彦曾一度任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的旗帜。不过，这次改编在做法上有错误，使部队本身受到了一定损失。之后，部队在正宁、宁县、旬邑、宜君、中部、铜川、耀县、淳化、白水、宜川、韩城、保安、合水一带，同当地民团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近一年的战斗，取得了许多胜利，并打开了旬邑县城，发展了自己的力量。部队在正宁活动时，曾先后两次打了县城山河镇，援助当地农民群众围城抗粮抗款的斗争，并一度在四村塬附近的部分村子，帮助成立了农民协会、赤卫队和临时革委会，打土豪，分财产，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同年 6 月以后，曾到三原武字赤色区及耀县照金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并与当地反动武装进行战斗。1932 年 12 月，为贯彻执行同年 6 月中共北方局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关于建立新的红军与苏区的决议，陕西省委派杜衡（以后叛变）到部队，在宜君的杨家店子、转角召开会议，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二团。杜衡在这次部队改编中，借机打击和排斥了部队的原主要领导同志，由他任红二十六军二团的政委，王世泰同志任团长，不得不留下有军事指挥经验的刘志丹同志任参谋长。

三

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向南进军，于 1932 年底至 1933 年初，打了宜君的焦家坪，全歼了驻在那里的民团武装，击退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援兵，占领了耀县香山寺，歼灭了耀县照金、雨源、淳化、铁王等地的许多民团。这时，习仲勋、黄子文、李妙斋等同志受党的委派，

先后到照金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并在红二十六军二团的帮助下，成立了照金、淳化、旬邑等好多个游击队，为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3年春，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陕甘边特委相继成立，李妙斋、黄子文相继任游击队指挥（后又为李妙斋）、习仲勋任政委（后为张秀山）、金理科任特委书记（后为秦武山），在照金地区进一步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军和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进行游击战争。并在4月5日召开照金地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陕甘边照金临时革命委员会，选举周冬至（雇农）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共青团特委书记），从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使红二十六军有了后方根据地。当时党、政、军领导机关设在土儿梁，后迁到了薛家寨。

由于照金一带革命斗争迅速发展，使敌人很恐慌。于是，杨虎城调集西北军的警卫团、特务团、骑兵团和一部分地方民团，对我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面对这种情况，杜衡形“左”实右，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敌强我弱和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决定红二十六军二团离开照金，到1928年进行过革命暴动的敌人统治中心的渭（南）华（县）一带建立根据地。部队遂于5月底经三原、高陵等地南下到临潼，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到两个月，便在终南山遭到失败。由于杜衡的错误决定，使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红二十六军二团毁于一旦，同时也使照金根据地陷入危机。

四

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后，照金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3年7月21日，杨虎城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成立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党组织在起义中组建的耀县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先后进入照金根据地会合。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召集党政军负责同志在陈家坡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席会议，着重解决了三支部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重新

组成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王泰吉为指挥、高岗为政委，从而为恢复、发展红二十六军，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扩大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遂指挥部队打击了照金周围的庙湾、柳林、让牛村等地的民团，并继续西进，随即同前来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一起夺取了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对陕西的敌人震动很大。1933年10月中旬，西安绥靖公署乘我主力部队（刘志丹同志此时已从终南山返回，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北上攻打合水县城之机，调集杨虎城部孙苍浪特务团和耀县雷天一、柳林肖振山、庙湾夏玉山、瑶曲陈日春及叛徒陈克明的民团等反动军队三千余人，对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围剿”。敌人连续几天包围、炮击我薛家寨后方，我防守部队（敌“围剿”开始，原指挥李妙斋在与民团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指挥由吴岱峰接任）在敌多而我力量很小、又不能死守的情况下，遂与党政机关突围，退出这一地区，向合水、庆阳方向转移，留下当地游击队在张明伍、黄子文的指挥下，到淳化、耀县、旬邑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接着，陕甘之敌又相互配合，对我主力部队进行追剿，我军经过英勇奋战，先后取得消灭三十里堡民团和毛家沟门反击战等胜利，打退了敌人的追剿，挫伤了敌人的锐气。

五

为进一步增强部队战斗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刘志丹同志的提议，部队和特委的负责人于1933年11月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了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而且还认真总结了红二十六军二团终南山失败和照金等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决定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成立三路游击队，建立三个根据地，红军主力从中策应，积极配合，主动灵活地打击消灭敌人。

会议结束后不久，第三路游击队即在原照金几个游击队和平子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并成立了指挥部，由王安民同志任指挥、张仲良同志任政委。接着，三路游击队在红二十六军主力的大力帮助下，积

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在三路游击队指挥部领导下，金理科在淳化、耀县，杜宛、李尚勤在正宁、旬邑、彬县，黄子文在中部、宜君、富县、甘泉、宁县等县，团结当地革命积极分子，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建立青年、妇女组织和区、乡革命政权、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同时，在我政治影响下，周围地区一些不堪忍受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群众，揭竿造豪绅地主的反，参加了游击队；在敌军和保安团队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组织哗变，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队伍。到1934年秋，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富县、甘泉、中部、宜君等地，先后组建了十几个游击队，打击歼灭了许多敌人，拔掉了南邑、直罗、麻子掌、小石崖等地的民团据点，恢复了照金根据地，为建立陕甘边南区革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在各县游击队分别担任队长和指导员的有张占虎、穆天祥、罗恒彩、任连俊、李文喜、何秉正、郭炳坤、刘玉才、赵铁娃、唐智祥、杨兴才、刘永培、卜凤明、乔占才、边德荣、苏继堂、牛书申、宋桐高、孙振海等同志。

六

1934年9月间，陕甘边特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派我任南区党委书记、游击队总政委（在此期间，曾任过一段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黄子文任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原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领导机关设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双龙镇上川小石崖附近的高窑子和灵湾，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加强建党建政工作。当年冬，陕甘之敌杨步飞、冯钦哉等部对我区疯狂发动“围剿”，中宜游击队在宜君建庄川的高松树、富西游击队在直罗镇西北部的一个无名寨子上，先后被敌人包围，战斗中除很少战士突围外，多数阵亡（富西游击队队长宋桐高在这次战斗中牺牲，高禄瑞经济员兼作政治指导员工作，被俘后遭敌枪杀）或被敌带走。中宜游击队指导员苏继堂同志陷入敌手后，被带至中部县城，受到敌人两个多月的关押和严

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直到被绑赴刑场时，还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组织力量坚持斗争，一面将邵凤林和贾二等同志所带的另一支武装改编为中宜游击队，由邵凤林为队长、牛书申为指导员，同时新成立了以樊长青为主要领导的宜君建庄游击队。

1934年冬，在各县游击队发展的情况下，遵照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的指示，三路游击队抽出约两个连的兵力补充了红军主力部队，于1934年底前后又以指挥部所属的特务队和平子游击队为骨干，成立了红二十六军一团，由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作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南区的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一团成立后，同敌人进行周旋。1935年4月间，部队在宁县金村庙塬与马鸿奎、马培清部打了一次遭遇战后不久，张仲良同志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任中宜县革委会主席，王英为助手），陈国栋同志调陕甘边南区游击队任总指挥、红一团团长，政委分别由贾维义、郭炳坤接任（贾维义之前，寇金才曾代理过团长职务，时间不长即在作战中牺牲）。

1934年秋后，随着陕甘边南区革命武装斗争和区域的发展，逐渐在好些地方建立了区、乡党、政组织和部分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办事处，于1935年秋相继成立了新正（正宁）、赤水（旬邑）、淳耀（县）、新宁（宁县）、永红（彬县永乐等地，后大部被敌占领，改为一个区）、中宜、富西等县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的领导机关。当时在这些县担任主要领导的有金理科、杜宛、杨伯伦、芦永财、郭廷藩、李尚勤、张积太、李积城、李科、郭存信、郭进庭、秦善和、封振宝、孙彦成、王振喜、杨宗耀、李德禄、焦怀兴、王秉祥、郭洪超、韩明奎等同志。

七

1935年七八月间，在陕甘边特委和南区党委领导下，红一团和各县游击队积极向外活动，配合西北红军主力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各县继续建立健全党、政组织，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准备分配土地。这时，西北工委派唐洪晨来任南区党委书记、

惠碧海做团的工作，我改任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南区领导机关从中部县迁到了正宁县的三嘉园和南邑等村，原属中宜、富、甘、洛等县工作，遂划归陕甘边区直接领导。10月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陕北进行的错误肃反扩大到陕甘边南区。当时陕甘晋工委派来鲁贲任南区党委书记，进行肃反（唐洪晨改任组织部长），并带了一个营的部队和若干人员予以协助。他们采取“先外后内”、“先下后上”、“先部队后地方”的办法，逮捕了几十名党、政、军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同志，其中好些人含冤被害，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思想混乱，许多人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各项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与此同时，在鲁贲“左”的思想指导下，由他带来的那个营配合红一团和当地部分游击队在清水源、城前头村与敌人打了两仗，结果未能打好，引起许多同志和群众的不满。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及时制止了这一错误肃反，不知还会有多少同志被逮捕受迫害，闹出多大的乱子，给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

1935年秋，在当地革命斗争形势日益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中央苏区的土改政策和上年冬在小石崖上川、五倾源等地试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的情况以及当地土地多、佃农多、地主豪绅在城市居住多的特点，在南区许多地方进行了分配土地。当时先从教育和训练干部、积极分子入手，并成立土地分配委员会。接着，发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开会讨论分配办法。然后对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浮财和富农多余的土地进行分配，并为农民分到的土地进行丈量，插上牌子，还为外地逃荒来的难民解味了一部分土地、耕畜和种子等困难。土地分配的进行，使广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更加相信革命、相信共产党。阶级觉悟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当时，有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不少地方建立了游击小组；新正县的农民群众积极帮助和配合本县游击队、赤卫军打开新正县最反动的王郎坡寨子，收缴了反动地主民团的枪支，并将镇压群众革命斗争罪大恶极的民团首领赵老八兄弟中的四人送交南区革委会处决，影响很大。

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区的革命武装和政权建设，除了将三原心、武地区来的一部分武装改编为十九支队外，游击队指挥部在上级指示下，遂将新宁游击队的第三、四支队，新正游击队的五、八支队，赤淳游击队的六、十、十一、十三支队，分别改编为独立一、二、三营，由孙兴才、焦怀兴任一营营长和政委；张志行、张嘉伯任二营营长和政委（焦怀兴、张嘉伯以后在一次袭击敌人的作战中同时阵亡）；边德荣、刘永培任三营营长和政委。当年冬在湫头塬召开了陕甘边南区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南区苏维埃政府，秦善秀（贫雇农）为主席，我为副主席，下设拥红、肃反、土地、财政、教育等委员会，郭树廷负责财政工作。之后，各县也相继召开了代表会议，选出了各县的苏维埃政府。

八

1935年11月直罗战役至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期间，为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陕甘、陕北两省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1936年初春，将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中央派贾拓夫任关中特委书记，张德生任特委组织部长，习仲勋任特区政府副主席，江华任特区司令员，秦善秀和我继续担任特区政府正、副主席，陈国栋改任特区副司令员，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贾拓夫同志一到这里，即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进一步增强了坚持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接着，特区办了一份油印的关中小报，在宣传党的任务、反映一些地方的斗争经验、教育干部、促进工作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久，国民党东北军向我关中特区和部队采取步步进逼的办法进行“围剿”，以后又发动大举进剿，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当时正值中央红军东征后回师陕北，准备挥戈西进，向甘肃、宁夏发展。中央指示关中特区主力部队和许多领导干部调离特区，留下个别领导同志和各县游击队坚持斗争。于是，特委决定留下习仲勋负责主持当地工

作（不多时也调走），仅剩下秦善秀（后在敌人“围剿”下光荣牺牲），同时将三个独立营合编为红三团，与原红一团（这时钟辉为团政委）一起命名为关中红军，由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陈国栋和刘永培分别任红三团团长、政委。

关中红军组成后，在当地与敌进行了短时间周旋，于六七月间沿桥山以东北上，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部队在经富县的直罗镇向道德塬行进中，我和红三团三营营长边德荣因过去常带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道路、地形较熟，走在部队的前面。当我们行进至道德塬畔时，突然与从东线向我进剿的敌军遭遇，在一片枪声中，边德荣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好党员、好干部。于是，我军绕道前进，敌人当晚撤走。部队第二天到达道德塬后，休整了一天，当时担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的萧劲光司令员，曾为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接着，部队继续北上，按计划到达了目的地。这次遭遇战后，敌人为请功，曾在西安东北军办的一个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谎称某年某日在某地“剿匪”中，打死了红军一个营长，还活捉了关中英委会主席张邦英。没想到，敌人的这一谣言竟成了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进行审查的一大历史问题。

自从主力部队和许多领导同志离开后，关中特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继续进行这一地区的工作，遂成立了特区工委，由汪锋任书记、张凤歧任组织部长（曾在陕甘边南区做宣传工作）、郭存信任宣传部长，领导当地干部、游击队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斗争。到九十月间，中央又派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书记，重建特委，张凤歧继任组织部长，与习仲勋一起派去特区的张策任宣传部长，郭炳坤任司令员，贺建山和牛汉山分别做工运、保卫工作，陈学鼎任赤水县委书记。当时特区领导的武装力量很薄弱，在敌人采用碉堡政策进行“围剿”的困难情况下，仍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和其他许多艰苦工作，打击消灭了许多敌人，恢复了许多被敌占领的区域，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我一、二、四方面军开到渭河以北地区，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应付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时关中特区

的情况遂发生了许多变化，区域也有了发展。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关中特区遂改称关中分区，以后又改为专区。

九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对促进当地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而且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同白区党的联系上，也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当时，许多从白区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的同志，往往经过这里，受到当地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的护送。新正县有个赵自秀，就是专门做交通工作的。据我所知，从1934年夏到1936年春，有刘少奇、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张庆孚、李铁伦、朱理治、鲁贲、王世英等同志出入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都从这里经过。印象较深的是鲁贲于1935年夏从北平往陕北送北方局的秘密指示信到这里，当时因敌人“围剿”，无法送到，遂给了他许多路费返回，信由这里派武装人员转送过去。再一个是张庆孚和贺山多从上海来陕甘边，还带着一支手枪，在经西安、彬县进入我区时，给我们写了一封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鸡毛信，通报他们的来意。此信由群众一村传一村，很快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感到很危险，为安全起见，我亲自带保卫队去接回他们，并派武装护送到陕甘边特委。另一个是王世英同志从上海来找中央，在经过这里时，曾将他特为中央负责同志买的一打美国派克钢笔给我和特区另外三位负责同志各分了一支，这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找毛笔写字都十分困难的人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印象最深的则是，党中央1936年3月派刘少奇同志从瓦窑堡去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推进北方地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是从这里化装出去的。我那时是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他看上去有四十来岁，大高个子，穿一件灰色的长棉袍，戴着一顶驼毛的套头帽，围一条毛围巾，像一位饱经风霜、远道而来的学者，颇有政治家的风度，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夫人。当时我们特委的几个同志特意搞了一顿有酒有肉的晚饭为他饯行。大家围坐在一个小炕桌旁，无拘无束，边吃边说，每人还唱了自己拿手的一个革

命歌曲，度过了一个欢乐愉快的夜晚。这情景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那种上下级之间同志式的深情厚谊，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仍感到十分亲切。

多少年的实践证明，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在敌人包围中巍然屹立，成为陕甘边人民群众一座坚强的革命堡垒，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党中央、陕西、陕甘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坚持走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使井冈火炬照亮了桥山大地。陕甘边南区革命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有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说这是“梢山路线”、“枪杆子万能”、“逃跑主义”等等，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绥德地区一段工作回忆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胡宗南数十万军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疯狂地进攻，妄图一举夺取延安，摧毁我党中央领导中枢，消灭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我西北主力部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诱敌深入，主动撤离延安，向北转移，趁机各个歼灭敌人。同年5月，清涧、安定（即子长县）以南等地，相继被敌占领。那时，我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工作。参加了晋北战役之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带领一个工作队在朔县搞了一段土地改革试点，正去临县郝家坡准备向康生汇报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时，突然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令我务必在三四天内动身去西北局工作。由于时间紧迫，尚未来得及汇报，我即赶回兴县分局机关驻地，匆忙向同志们和家人打了个招呼，便同警卫员和饲养员，于次日一早就起程前往陕北地区。

我们途经山西临县三交镇时，遵照上级的指示，特同当时中央军委机关负责人叶剑英同志见了面。他交待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必须要采取积极行动，在短时间内从绥德地区动员1万名青壮年，参加西北野战军，以适应战争急需。接着，我们就渡过黄河，经吴堡以北到达绥德义合镇附近，分别见到了西北局贺龙和马明芳同志。他们向我介绍了当地党政军的情况和周围的敌情，并指定我担任绥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代司令员。并简明扼要地给我交代了任务，主要是依靠当地群众坚持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实行坚壁清野和动员1万名青壮年参加主力部队，以及帮助我军筹集粮草和妥善地安置伤病员等。记得贺龙同志还特别嘱咐我，如敌情严重时，可过黄河以东地区躲避一下。谈完之后，他们就出发了。我们也很快来到绥德县城东北二十多里的绥德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韭菜沟。当时，该地区辖绥德、清涧、子洲、米脂、吴堡、佳县、镇川等几个县。原地委书记白治民已去米脂县帮助工作，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副政委高朗亭带领军分区两个团到北线防御榆林之敌，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副专员霍祝山（民主人士，年龄较大）和一些同志转移到山西境内。机关留下的主要领

导人有专员杨和亭、地委组织部长白凤章、宣传部长吴文遴、秘书长乔备果、保安分处处长裴仰斗和一部分精干的工作人员及保卫部队等。不多时，陈赓同志带一个营及电台等人员从晋西南前来，找中央商议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他们先到这里休息了一两天，并了解了附近的敌情之后，迅速前去的。

面临当前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我便同绥德地区的同志们一起，广泛地进行了保卫战的宣传动员，积极地组织民兵和地、县武装监视、扰乱敌人，并抓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经过三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工作，于8月中旬基本完成了动员参军的任务。

正当各县分别集中入伍的新战士时，敌二十九军在军长刘戡的指挥下，集结了许多部队，协同钟松的三十六师等，于8月16日分数路从绥德、榆林向佳县方向推进，企图将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压到黄河西岸一带地区歼灭。当时，由于敌人进攻很快，我们对敌企图不明，估计不足，遂决定地区领导机关和保卫队向佳县方向转移。为了骚扰敌人前进，当绥德一路敌先头部队北渡无定河时，遂命令军分区王英带领一个独立营，在河对面的山上向敌射击了一阵，以迷惑敌人，使其不致如入无人之境。随即迅速向东北方向转移。在经过绥德境内的一个村子（土地岔）时，遇见了已转移到这里休息的绥德县委书记张方海和县机关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商议了一下，确定他们向清涧以东转移，我们仍按原计划前进。当时我想的是如何同全区人民群众一起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根本没有去黄河以东的想法。于是，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沿途多次遇到险情。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封家湾。次日早晨离开不久，封家湾即被敌人占领。那天淅淅沥沥地几乎下了一天雨，中午来到一个村子时，群众为躲避敌人全都跑到深山沟去了。我们几个负责人被一名村干部领到他家里，匆忙吃了顿羊肉饺子。之后，又率部继续冒雨前进。晚上住在枣林沟，吃过晚饭，自己用冷水洗澡时，和平常不一样，一洗就感到头痛，接着腹部疼痛难忍，浑身冒汗，腿不能伸。杨和亭得知我的病情后，他根据陕北人吃了羊肉肚子受凉容易得急性胃炎的经验，

认为我患了“羊毛丁”病，遂立即用针和剃头刀，在我身上的两个穴位处又扎又刮，过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地好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刚出发，敌人就尾随进了村子。我们不得不迅速前进，途中在赤牛洼村吃了一顿午饭，接着就翻越前面的一座大山。正当同志们奋力爬山的时候，老天爷又帮了倒忙，下起了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同志们被阻在了山坡上，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一样，行军锅也被山洪冲走老远，真是进退两难。这时，杨和亭同志情不自禁地说：“天还有绝人之路吗？”我说：“天怎么能绝人呢？！”待了很长时间，夜幕渐渐地降临了。我们分析了一下敌情，觉得自己这点人马都不便行动，而敌人那么多的部队更不好行动。于是决定返回赤牛洼村，一面监视敌人，一面抓紧做饭吃和烤干身上的衣服。同时，将所带的一部分同志及跟随的新兵分出去，要他们迅速向敌侧后转移。我和大部分人员深夜继续前进。当我们翻越了那座大山之后，又一条河拦住了去路。雨后河水涨得有一人多深，同志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让骡马走在前头，人拖着马的尾巴，一个个手拉手顺利地渡了过去。接着，又翻越木头峪附近的一座山，走着走着，远处传来几下炮声，我们以为大概是敌人统一行动的讯号，于是加快了步伐。将要到达山顶时，隐隐约约望见左前方一个山头上有人在放哨，我们以为是自己人，就又往前走了两百多米。忽然，对面以猛烈的火力向我们射击，方知遭遇了另一路敌人。因此，我们急速向山的东北方向前进。不料，由于前边大部分人马走得很快，我和杨和亭同志等几个人没有跟上，在黑夜中相互失去了联系，和亭带两三个人从另一个地方走了，我同一个警卫员沿一条小路走进一条小河川。这时天色已明，枪声也逐渐消失了。

我和警卫员一边沿河川往下走，一边盘算着如何甩掉敌人，与其他失散的人员会合。由于河川小，石头多，坎坷不平，走得急，时间又长，不慎将我的一只脚腕子扭了。但是不能停下来，只好忍痛而行。当走进另一条大河川时，忽然发现河对面有个年轻人，正站在一具被洪水冲下来的敌人尸体旁边发愣。开始，我们以为是敌人的探子，想

开枪打死他。抵近一问，才知是当地的一个农民群众，身边还放着一个梭镖。他也很害怕，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当他知道我们是子弟兵后，便引导我们向北边的山上走去。当天下午把我们再带进山涧的一个沟时，突然发现距我们四五十米远的前方，又有一路敌人沿山路向黄河边的木头峪方向急进。为避免暴露，我们悄悄后退到山涧一个勉强容纳两三个人的崖坎下，隐蔽起来。当时，我们因长途跋涉，又过了几次河，河水浸透的衣服紧贴身上，又冷又饥。下午，那位农民借口给我们搞点吃的而趁机跑了，使我们非常担心，可是又没有去向，只能硬着头皮待在那里。天黑以后，忽然听到沟里隐隐约约呼叫我名字的声音，不一会儿又听不见了。我们朝沟对面的寨子仔细望去，发现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估计那里可能没有敌人，便慢慢地摸了过去。进寨后，见有八九个中年农民在家看门、放哨，其余的人都逃走了。听他们说，周围许多村子都被敌人占了，只留下附近两三个村子还未被敌人占领。于是，我们请他们搞来了两身农民衣服换上，弄了点吃的，填了肚子，便在他们的帮助下离开了该村。走到山下一个沟湾时，我们把军衣、子弹袋藏在石头缝里，将枪插在腰间，准备一旦同敌人遭遇时就和他拼了，绝不作俘虏。接着，沿一条小路往上走，到了另一座山上时，看见许多群众在那里躲避敌人，顿时浑身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次日天快亮的时候，从西北方向传来接连不断的隆隆炮声。这使我马上回想起十几天前一份中央的电报，在电报中，党中央、毛主席分析了当前战争形势，明确指出西北保卫战即将到了转折的时候。我判断那炮声一定是我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开始向敌反攻（随后了解到这就是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不一会儿，群众相继报告周围之敌开始向西北方向撤退，去增援沙家店了。我即向群众宣传当前形势，要大家解除顾虑，积极地帮助我军进行反攻。接着和部分群众回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在这里见到了杨和亭，他说昨晚喊我的名字的就是他们，并带我去曹洼村见了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由于大家都刚从敌人的“围剿”中出来，见面后格外高兴。他们见我的脚腕子肿得很厉害，即搞来一碗烧酒给我擦洗。当时，让俊贤同志一面迅速派人寻找其他

失散人员，一面组织县、区武装到敌人退却的路上打击散兵游勇，记得还收缴了一些枪支。

几天后，我们把失散的人员全部集合起来，才知道那次与敌遭遇后，走在前边的大部分人马，经过木头峪转移到了佳县县城。当前边又一路敌人到木头峪时，恰巧他们才过去。另外，得知专区裴仰斗和当时的地委秘书长梅行二人，在失掉联系后，一同进入了山西境内。至此，我们大约一个星期未同西北局联系了。当时，他们估计我们陷人敌人的包围圈里，凶多吉少，非常担心。当收到我们再次发去的电报时，才知道我们安然无恙。

由于我军取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敌人遂逐渐向南撤退。我们机关人员随后逐渐返回绥德义合镇，并一边走一边工作。着重抓了督促各县迅速集合新兵参加主力部队，帮助许多群众解决战争造成的生活困难问题，继续发动群众积极支援部队反击敌人，迎接新的形势和新的斗争任务。同时，为了表达绥德地区人民对半年来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西北野战军的热爱和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地委、专署和群众团体还在绥德城内进行了一次慰劳部队的宣传活动。彭总、张宗逊等许多部队指挥员和其他干部一起高高兴兴地会了一次餐。我们的工作，受到彭总的好评。

当敌人向南撤退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相继迁到绥德义合镇一带。11月间，西北局在义合镇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会议由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主持，李卓然同志传达了全国土地改革会议精神。会议在讨论中，检查和批评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某些右的偏向，并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的决议。这时，军分区的个别负责人作了调整，由张达志同志任司令员，吴岱峰同志任副司令员。从此，绥德地区除了继续做好发动群众进行生产救灾，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协助主力部队去外地作战，对榆林敌军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土地改革运动，并结合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为了做好当地土改工作，我们先在西北局的帮助下，进行了土改试点，然后逐步推开，分批进行。

当时，由于一部分干部对老区进行土改的政策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向农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于 1948 年初对一些地主、富农进行斗争时，曾发生过火的行动，经引导及时得到了制止。佳县一些地方在发动群众的方法上有偏向，只注意作贫、雇农的工作，把中农放在一边，引起一些中农的疑虑、害怕，以致发生死人问题。这个情况被中央同志及时地察觉了，西北局要我去检查纠正，我在作了这一工作之后，返回的途中，借机到党中央驻地杨家沟，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检查纠正的情况。那时，毛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已离开那里到晋绥去了，我将情况向周恩来副主席和胡乔木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听后，还作了指示。接着，我又到西北局向习仲勋同志作了汇报，并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这在当地土改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我于 1948 年 7 月调到西北局任秘书长。此时，西北局已迁回延安。我走后，绥德地委书记仍由自治民同志担任，其他党政军负责人基本未变。

回顾解放陕南的斗争

一、陕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陕南地区所辖范围，除了商洛、安康、汉中三个地区外，还有鄂西北的郧阳地区，南有巴山，北靠秦岭，汉水和丹江横贯全区，绝大部分地方为崇山峻岭。因为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区生产落后，土地贫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广大农村被折磨得十室九空，人民群众生活极其困难，迫切要求解放。我党我军曾在这个地区领导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多次创建革命根据地。1947年我人民解放军大反攻时，陈赓同志指挥的晋南部队，打过黄河到了豫西地区以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即令第四纵队第十二旅、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和陕南独立团共万余人，挺进陕南，牵制了向陕北和豫西进犯之敌，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创建了一块根据地，有力地配合我第一野战军粉碎胡宗南军对陕甘宁边区的侵犯和支援中原战场我军作战。这个地区还成为解放川北的跳板。当时中央派往四川的干部工作队（以下简称川干队），就曾留置在陕南地区工作待命了一年多。

1948年12月，中央决定调我到陕南区党委工作时^①，习仲勋和贺龙分别同我谈话，都非常明确地说明了陕南战略地位的重要。特别是贺老总讲得很具体，他指着地图，从古到今讲述史实和有关情况，并以他1931年率红三军挺进鄂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亲身经历，恳切而又详细地说明了陕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这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感到去陕南的责任重大和工作任务的艰巨。

^①时年张邦英任陕南地区区党委第一书记兼陕南军区第一政委、第十九军第一政委。

二、陕南根据地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1949年春，我到了陕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郧阳。途经郑州时，见到了孔从洲同志，接着又见了陈赓同志和汪锋同志^①，他们先后向我谈了我军进入陕南地区创建发展根据地的情况。到豫东商丘又参加了中原局扩大会议，听取了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当前形势及重大战略方针的指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的中心内容就是1949年新华社那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中明确指出的，人民解放战争将要夺取全国胜利，全党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领导人民军队，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会后同汪锋同志一起到陕南区党委，召开了全区的干部会议，确定布置一些重大工作，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使大家清楚地知道了全国的形势与党的方针任务，对尽快争取全国胜利有了更充分的信心。并经过向刘金轩^②、时逸之^③、陈先瑞^④、李耀^⑤等许多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认为，在大反攻之后，陕南地区的部队和干部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经受了严峻考验，不仅牵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而且在四面被敌封锁包围的鄂陕边区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和商洛山地游击区，壮大了自己，先后新组建十几个县政权。主力部队还参加了襄樊、淮海战役，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同时，也了解到，除根据地中心地区几个县政权比较巩固外，很多地区还有国民党反动武装（包括民团、土匪、夜壶队、棒子队、白带子会、红带子会等地主反动武装、迷信团体）经常进行袭扰破坏活动，捕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山阳、镇安、商南等县城多次发生拉锯战，得而复失，失而又得。敌军兵力在数量上大我几倍，一些群众存在的怕我军再次撤出（过去曾有八进八出）、怕“变天”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边缘区、游击区的群众顾虑更多，深怕国民党反动派报复杀害。根据这些情况和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区党委确定，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剿土匪，巩固已解放的地区，积极发展扩大解放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力争早日解放全陕南。

- ①汪峰任陕南地区区党委第二书记兼军区政委。
- ②刘金杆任陕南军区司令员，第十九军军长。
- ③时逸之任陕南地区行署主任。
- ④陈先瑞任陕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九军副军长。
- ⑤李耀任陕南军区副政委，第十九军副政委。

三、区党委着重抓的几项主要工作

第一，军民结合坚决剿灭国民党反动地方土匪武装，巩固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当时十二旅率四个团参加淮海战役，我们将留在根据地的两个主力团和五个独立团，相对集中兵力，剿灭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土匪特务武装。3月，十二旅参加淮海战役返回后，经过短期休整，同两郟、商洛分区部队共同剿灭了一万多反动武装。这样不仅使我陕南已解放地区得到巩固，为进军解放全陕南消除了后顾之忧，也有利于我南下大军顺利打过长江的后方安全。在剿匪中，我们把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紧密结合起来，对首恶者严惩，胁从的不问，投诚归顺的一律从宽处理，对罪恶滔天、顽固不化的匪首坚决镇压，做到宽严有别，处理得当。同时很强调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军队进行剿匪，针对匪徒的危害和群众的思想顾虑，召开各种不同类型人的座谈会，用多种方法进行宣传工作，因而促使广大群众都主动地向我军报告匪情，争当向导，积极参加剿匪斗争。这是我们迅速取得剿匪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抓紧培训干部，积极进行解放全陕南的接管、建政等项准备工作。当时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广大新解放区急需大批干部，中原局给陕南先派了300多名干部，远不能适应全区的需要。加之，1949年8月中央来电调走全部“川干队”，更感到干部的困难。为了不减弱部队的战斗力，不再从主力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地方工作，决定加强陕南公学和开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军区也成立了陕南军政干校和各团的随营学校，大量吸收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当地进步青

年知识分子入校培养。基本上做到了每解放一个县城，都有配备好的县、区级班子架子，随军进入城镇，及时进行接管工作。

第三，大力动员群众，做好解放全陕南的支前工作。1949年5月初，我陕南军区十二旅、十七师等部队奉刘邓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下辖五十五、五十七两个师。又以各县县大队、独立营为基础，组编了四个独立团，我军区人民武装有了进一步扩大与发展。并且很快出动，沿汉水西进，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歼灭据守在秦岭巴山地区的胡宗南军及保安团队。为了保证部队顺利西进，区党委决定，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前作为中心任务，尽一切力量支援部队作战，一切工作都要为支前让路和服务。为了加强前方作战指挥和后方支援联系，区党委还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及支前勤务司令部，抽调陕南行署、安康地委专署等负责人参加支前工作，并派陈先瑞、祁果^①二同志去西安，向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汇报陕南地区的情况。记得部队西进通过郧阳城关时，居民和职工倾城出动，夹道迎送，热情慰问，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投入支前行列，有四万多名民工随作战部队抬伤员、运送弹药、粮食等军用物资，保证了部队作战的胜利进行。对烈军属、支前民工家庭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当地干部和群众都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鼓舞了战士作战的情绪，消除了支前人员的后顾之忧。

第四，组织农村工作队，进行反霸、减租、减息和建立人民政权。区党委工作队首先在郧阳县长岭村一带搞发动群众的试点，经过将近半年时间，从访贫问苦、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恶霸斗争、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权，到实行统一累进税率（即合理负担）等一系列的艰苦工作，将这里的农民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并将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工作队完成试点任务后，召开了茶店区全区农民代表会议，长岭村农民代表在大会上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组织起来翻身闹革命的经验。大会经过诉苦、挖穷根、交流经验，代表们的阶级觉悟普遍有了明显地提高，热烈地讨论了回去如何组织发动本村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大会之后，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在茶店

全区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斗争，基本上完成了在长岭村一带进行的群众斗争和工作任务。这样，由点到面，由早解放区到新解放区，逐步地波浪式地先后开展了农民为切身利益而斗争的减租、减息、反霸的运动。直到 1951 年春，陕南区党委撤销时，才基本上完成了全区的减租、反霸和民主建政的任务。

①祁果任陕南地区区党委办公室主任。

四、解放全陕南的斗争和胜利

1949 年下半年，我陕南军区主力部队经过英勇顽强斗争，首先解放了安康地区各县，紧接着配合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迅速西进，于 1949 年 12 月 8 日解放了陕南主要城市汉中南郑市，这个地区所属 12 个县也相继解放。商洛分区部队积极主动出击，穷追猛打境内保安团队，也于同年内先后解放了全区 7 县和宁陕县。逃窜在陕南到川北巴山一带的敌军两万余人，经过我军远距离奔袭包剿，将其全部歼灭，敌“川鄂豫陕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和其他军、师以上军官约有 30 多人被活捉，解放了川北通江、万源、南江等县城。此外，我陕南军区部队还西到甘肃成县、康县，南到四川广元、剑阁，北到周至、眉县等地区，配合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广泛开展剿匪斗争，这使陕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产的顺利进行。我军在胜利完成这些战斗任务中，发扬了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涌现了大批战斗英雄模范，近万名指战员为夺取战斗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那种为革命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可歌可泣，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颂扬。

陕南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特别是地方干部，有太岳、太行、晋察冀、陕甘宁、华东、晋续、中原等地区的干部，还有“川干队”及新参加工作的当地地下党等方面的干才，真是五湖四海，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陕南区党委很重视做好干部的团结工作，经常强调团结对敌，强调向前看，在充

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调动同志们的积极性，大胆开展工作。事实证明，由于加强了团结，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团结，对于加强领导和推动各项工作的不断发展，对于夺取解放全陕南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陕南地区的解放，是在党中央、中原局、西北局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支持下，经过在陕南工作的同志们艰苦奋斗和广大指战员的流血牺牲而取得的。我们回顾解放陕南的斗争和胜利，要进一步牢记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很难有陕南斗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要一定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一致，竭尽全力为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新疆工作回忆

1951年初，我调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于1954年3月调离新疆。那时，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和进疆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下，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发展生产等热烈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疆是个好地方

新疆史称西域。位于我国西北边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面积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地区辽阔，富饶而壮丽。有许多适宜于灌溉的绿洲农田与广阔的牧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极其丰富的地下矿藏。同时又是沟通东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古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著名的瓜果之乡。新疆历来就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满族、达斡尔族和汉族等十三个民族，人口四百三十万。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由于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所处的环境，人民勤劳、热情和豪爽，而尤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人民群众能歌善舞，有悠久的文化传统，颇受人们的欢迎。

苦难的历史

新疆的各族人民群众同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一样，长期以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军阀、官僚和封建地主、牧区头人残酷的压迫剥削以及宗教的束缚下，政治上没有民主自由，经济上非常落后，生活极度贫困，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历史上曾不断发生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

1933年4月，军阀盛世才统治新疆后，为了巩固在新疆的政权，曾一度亲苏，提出民族革命、民主自由、废除某些封建压迫等改革措施。1937年在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情况下，我党中央陆续

派上百名共产党员赴新疆工作，帮助盛世才提出反帝等“六大”主张。我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数百人曾进入新疆进行短期整训。1939年党中央又派陈潭秋同志为驻新疆代表，对促进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支援抗日战争以及传播马列主义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各族人民群众中有很影响。可是，由于盛世才的反动本质，使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又悍然进行反苏、反共和反人民的活动。当1942年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兵临莫斯科城下，更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盛世才便投靠了国民党，制造事端，大肆逮捕各族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祯等许多革命同志惨遭杀害。

盛世才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行为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极大不满，加之长期以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压迫剥削的痛恨，于是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1944年9月在新疆的民族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达列里汗、阿巴索夫等领导下，掀起了伊、塔、阿三区革命，并相继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装民族军。与此同时，帕米尔高原地区也爆发了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成为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重要因素。

和平解放

1949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等重要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驻新疆警备区司令员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汗，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我党派往新疆代表邓力群等同志周密的工作下，率领广大爱国官兵和政府人员，于同年9月宣告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于是，我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所属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同志率第二、六军指战员，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克服严寒、食宿和交通等困难，奋力前进，于10月25日进驻新疆的乌鲁木齐，并相继进驻南、北疆的许多城镇，与三区民族革命武装会合，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尔泰山、帕米尔高原。

为了统一领导新疆各方面的工作，党中央于 10 月中旬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为第一书记，徐立清为第二书记，常委还有高锦纯、邓力群、饶正锡、包尔汗、吕剑人、赵守攻等；并成立了以王恩茂（后为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为书记的南疆区党委，左齐、祁果、伊敏诺夫为第二、三、四书记；以罗元发、张贤约、张凤岐为正副书记的北疆区党委；以顿星云为书记（后由高峰、李铨为书记）的伊犁区党委。还由进疆部队抽调了大批党员干部协同内地调来的干部派往各地，自上而下地建立区以上党政组织，进行接管改造各级旧政权，废除保甲制度。12 月中旬，在党的领导下，由新疆各族各界代表组成新疆省人民政府，包尔汗任主席，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后任新疆分局第四书记）。同时，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西北野战军的命令成立了新疆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后代理司令员、政治委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令员（后兼任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郭鹏任副司令员，张希钦任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徐立清任副政委，曾涤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副政委），张仲瀚任二十二军政委（后任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列斯肯任五军军长，开始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和改造工作，为在新疆进行平叛、镇反、民主改革和恢复生产等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

新疆远处祖国边陲，既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又毗邻其他几个国家。刚解放时，不仅苏联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尔泰、喀什设有领事馆，而且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也在喀什设有领事馆。正当新疆各族人民欢庆胜利，忙于生产、建政之际，长期受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支持的乌斯满、贾木尼汗和尧乐博斯匪帮勾结起义部队的骑七师（原国民党马步芳骑兵五军），于 1950 年 2 月发动叛乱，裹胁数万牧民流窜于乌鲁木齐、哈密和阿山一带牧区。叛匪到处烧杀、抢掠，他们杀害的各族人民群众多达千余人，并抢去大批牲畜、财物，使许多牧民背井离乡。3 月底，他们又向驻守在哈密地

区东部的解放军偷袭，围攻伊吾县城。各族人民对这帮匪徒深恶痛绝，迫切要求进疆解放军迅速予以消灭。我进疆人民解放军为维护新赖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战斗百余次，到 1951 年 2 月全部消灭了这股政治叛匪，除尧乐博斯逃跑外，先后活捉了乌斯满、贾木尼汗、乌拉孜拜等匪首，解放了牧民两万多人，夺回了牲畜十七万头，基本上稳定了牧区的形势。

剿灭叛匪的胜利，只是消灭了公开的敌人，而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仍然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奉命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与起义部队中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分子相勾结，煽动叛乱，抢劫群众财物。大土耳其主义分子与民族分裂主义者也乘机兴风作浪。一些封建会道门也利用迷信活动，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鉴于这些情况，中共新疆分局发出肃清国民党特务的指示，在乌鲁木齐等城市开展了肃特工作。以号召、自首登记和动员群众检举揭发相结合的方法，摧毁特务组织三四十个，逮捕特务分子三百多人，自首特务分子一千六百多人，使国民党特务组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50 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残余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误认为时机已到，蠢蠢欲动，散布变天思想，蛊惑人心，一些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利用民族偏见，欺骗、麻搏人民群众，破坏活动猖獗，暗杀、投毒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秩序很不安宁，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因此，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从 1950 年底到 1951 年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结合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并发动本民族的群众和上层宗教人士进行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稳、准、狠地打击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摧毁了反革命组织，取缔了反动会道门，惩办了一批反革命首恶分子。1951 年 4 月末，乌鲁木齐市召开了有各族、各界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判处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凶手李英奇、富宝廉以及叛匪头子乌斯满等人死刑。与此同时，其他

地区也先后召开了公审大会，判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剿灭土匪与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划清了敌我界线，增强了民族团结。

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剥削

新疆各族人民不仅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而且受当地民族的地主、恶霸等极其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农业区的土地占有是相当集中的，最集中的如南疆、伊犁和吐、鄯、托三县的一部分地区，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八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竟达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土地。其他如南疆、伊犁和吐、鄯、托三县及米泉县、哈密等大部地区，占乡村人口百分之八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四五十，而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却只有土地百分之五六十。而乌鲁木齐北九县及其他一部分地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也达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他农民占有土地百分之七八十。地主阶级依靠占有的大量土地，对各族劳动农民进行高额地租、水租、高利贷等剥削压迫。尤其是少数恶霸地主仍以中世纪农奴主对待农奴的手段，极端野蛮、残酷地掠夺农民，使各族广大农民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陷入贫困饥饿，以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而地主则不劳而获，过着腐化奢侈的生活。如和阗大地主艾买拉合齐全家五口人，占有耕地五万余亩。于阗县有一个庄园，园主安德尔达占有全村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水磨、油房以及对外的商贸活动等，而七十一户劳动农民则一无所有，还因生活所迫欠下他的债务，终年为他家做工，年终算帐总是不够付他的利息，成为他的终身奴隶。劳动妇女更为凄惨，有的要为地主做饭、洗衣服，还有不少妇女被恶霸地主活活摧残致死。新疆降雨量稀少，农田主要靠大山上冰雪融化和地下水灌溉，因此，很多地方有地无水等于无地，一些恶霸地主不仅占有大量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而且把持了水利资源，以高额水租进行剥削，迫使农民

以高价向地主买水。因此，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从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1951年夏，我去南疆，到了维吾尔族聚居的几个村子，一停下来，许多男女群众蜂拥而来，好像见了亲人一样，情不自禁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争相诉说地主压迫剥削的痛苦，感人甚深。

所以新疆分局根据中央民主改革的方针，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农业区进行减租反霸与土地改革

1951年夏，经新疆分局和省人民政府提出并提请省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全省农业区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受到了各族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为了顺利开展这一运动，先后对全省一百四十七个乡约五十万人口地区的减租进行了总结。在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上明确之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反霸运动，务必分批进行，“稳步前进，宁缓勿乱”，“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联合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宗教爱国人士及一切赞成反封建的人们，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斗争对象，主要是恶霸地主，即在农村中实际起统治作用的地主阶级当权派与违抗减租交粮、破坏生产、转移财产的不法地主”；“以政治打击为主，适当地进行经济清算”；“宗教寺院出租的土地，一般均按照减租条例依法减租，并视当地群众觉悟，愿少减者则可少减，不愿减者可暂不减”。

同时，从省党政机关和驻疆人民解放军中抽调了一万余名干部，经短期培训分赴各地参加、指导工作。各专区、县也培训了一大批民族干部进行这一工作，从而保证了减租反霸运动的健康发展，分期分批在全省九个专区、五十八个县和一千五百多个乡，胜利地完成了减租反霸的任务。这是新疆各族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新疆农民自求解放的一次巨大的阶级斗争。

在这一运动中，通过各族农民群众进行诉苦、说理以及清算等斗争，不仅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而且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除将恶霸地主霸占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牲畜归还农民外，着重从减租、退租和清算霸占财物、无偿劳役、克扣工资等所获得现粮、现金及各种财物，共折合小麦两亿九万七千余斤，平均每户分得三四百斤，解决了农民生活困难。

同时，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近十万农村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壮大了农民的力量，初步改造了基层旧政权，为农业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新疆的土地改革运动是 1952 年 9 月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的。当减租反霸运动尚未结束，1952 年春即在九个专区、十八个乡进行了土改试点，并由领导带队，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制定了《新疆省关于执行土地改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疆省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补充规定》等具体政策。与此同时，训练了二万余名土改干部，召开了新疆党代表会，从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作了充分准备。

在整个运动中，始终强调了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做好团结各族、各界上层人士的工作，组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以减少阻力，增加助力。通过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吸收一部分人参加土改委员会，组织参观土改等，使他们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土改的必要性和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有所了解，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贡献力量。

在进行土地改革中，坚决保护畜牧业和工商业。对于地主经营的畜牧业，不管畜群大小，草场多少，一律加以保护并鼓励其发展；半农半牧区不进行土地改革；对清真寺、喇嘛庙、宗教学校、麻扎（公共墓地）的土地和房屋、财产等，不没收，不征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一般宗教职业者与农民同样分得土改果实；对于参加过三区革命、解放后与人民合作的民主人士，各民族、

宗教领袖人物，即使其家庭是地主成分，以前虽有罪恶，只要愿意守法改过，说服群众不予斗争，并在没收财产时予以照顾，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全省九个专区、五十七个县和三个市郊区共一千五百多个乡的土地改革，于1953年底胜利结束，使六十五万余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耕地七百三十万余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分得了大量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锻炼、选拔了很多基层干部，健全了基层政权，建立了党团的组织，开始组织生产互助组。

土地改革的胜利，使各族农民欢欣鼓舞，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疏勒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的形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献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倾诉了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了土改翻身后的喜悦，抒发了他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毛泽东主席在复信中说：“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毛泽东主席的信，极大地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和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牧业区进行不同于农业区改革

新疆牧区在全省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当时七十九个县，其中有二十二个县以牧业为主，三十三个县有部分畜牧业。牧区各族居民五六十万人，牲畜一千多万头，畜牧业在新疆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长期压迫和沉重的苛捐杂税，部落头目利用历史上残留的封建特权，对牧民进行无偿、半无偿和超经济的剥削以及政治压迫。加之匪患不绝，自然灾害频繁，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牧民极其贫苦，生活非常困难。

新疆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进疆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帮助下，剿灭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改造了旧政权，开展了

贸易，组织医护人员深入牧区为牧民治病。并进行了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宗教、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得到广大牧民的拥护，使牧区社会秩序逐步趋于稳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部落头目也日益靠拢党和人民政府。记得 1952 年春，我和几位同志去北疆调查土地占有和民族关系情况，到了阿尔泰哈萨克族聚居牧区一位殉难的三区革命领导人的家里，他家有牛、马各四五百头，羊一千多只，并有大片的牧场。在有很好的钢丝床、地毯、挂毯、宽敞的大帐篷里，以奶茶、酥油、宰羊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并在他家的促动下组织了个“刁羊姑娘追”的群众娱乐活动。这说明当时牧区的上层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很拥护的。

但是由于牧区干部少，广泛宣传牧畜政策不够，在农业区开展减租反霸运动中，一些牧区的牧民骑马跑到几百里外农业区参加群众斗争恶霸地主的会，回去后，在个别牧区发生自发地斗牧主、分牲畜的错误行动。当时由于中共新疆分局领导同志主要忙于农业区的改革，对牧主的经济性质认识不够明确，制止不力，以及坏人乘机造谣，一度在个别牧区发生非正常宰杀牲畜和转移牲畜的现象，使牧区工作受到了一些损失。

1952 年夏，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的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根据党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对牧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明确了牧主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确定在牧区执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成分和牧工、牧主两种政策。会后，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制止了对牧民的封建政治压迫和对牧工的超经济剥削。以后又组织了牧区工作队和访问团协同牧区干部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取消了一些地方错划的阶级成分；对牧主与牧工的关系，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经过协商，适当增加牧工的工资，鼓励双方积极从发展生产中增加收入。与此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安置流散的哈萨克牧民和参加过暴乱而自动回来的散匪，适当解决了在镇反中一些处理不当的财物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引导他们走上生产的道路。

为了促进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调整了牧业税，提高了起征点，实行轻税政策；改变了收购及税收工作中的某些混乱现象，加强了贸易、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贯彻执行，团结了各阶层的人，并吸收某些上层开明人士参加政权的改建工作。从而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使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地恢复与发展，牧民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1953年7月，召开了全省首届牧区工作会议，总结了牧区工作经验，肯定了以前的成绩，更加明确了以后的方针、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有关牧场、牧工工资、农牧关系、畜牧业生产和互相合作以及半农半牧区的土地改革等具体政策、措施，使牧区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三反”“五反”运动，新疆和全国一样，于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起来，打退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进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干部。

新疆和平解放后，从省到县级机关的工作人员中，留用的旧政府人员占很大比重，这些人的身上依然保留着旧社会的官僚作风和贪污浪费的恶习。我们进城工作的干部，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程度不同地沾染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的恶习，有的甚至被资产阶级拉下水，陷入了贪污腐化、同流合污的泥坑，丧失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应有品质。

为了响应党中央1951年11月20日发出的《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指示，新疆分局及时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作出了结合生产运动，在全省开展“三反”运动的具体部署，先从省级机关开始，逐渐展开。通过学习文件，召开各种形式的动员会，提高认识；号召干部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处理典型案件，亮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甄别核实，定案处理等步骤，历时七个多月完成了“三反”运动。

运动中揭露出大批贪污案件及严重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仅省级机关六十九个单位的核实统计，挖出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多种手段贪污一千万元（当时的一万元等于现在的一元）以上的贪污分子五百多人，其中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十五人，追回赃款八十八亿多元。贪污数额较大、人数较多的是财政系统，这个系统的二十一个单位及其所属机构就查出贪污分子八百多人，贪污金额计一百六十六亿元，受刑事处分的三百多人。对于贪污数额不大或坦白交待好的免于刑事处罚而给予行政处分；对当地民族干部，特别是参加过“三区革命”干部的贪污问题，则采取慎重态度，区别对待。

通过“三反”运动，清理了大批贪污分子和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严肃批判，纯洁了组织，挽救了许多愿意悔改的分子，教育了广大干部，转变了机关的领导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使广大干部、群众从思想上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廉洁、朴素和认真负责的新作风逐渐蔚如风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各族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同时，机关团体还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企业加强了管理，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经济建设造成极为重要的条件。

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新疆的工商业，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照顾私营工商业的利益出发，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对工商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进行了合理调整，并通过加工订货、收购产品，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经营，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并不满足于得到的发展和利润。他们利用同国营经济以及其他渠道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对抗国营经济的领导，妄图削弱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侵蚀了工人、国家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如在修建红雁池永久性工程中，不法分子与封建把头相勾结，不仅盗窃水泥贷款三十亿元，而且偷工减料，严重地影响了工程质量和按期竣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在“三反”运动开展不久，即根据党中央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经过思想教育，坦白检举、交待政策，组织力量、深入检查，落实定案，补交税款，退还财物等一系列的工作，拉开了“五反”的序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揭露出来大量的、极其严重和带有普遍性的违法行为。仅乌鲁木齐市查出各种违法行为的工商户，占全市工商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违法金额达五百多亿元。其中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工商总户数的

百分之五还多。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区别情节轻重、金额大小、态度好坏等定为基本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在处理上主要采取补交税款及其他非法所得财物，只对个别“五毒”俱全、罪行特别严重而又抗拒者才予以法办。这样，既打击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违法行为，又团结了大多数，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纳入了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同时，又照顾了新疆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发达的情况。

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是万恶之源，干部的贪污浪费，就是受了这一思想毒害的结果，不仅使国家经济受到损失，而且在政治上腐蚀了许多干部。在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并结合抗美援朝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使党政机关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新风气。同时使资本家也受到了遵纪守法的教育，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军民齐心协力，恢复发展生产

解放前，新疆现代工业寥寥无几，仅有个独山子的石油矿。手工业也不发达，主要为依附于农业的家庭副业。农业在新疆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49年农业在工农业总产中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农业人口占新疆总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七。而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农具是原始的木犁、笨重的砍土镩，耕作粗放。1949年全省人均粮食只有三百九十多斤，农民过着半饥半饱的贫困生活。

解放初期，新疆经济上和全国一样，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新疆分局和人民政府把恢复与发展农、牧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1950年，新疆各地结合政权建设，宣传和发动各族农民大力发展生产，提出“粮田每亩增产一成，棉花每亩增产10公斤”的号召。人民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贫苦农民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调整了三十四万多亩公地的租佃关系；在有借有还的原则下，调剂农作物种子六万余石，耕牛七千四百多头，农具四万余件，

大车五千七百多辆；银行发放了一批农业、手工业和水利贷款；取缔了水霸和不合理的用水制度，使贫佃农、中农的土地得到了公平用水；及时动员、组织军民扑灭蝗虫等灾害。由于对农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尽管受灾严重，而全省的农业生产由下降转为上升。1950年粮、棉、油的播种面积、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49年。

1951年，由于剿灭了乌斯满等政治土匪，农、牧区的社会秩序进一步安定下来。并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推动下，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推广增产技术，增加农业贷款，使农业生产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1952年至1953年，先后开展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各地在民主改革中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全省共扩大耕地和灌溉面积三百三十多万亩，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单产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包括人民解放军的生产在内），人均粮食达到了六百斤。同时，畜牧业也得到迅速地恢复与发展。

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新疆的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苏合营的石油、有色金属公司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揭开了新疆工业发展的新篇章。邮电、公路交通、国营贸易和合作商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事业等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包括陶峙岳起义部队）实行“屯垦戍边”的方针，在恢复发展新疆的生产和建设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初，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军区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发布了大生产的命令。进疆人民解放军除一部分部队担负国防、进军后藏、剿灭土匪和维持治安外，一半以上的部队开赴天山南北，按师、团布点，搭起帐篷、挖地窝子，冒着寒冬酷暑进行屯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1年初，新疆军区制定了三年生产建设计划，进疆部队发扬了三五九旅的南泥湾精神，以极大的勇气、顽

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至 1952 年共建成二十七個軍垦农場，播种面积一百六十二萬亩，生产粮食两亿斤、棉花六百九十九萬斤、油料一千多万斤，饲养牛、羊、馬等五十八萬余头（只）、猪三萬五千多头，各軍垦农場还兴办了六十一个工矿企业。1953 年秋后，我到庫尔勒农二师，听取了他們的汇报，看了他們自己动手、辛勤劳动盖起的一幢幢房子，开垦的大片耕地，修的纵横渠道，种植的树木，收获的粮食，使用的新式农具，真可谓高楼拔地起，荒漠变良田，令人鼓舞。

由于新疆雨量甚少，农业生产主要是靠来自雪山溶化的水灌溉农田。因此，军队在垦荒的同时，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有长三十多公里、全部用石块和水泥砌成的哈密红星一渠、二渠，总干渠长六十公里；第一期工程灌溉能力达二十一万亩的阿克苏胜利渠；蓄水五千三百万立方的乌鲁木齐红雁池水库，以及焉耆解放一渠、庫尔勒十八团大渠、玛纳斯磨菇湖水库、玛纳斯河流域的水利工程等，三年增加了灌溉面积二百万亩。在此期间，进疆部队广大官兵还发扬了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节衣缩食，积累资金，自己动手，兴建起新疆历史上第一批现代工矿企业，有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六道湾露天煤矿、十月汽车修配厂、苇湖梁火力发电站、乌拉泊水力发电厂、八一面粉厂、水泥厂等。这些工厂，后来都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为新疆的现代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初期，进疆部队在坚决响应毛泽东主席“屯垦戍边”的号召下，取得的工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不仅克服了财政和粮食供应的极大困难，减轻了当时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而且为新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这一业绩必将永载史册。

培养民族干部，增进民族团结

新疆是个少数民族区域，解放前仅有“三区”很少的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加之进疆干部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解放初期，党中央、新疆分局及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培养地方少数民族干部，把培养地方少数民族干部与民族团结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放到党的议事日程上。

解放后，除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参加政府工作外，还办起中共新疆分局干部学校，各地也办起干部训练班，招收了许多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分期分批学习全国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民族、宗教政策、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等，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随着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分期分批把结业的学员派往各地乡村参加工作，在斗争实践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锻炼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其中表现出色的、优秀的同志介绍他们入党、入团，从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连解放初期从各种运动中涌现和提拔起来的本地民族干部约三万多名，参加了各种工作。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在中央工作的司马义·艾买提等许多领导干部，就是那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锻炼出来的。

为了便于工作，增进干部之间的团结，提倡汉族干部学当地维吾尔族语言，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愈到下层愈要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实践证明，这是增进各民族干部之间团结、友谊，做好工作的重要途径。只要彼此间能以对方民族的语言说几句日常用的话，互相间就感到特别的高兴和亲热。1953年，我们新疆分局几位负责同志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新疆工作，结束时，毛主席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当地维吾尔族语言。并指出这是密切联系当地民族干部、群众和做好工作的一件大事，希望三年学会，以后到他那里汇报工作时，用维吾尔族的语言讲。毛主席的指示，对促进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族语言起了很大作用。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在干部团结方面，各级党委从新疆各民族干部的思想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重视进行经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又防止和克服干部中的民族主义倾向，随时发现，及时纠正。解放初期，先后在干部中普遍进行了两次批判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1951年曾对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中表现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进行了一次批判，1952年又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从团结教育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教育的目的，效果良好，增强了干部的相互信任和团结，提高了各民族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积极性。与此同时，在许多部门和团体中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经过进行上述的各项重要工作，不仅使新疆各族广大人民群众解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压迫，而且从当地封建阶级经济剥削下翻了身。同时，为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发展生产建设与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之所以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显然是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党、政、军、干部团结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这里应当看到，王震同志从中起了重大作用。特别在部队进军新疆“屯垦戍边”，恢复和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促进边疆经济建设方面尽了最大的力量，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继承和发扬王震同志那种艰苦创业、建设祖国边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

早期边区工会工作回忆

工会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在组织领导工人群众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斗争中，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陕甘宁边区工会工作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虽然那时我曾经管过一个时期的群众团体工作，主要是青年团和妇联方面，没有或很少接触工会工作，和做这项工作的同志联系也很少，因此只能谈一点我所知道的简单的情况。

1932年末到1935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许多地方处于土地革命战争环境，那时边区没有几个城镇，党的一切工作的重点都在农村。当时的工人队伍，主要是农村的雇工和铁、木、瓦、石、毡匠等分散的小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等。工会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领导机构，工会的工作是由各级党组织来领导的，在基层建立的雇工小组等多是在农民协会里。工会工作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工人组织发动起来，与广大农民群众一起，积极参加反对地主、富农的封建压迫剥削，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有些地区吸收铁匠、木匠，为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修枪和制作“独角牛”（即“折腰子”）、单圈步枪及大刀、长矛等武器。记得1933年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薛家寨搞了一个小工厂，那时候叫修械所，不仅从当地吸收工人，而且通过白区党的组织关系从西安兵工厂动员了惠子俊、桂生芳两名工人（都是可靠的共产党员）前来参加指导，使这个小修械所既能修枪又能翻装子弹，搞底火，造地雷，用铜钱制造麻辫炸弹。这种炸弹形状像个洋烟壳，后边拴一条麻辫，摔得很远，一投出去就爆炸，威力蛮大，很受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欢迎。我还在耀县作地下工作期间，惠、桂两人进出照金根据地时，曾住在我家，并通过我们派往照金根据地的秘密交通员，经常为这个小工厂购买火药、制造炸弹的硫磺之类的所需物品。

工会工作的另一个任务，也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动员雇工、工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在红军、游击队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好些人是雇工、放牛娃、放羊娃。他们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作战非常勇敢，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打击消灭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像照金根据地薛家寨修械厂的数十名工人，在两次敌人“围剿”和包围炮击下，拿起武器，与寨上一部分游击队武装并肩战斗，不怕牺牲，顽强抵抗，打退敌人多次冲击，给敌人很大杀伤，对保卫陕甘边区领导机关人员的转移，起了一定作用，随后有些工人参加了部队。

由于许多雇工和工人出身的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提高，有好些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作重要工作。如惠子俊以后就作了陕甘边特委、西北工委的主要负责人，桂生芳成了军事指挥员，后来任大连警备区副政委。陕甘边和陕北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各级政府中的主席、副主席以及部队指挥员，有好些是由雇农、雇牧（放牛娃、放羊娃）出身的同志担任的。

党中央、毛主席 1935 年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后，直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地区扩大了，有了许多县城和镇子。这个时期的工人队伍除上述成分外，又增加了人数较多的手工业作坊工人和许多商店店员。同时，为了部队供给的需要和克服边区的财政困难，保证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曾在陕北瓦窑堡及保安等地搞了军工厂、印刷厂，并由干部家属、军属和许多市民一起搞了被服厂、鞋袜厂，为红军干部战士做鞋缝衣，以供军需。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到了延安后，又建立了“抗属工业社”、“难民工厂”、皮革厂、炼铁厂、肥皂厂等许多个厂子，恢复了旧日的延长石油厂和三边地区的苟池等盐场，部队也搞了军工后勤等工厂，工人队伍大大增加了。从 1935 年后半年起，各级工会组织在陕甘宁边区党委、西北局和中央领导下，先后成立。至 1937 年，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县、区，都相继筹建了工会，并成立了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历任总工会主席的有高长久、刘长胜、毛齐华、肖彩峰等同志。工会当时除了建立健全本身的组织外，主要任务是宣传组织工人一致反对内战，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动员雇工、工人参加红军、八路军，改善工人生活，提拔培养工会工作干部，实行雇工要求纲领，等等。

在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下，陕甘宁边区的工人和工会做了很多的工作，在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支援抗日前线和克服经济困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在川口建立的那个几百工人的难民工厂，主要生产纺织比较粗的棉布与羊毛线毯，颜色都是用沉淀的草木灰染的。当时许多地方干部和一些地方部队都穿这样的灰土布制服，用这样的毯子。那时工作、生活很艰苦，但觉得穿着我们自己生产的服装、用自己工厂出的毯子很舒适、很光荣。难民工厂的工人除吸收一部分抗战中的难民和当地工人外，还从部队中调去一些曾在外地当过纺织工人的同志。吴生秀同志当过这个厂的厂长。在桥儿沟河南沿罗家坪办的“抗属工业社”，实际上是个被服厂，为部队及地方干部做衣服、鞋袜。大砭沟的铁厂每次能炼一吨半灰生铁，用来造枪、造炸弹等。三边的盐场生产大量食盐，有代价的动员群众的牲口驮到边界上，为我们换回大量布匹、棉花和所需物品。有的部队也办起了纺织等厂，如三五九旅还能用羊毛纺粗呢子线做呢子服。当时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许多领导同志，高兴的穿上了三五九旅送的呢子服。另外部队后勤部门还办起许多军工厂、机械厂。这对发展边区生产，保障供给，解决了很大问题。

总之，这个时期陕甘宁边区各级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人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动员工人参军参战，生产了许多军民用品，对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渡过经济困难，保卫边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难忘的一次行军宿营

1934年初春，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冒着刺骨的严寒，从甘肃的合水、庆阳等地转战到陕西渭北三原一带。一天，部队在三原武字区歼灭了一部分反动民团之后，即向北转移，黄昏时来到耀县西塬的南、北移村。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很疲劳了，因此，决定就在这里宿营。

南、北移村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两个村庄。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农民群众住的多是土窑洞，耕种的都是旱地，吃的主要是麦子、谷子及其他杂粮，人、畜饮水全靠村边各家收打庄稼的谷场雨天收存的窖水维持（空闲时也是各家积肥之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加之许多群众深受地主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对我工农红军怀有深厚的情谊。当他们听说是红军的部队来了，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热情地帮助部队腾房、打水、做饭和搞草搞料等，使干部、战士得以及时休息，大家都非常高兴。

据侦察，当时部队宿营地周围的敌情是：距南、北移村西北约五里的小蚯蚓镇，驻扎着柴子发民团一百余人，东南六十里的耀县城内驻敌一个正规营和雷天一的民团。为了保证部队安全宿营，刘志丹等同志对敌情作了详细的了解和分析，判断小蚯蚓民团不敢轻举妄动；耀县县城的敌军很可能在第二天拂晓，前来袭击我们。遂命令各团连队加强警戒，严密封锁消息，严加防范，并决定部队半夜吃饭，鸡叫时集合，待命出发。

那时我任红三团二连的政治指导员，与共同进行英勇战斗、一心一意为革命的战友陈学鼎连长及连部勤杂人员一起住在北移村偏北的东沟畔一家农民的窑洞。按照师部的指示我们连部的人员于半夜后即吃了饭。这时我觉得时间还早，打算在出发前先去解个大手，然后再看看各排的情况，故未向连部的其他同志打个招呼，独自一人向村边走去。

这天夜晚，乌云密布，没有一点星光，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我明知道连部有个手电筒，为避免暴露目标，就没有带它，只好小心翼翼地绕过小巷，走进村边靠路旁的一个场里。漆黑夜间，辨不清那个是粪堆，那个是水窖，模模糊糊，望见前面有个黑点，心想可能是粪堆，但心中有点不踏实，又怕搞错了对部队影响不好，于是迈步向上试踩，猛觉得身子向下一坠，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我慢慢地清醒过来，但迷迷糊糊地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自己身在何处？伸手去摸，觉得地上湿糊糊的，上边有许多的秸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再一摸身上，还穿着从豪绅地主家里没收来的宁夏二毛子皮袄改制的皮大衣，系的皮带上还有手枪。心想这可能是我们部队夜晚去打那个城镇，因不到预定时间，而在野外待命中睡着了吧？！然后又向上一望，看见像个烟筒口那么大的一点微明，怀疑自己是不是躺在那个破窑洞中？这是怎么了？心里感到奇怪，不由得“噫”了一声，从中发出嗡嗡的回音。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掉进老乡的一个两三丈多深的枯水窖里了。身体还好，微觉得腰间有点疼痛，自然要爬上去那是根本不可能。随用手支撑着坐起来，连忙向上大声呼唤，喊了好多声，无人答应。不一会儿，自己又被窖内污浊的空气闷昏了过去。

当我再一次醒来时，心里就比较清楚了，遂又大声呼喊了一阵子，外面仍无人应声。此时此刻，我便心急如焚，思绪万千：先想到的是部队是否已经出发了，他们走时找不到我，一定会认为我开了小差，叛变了革命。再想到的是部队真的已出发了，掉下自己在这里，若被敌人发现，势必当场打死，或带到县城，经审讯后枪杀示众。或许会遇上某个同情革命的农民群众，设法暗里将我放走，使我得以回到队伍中去。总之，想的是很多的。

我正在万分焦急之际，忽然听见上边有人说话，这时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急促地喊了几声，适逢是我连的通讯员陈学长去撤回最后一个哨兵从这里经过。他问我是谁？我说是谁，在什么地方。他听说是我大吃一惊，连忙跑回去，带了两个战士，拿着工具，把我从

枯窖里吊上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就像一块石头着了地。陈学长说，我们的部队都集合起来了，东边来的敌人快要与我们接触了，就是找不见你，大家很着急，赶快走吧！

我只好振作精神，忍着腰部的疼痛尽快去到师部。这时，天色开始有点发亮，刚一进师部的门，就看到志丹和王世泰（我红三团团长）伫立在那里等我，有点很着急的样子。他俩一见到我，志丹劈头就问：“你到哪儿去了？派了很多人去找，就是找不到！”我三言两语将自己发生的事报告了一下。他听后有风趣地说：“你倒解手解的深，跑到井里解去了。摔得不要紧吧？”我说：“没事。”世泰接着说：“快去招呼你们连出发吧！”我回头就走。当到本连队时，自然大家都特别高兴。而我红四十二师的先头部队骑兵团已开始行动，相继向淳化方里镇方向进发。途中，骑兵团与另外一部分敌人遭遇，打了一阵子。因情况不明，便撤出战斗，转入淳化以北，执行新的任务。

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令人难忘的是，那时我的年纪很轻，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具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虽然腰部当时受了点伤，若无其事，满不在乎，在战争环境下，骑了几天马就好了。那时，给我感受最深的则是部队中同志们的阶级友爱关系和团结奋战的革命精神，把大家紧紧的凝聚在一起，起了莫大作用。在我出事的那天夜晚，如果没有许多同志的友爱和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及耐心等待，早撤最后那个哨兵，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里也有自己值得记取的地方，那就是腰伤愈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从未加以考虑。于是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情况的变化，旧伤又慢慢复发了，成为现在的后遗症，影响正常行走。特别是这多年来，病症逐渐加重，给行动上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我认为，这和自己过去以及其他同志身负其他枪伤一样，是长期革命战争中难以避免的，这也是迄今难以忘怀的战争年代给留下的一个印记！

中央党校学习与成立陕甘省

1936年，我们关中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团，为执行党中央西征任务，在国民党东北军严重“围剿”下，从关中特区撤出，于6月底前后兼程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我任关中红军政治部主任，不多日部队进行改编。陕西省委郭洪涛要我去东地区主持工作，我觉得这倒是个进党校学习难得的好机会。遂通过贾拓夫同志联系，见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同志，经两次面谈，才欣然同意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也是我入党后的第一次学习，自然非常高兴。于是交代了一下工作，便整装前往党校驻地。

当时正值红军主力部队西进，瓦窑堡就成为国民党中央军高桂滋八十四师和高双成二十二军八十六师进攻的重要目标。为安全起见，党中央决定各直属机关向保安县（当时的赤安县）转移。我尚未来得及进校门，党校的人员就列队出发了，几乎每人都有一个武器，不是枪，就是梭镖或马刀，我即跟着前进。这时我还有一匹骑马，途中特地去看一家老百姓家里，看了离开两年身受重伤数月未愈的战友王世泰同志（老红三团团团长）。经过两天的行军，同大家一起到达保安县城以北十余里路的一个山沟里的任家坪、刘坪等村，也就是党校新的驻地。

全校有学员约四五百人。绝大多数是陕北苏区县、区、乡领导干部和红军东征中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以及一部分中央长征的同志和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共分四五个普通班（内有白区工作班）和一个高级班。校长董必武，教务主任兼高级班班主任成仿吾，罗迈代中央分管党校工作。

为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学习主要内容为：如何进行建党、建立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革命组织；开展对敌武装斗争与白区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政策。在高级班，我们一起学习的有三四十人，多是县、团以上的同志和党校普通班的班主

任，如李景膺、白栋才、杨一木等同志。由罗迈同志担任讲授党的建设，成仿吾同志担任讲授社会发展简史，吴亮平同志担任讲授苏维埃政权建设，张云逸同志担任讲授游击战争。他们讲课都很认真负责，特别是罗迈同志对学员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并力求理论联系实际。记得一次，他讲完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后，要大家对民主伸缩性的问题举例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伸？什么情况下可以缩？伸至什么程度？缩至什么程度？结果无一个能确切的回答出来。他紧锁眉头，非常的生气，批评同志们不动脑筋，随即又作了明确、生动的解答，使大家恍然大悟。他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感人至深，至今不忘。

党校的生活、学习都很艰苦。保安县，原来就是个贫困地方，虽然从 1933 年以后，许多地方成为革命根据地，但经常处于敌人的“围剿”破坏下。因此，食、住等特别困难，吃的多是些既粗糙又陈旧甚至发霉的米，菜则是少量的土豆和野菜，没有油。两个多月，我们高级班全班人才买得吃了只羊，还是煮不烂、嚼不动的老公羊。大家感到，好容易改善一次伙食，而却不得口福，有点可惜。记得学员中有一位东征新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下吃不了党校生活的苦，便在墙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住在任家坪，苦菜自己寻。东西南北风，肚里闹天宫。”校领导发现后，曾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就像我这个对那里比较熟悉而又经受过一定艰苦锻炼的人，也觉得生活很苦。逢礼拜天，如有空闲时间能到保安城里刘志丹同志夫人刘嫂子家中，吃一顿荞麦面饼或其他杂粮面，就很高兴了。

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讲课多在室外空地上。一到上课时，你拿一块砖，他拿一块破木板或几个人搬根木条，席地而坐，主要是听讲，用心记，没有教材。虽然每人也有一个自作的笔记本，很少有人用。特别印象深的，是成仿吾同志在讲社会发展简史时，每讲到学员难懂的问题，便用他身边放的一根小木棍子在地上划写一下，使人大有天作课堂、地作纸，树枝作笔、任你学之感。生活是艰苦的，而大家学习的情绪高涨，精神饱满。

党校在这里待了约三个来月，吃、住、烧等更加困难了。适逢我军收复了定边、盐池等县，遂将校址转移到定边县城内。这里地处古长城脚下，与内蒙古接壤，风沙很大，昼夜温差较大，一片塞外的景象。党校又增加了一部分四方面军来的学员，其中有好些女同志，住、吃等不成问题，可以吃到黄米（秫谷碾的）、炒面和少量的羊肉，生活较前得到改善，客观上对学习有很大帮助。记得当时从天津新来了一位大学生钱维人同志，是个党员，也很有学问（全国解放后曾在国务院交通部任局长），同我们一起在高级班学习，吃的对他很不适应，有些学员出于照顾之心，还帮他从小街上买点好吃的。当时也搞点文艺活动，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红一方面军剧团演出的活报剧，听到蒙、藏、彝民族同志的歌声。许多情况比保安好多了，就是烧柴十分困难，所以各班学员几乎每礼拜抽出一天时间，集体去十多里以外的沙丘上拔沙蒿，各人一大捆背回当柴烧。好些同志尽管手上打起了泡，一时腰疼腿酸，有点疲劳，但心情舒畅。

到了 11 月间，此地已是寒风凛凛，大雪纷纷。为了御寒，学校给我们许多人发了个羊毛絮的被子，盖在身上觉得暖烘烘的。这时，正是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准备进驻这一地区休整，急需筹备粮、草。为完成这一任务，在罗迈同志（已被任命为三边工委书记）直接领导下，动员党校一大批学员，分组去农村协助进行筹粮工作。我当时带领一个小组到盐池县以北伸进沙漠里的一个村庄里，经过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从两家地主、富农家中，就搞出埋藏在沙子里存放多年的粮食二十多石，超过了预定的分配任务。由于这一地区收复不多时，土匪尚未肃清，很不安全，夜间只能在村外找个避风的地方露宿，以防匪徒袭击。铺着很厚的秸秆，盖的被子已不是刚发时那样了，不仅羊毛向外钻，而且被子里边成了一团一团的疙瘩，好些地方成了空心，盖在身上不起作用，冷得要命，一夜两腿蜷曲一起。同志们风趣地说：你这官当得好，白天是组长，夜晚是“团长”。因而曾有几天患了感冒，也没吃药，抗了一下就好了。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特别是学习“党建”、“社会发展简史”，增强了我对党的认识，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从而进一步热爱党，更加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增加了无穷的力量。

12月的一天，忽然从学校里传来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令人异常高兴，有的人将信将疑。于是你传我，我传你，议论纷纷。好多人都说这一下对了，蒋介石这个坏东西早该枪毙啦！

接着党校大批同志，由罗迈同志亲自率领去保安。中途罗迈同志因有事去了别处，而大家一路的情绪非常高涨，奋力前进。特别是许多女同志也无一人掉队。到达保安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先后聆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当前形势、任务、工作的报告。当时毛主席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高大的个子，头发留的很长，脸显得有点消瘦，穿着一件新做的没面子的羊皮大衣，讲话铿锵有力，神采奕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旺盛的革命激情，是多么高涨啊！

这时，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等同志代表党中央在西安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围剿”陕甘宁苏区的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已向西安等地撤退。我红军主力部队也进驻渭河以北的淳化、铜川、耀县、三原、富平、蒲城一带，予以声援。

为适应这一新的革命形势，于12月下旬成立了陕甘省，领导机关暂住甘泉下寺湾。分配去这一地区工作的干部，很快经安塞、延安到达指定地点。省委由罗迈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曹德茂任组织部副部长，李生华任宣传部长，杨一木任统战部长，申力生任秘书长，刘景范任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霍维德任政府副主席，张仲良任军事部副部长，刘景儒任妇女主任，白向银任团省委书记，黄静波任

团省委宣传部长。主要任务，在延安和延长以南许多县以及关中特区，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发展群众性的“抗敌救援会”，与国民党政府、民团等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相机建立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和武装，准备向南发展。

在罗迈同志的领导下，对各项工作作了部署以后，于1937年初由他和我一起率两支游击队，翻越了桥山，经过几处民团驻地，顺利地到达了关中特区机关所在地——淳耀县桃渠河。特委书记习仲勋见我俩都是很熟悉的同志，非常的高兴。在这里待的时间比较长，着重同特委、红军总政治部商讨，在一定情况下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并由习仲勋同志对本地区的主要工作和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情况和问题，作了比较翔实的汇报。尔后用了好些天的时间，同特委一些同志一起进行研究。在研讨中也涉及到陕北肃反的问题和如何对待白区党员失掉组织关系、自首、叛变的问题，间或也提到中央红军长征和爬雪山、过草地的情形。罗迈同志对当前工作和要解决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罗迈同志曾和张策同志（特委宣传部长）去淳化县城见了红军前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得知当时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而国内和平局势尚不稳定的情况，仍商定向南发展。返回后又同特委作了具体研究。当已起程返回省委时，忽接中央给罗迈同志的电报，指示和平大局已定，省委可以结束。实则是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经过双方多次谈判，国民党不得不在原则上承认。于是我们又按照新情况，同特委领导同志作了工作布置，从而关中特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返回途中，还了解了关中特区所辖新正、新宁县（即现在甘肃的正宁县、宁县）的工作情况，遂经过建庄川回到省委新址宜君县七里镇（后来划归黄陵县，即过去的中部县），这里还设有我军的办事处。随即根据罗迈同志安排，检查了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纠正了存在的缺点，要求进一步做好富县、甘泉、固林、中宜县等国民党政府、民团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抓紧建立各级“抗敌救援会”（带政权性

质和党的组织),增强我之力量。这一工作进行了检查部署后,于 1937 年 3 月间,撤销了陕甘省。

回忆中央派代表去神府特区

1936年西安事变后，我党在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下，经过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驻在西北革命地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的战争，随之平息下来。

1937年春，由于神府根据地远离中央，通讯联络困难，尽管从俘虏军官口中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但对当时党的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不大了解，仍打到榆林地区，与驻在当地的国民党高双成的八十六师和高桂滋的八十四师等军队发生战斗。对此，在西安的国民党向我方代表提出抗议，说神府红军不停战。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搞好双方关系，经周恩来副主席向国民党提议，由我党中央派代表去神府根据地，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中央对神府特区当前工作的指示，并带去一部电台和几位领导干部。当时确定吴溉之和我为中央代表，其他人员有王补、李登瀛、强晓初等领导干部和电台队长、报务员、译电员、警卫员、饲养员等，共约十四五人，骡马三四匹。

我们约于1937年4月底前后从延安出发，经一个星期左右到达目的地。临行前，为安全起见，由红军后方留守兵团，将我们的人员等情况，用电报专门通知驻在安定、绥德、米脂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和在佳县等地的阎锡山二〇九旅段树华部，沿途予以照顾。当我们经过蟠龙，进入八十四师警戒线时，他们好像还未接到通知，让我们停下，查看了所带的介绍信，询问了一下我们的情况。不一会儿，师部派来一名副官和两名士兵接我们，并经安定的瓦窑堡、绥德、米脂，一直送到佳县乌龙铺二〇九旅的防区。然后，晋军又派人经佳县送到万户峪，使我们顺利到达了神府根据地。

他们在沿途护送我们的过程中，一般很客气，并表示友好，路上的住处也是他们安排的。在途经八十四师师部所在地绥德和二〇九旅旅部所在地佳县时，高桂滋师长、段树华旅长都亲自请我们吃了饭、

洗了澡。记得高桂滋在请吃饭时，还让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杨璞来作陪，因为我们早知他成了叛徒，所以根本没理他，吃完就走了。

像我们这样一批人，第一次来到国民党军队驻地，沿途引起许多群众的注意。当时我们都穿红军军装，带着八角五星帽，经过每一个城镇时，总有许多人来到面前和跟在后头，带着新奇和喜悦的目光注视我们，好像要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我们到佳县的当晚 12 点左右，许多同志都睡了，忽然一位放内部哨的同志报告我（为防止意外，我们每晚都有自己的同志放内部哨），有个二〇九旅的士兵要见我们的负责人，使大家吃了一惊，但又不好不见，就让他进来。听他说，他是个团员（也可能是党员，记不清了），山西人，现在某连当上士文书，要求跟我们一起走，或介绍他去延安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让他同我们一起走的，只能向他说明当时的革命形势，动员他回太原家乡找党的关系，进行抗日活动。这件事时过境迁，早已忘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哪个组织来函，让我证明此事，经反复回忆，确有其事，遂写下证明，但仍不知那人究竟是谁。后来从一个熟人口中才得知，他是曾在二机部当副部长的雷荣天。

在我们到达神府根据地时，当地的党政军和人民群众非常高兴，并在特委所在地贺家川召开了欢迎大会。接着，特委又召开干部会议，由吴溉之和我分别传达了中央统一战线新精神，即我党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建议，以及对神府特区当前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正确认识形势，加强抗日宣传，与周围的国民党军队搞好统一战线关系，训练部队，准备打仗，从而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当时的工作方针。随后，我们又分头到下面一部分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工作，深感当地的环境尽管艰苦，但党群基础好，干部情绪高，工作比较扎实，游击战打得好。当时，张秀山担任特委书记，杨和亭、武开章、毛凤翔、刘长亮、张江全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统战、民运等部长，乔钟灵任特区政府主席，王兆相、王宝珊同志分别任独立师师长和政委，杨文谟、李治洲、王国昌、王恩惠分别任正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秘书长，刘瑞兰、温桂亭负责做妇女工作。

此次我们去神府根据地工作，连同往返路途共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于6月上旬返回延安。到神府的时候，那里的同志虽然已开始主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但还有小冲突。回来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将自己的工作和在神府了解的情况，向中央有关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后，表示满意。从此，神府根据地不仅能用电台同中央保持联系，而且也可以持介绍信通过国民党军队的驻地，往返于延安和神府之间，对神府根据地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中央电示神府党派五名代表，到延安参加5月中央苏区党代表会议，就是通过我们带去的电台得到通知派人参加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党我军这时已开始同周围国民党的军队、政府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回忆王泰吉同志

泰吉同志牺牲，距今整整五十年了。漫长的岁月，使得我们这些当年的黑发青年，早已经鬓发染霜。时间使人们对许多往事渐渐淡漠了、忘记了，然而泰吉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且好像历时愈久，愈加清晰。

我第一次见到泰吉是 1933 年夏初。那时，我是中共耀县县委书记，耀县党组织还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有一天，我在县城街上见到一个年轻的军官，身后跟着四五个身背驳壳枪的护兵。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驻扎在这里不久的杨虎城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沉着持重，很有点派头的国民党军官。

这年 6 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以后叛变）来到耀县，召开县委会议，讲了王泰吉准备起义，并且专门介绍了他的历史和起义的原因，要我们耀县县委密切配合。从此，我才知道泰吉原来是个共产党员，他幼年勤奋好学，很早就参加革命，进过黄埔军校，先后参与领导了麟游、渭华起义。在“九一八”事变，日寇占我东北，继续南侵华北，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和冯玉祥在察哈尔建立抗日同盟军及红军的影响，决定率部起义。这些情况令我非常高兴，从而也使我感到他是一个有志向、有抱负，要为人民做一番事业的人。于是，我们一面严守秘密，一面积极配合准备，等待起义的到来。

1933 年 7 月 21 日中午，一阵嘹亮的号声打破县城沉闷的空气，王泰吉骑兵团宣告起义了，打出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耀县城顿时变了样子，到处贴满抗日救国的标语，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起义部队立即收缴了雷天一民团和胡三保安团的武装，释放了监狱中关押的全部犯人，通电全国，发表宣言，并在中共耀县党组织的配合下，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接着，没收、分配了伪县政府、官商囤积的粮食和全县有名的雷、段两家大地主的财物，逮

捕了一批反动分子，并在县政府西边大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将镇压农民革命斗争的南区区长张恒义当场枪毙，人心为之大快。这时，我们县委和张仲良、陈学鼎、陈国栋等同志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乘泰吉同志率部起义的机会，立即组成了耀县游击队，积极配合进行活动。处死了全县有名的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没收分配了他家的财物，烧毁了全部土地、债务契约；活捉并处死了孙家源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兵痞流氓张廉明；还将自家庄一个姓周的地主富农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起义后第三、四天的一个晚上，泰吉忽然派人请我到 he 那里。他当时住在旧县政府里。见面刚坐下，他就问我：“你是这个县上的人吧，你和雷天一熟吗？这个人怎样？你给他说过打红旗的话吗？”我说：“过去我在雷天一所在的部队做过兵运工作，和他比较熟悉。曾经向他讲过革命的形势和革命道理，希望他也能打红旗、干革命。但雷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圆滑、看风使舵、向上爬的人，当时他既不加害我们，也根本不想革命。记得有次我向他提到打红旗时，他推托说：‘这当然很好，但我们力量很小，现在只能借他人之力，养我之羽毛，待将来羽毛丰满再说。’”泰吉听我说到这里，有些不大自然的样子，他告诉我，在他们收缴雷天一民团的枪后，雷即找来说，他也要参加抗日救国义举，并说：“张邦英过去就同我讲过打红旗的事，现在到我们一起打红旗的时候了。”因此，泰吉就将收缴雷的二三百支枪全部退回，并委任他为第一路总指挥，派去打王茂臣反动民团，已经出去几天了，还不见有什么动静。泰吉问我：“你看他能否回来？”我说：“根据这个人的一贯表现，出去后肯定是不会回来的。”这时，泰吉用手在桌子上轻轻拍了一下，后悔地说：“糟糕了！”果不其然，雷带他的民团一出城就驻在西源稠桑，按兵不动，实际上对起义部队起了很大瓦解作用。从这里，固然看出年轻的泰吉同志在狡猾的敌人面前失去必要的警惕，但也可以看出他信任党的同志和急于发展革命力量的迫切心情。

起义七天后，为了扩大抗日的政治影响，起义部队在泰吉的率领下，主动撤离耀县向南行动。途经三原心、武红色根据地时，受到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在陵前镇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使起义部队受到很大鼓舞。但是，由于起义部队本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和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当部队进抵鲁桥镇辘轳把村时，与敌孙友仁特务团等部队相遇，战斗失利，随即向北撤退，退至耀县小蚯蚓镇时，又遭敌追击。这时，起义部队或逃或降或被歼，受到严重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泰吉同志并不气馁，依然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迅速转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仅休息一二日，即和陕甘边党政军一部分负责同志，利用起义部队带来的迫击炮，从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及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指挥的当地部队中调了一部分力量，配合一起，去打照金后沟寨子的张彦宁民团。

后沟寨子的地形十分险要，上面是高山，下面是石崖，在离地面几丈高的石壁上打的石洞，外面垒了寨墙，易守难攻；寨里囤积着粮食，还有泉水，是敌人一个坚固的据点。在我们用迫击炮轰击时，泰吉同志帽子也不戴，白衬衣束在军裤里，站在迫击炮的旁边指挥，时而命令炮手打炮，时而命令战士往寨子里扔土炸弹，斗志昂扬，满怀乐观情绪和胜利信心。寨子里的民团是些土豪劣绅的武装，也无多大战斗力，早被我们的炮火吓得胆战心惊，加之许多人伤亡，不得已只好打开寨门，乖乖地投降。第二天中午，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一面动员老百姓到寨子里分粮食。突然，孙友仁特务团袭来，很快占领了照金和坟滩之间的山地，我们随即出动部队前去阻击。敌人从山上用机枪向我们扫射，我们利用山下树林作隐蔽进行还击，一直坚持到夜晚才退出，第二天转到薛家寨。在这次战斗中，义勇军虽然又受到一些损失，但仍未挫伤泰吉同志的革命意志。

此后，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习仲勋等同志的努力下，在陈家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从三原革命根据地撤出的由黄子祥、杨森带领的红四团，泰吉同志为总指挥（以后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他又一度任师长)，高岗为政委，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在陕甘边区桥山周围许多地区，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泰吉同志在甘肃庆阳毛家沟门的战斗中，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当时，陇东敌人赵文治团八百余人，配合一部分骑兵，分几路向我驻地扑来。我军且战且退，敌人步步紧逼，情况十分危急。泰吉同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机智灵活地指挥、督战，组织部队进行反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使我军转危为安。这一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挫伤了敌人的锐气，受到了大家的称赞。

在当时的武装斗争中，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革命根据地也正在创建，我们的部队经常处于行军作战的状态，不是我们去打敌人，就是敌人来打我们，生活非常艰苦。常常是碰到什么吃什么，小米、包谷和山洋芋成了我们主要的食品，吃麦面的时候很少。有时因为特殊情况，一天也吃不上饭。因此，战士都得背干粮袋，带一部分吃的，以应急需。泰吉也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与困难作斗争。记得在一次长途行军中，部队翻了几条沟，来到一个半山坡上休息，泰吉同志和战士们坐在一起。这时，他穿的衣服“脏麻咕咚”，脸因为经常顾不得洗，挂着道道汗迹，胡子也长得老长，与起义前判若两人。战斗的环境，使他成为一个饱经战争风霜、艰苦奋斗的革命者。他休息了一会儿，望着坐在周围的战士说：“哪位同志带干粮着哩？”这话刚一出口，许多战士就很高兴地抢着把自己带的干粮送给他吃。这说明那时的官兵关系是多么融洽！

由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经常行军打仗，部队非常疲劳。因此，一部分战士产生了平均主义思想，对骑马的同志有点不满意，在下边说怪话。为了纠正这种思想倾向，泰吉同志不是用简单的批评，而是用说笑话、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说服教育。在一次部队行动前的集合讲话时，他先讲道：“有一个人，在路上走，走得很疲乏了，心里便抱怨骑马的人。忽然前面遇到一个老爷庙，他便进去跪在神前，叩头作揖，嘴里说：‘爷呀爷呀，你为何不显个灵，叫他死了，把马给我骑呢？’这不是笑话吗？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接着说：“我们的部

队是有编制的，有步兵、有骑兵，有领导、有战士。骑兵和一些领导要骑马，步兵战士要走路，这是工作的需要，分工的不同。不能大家都骑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如果大家一定要平均的话，那只好把马宰了，每人分一块马肉。”他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这对克服战士的平均主义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4年1月，部队在行动中听说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到了豫陕边境。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泰吉同志想利用他过去在旧军队中的人事关系前去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出去放一把火”。经师党委研究，同意了他的意见。当部队再一次南下到达淳化强家山时，泰吉便同一个警卫员携带手枪两支，骑骡两匹，带了一些旅费，在一天夜里由我少数骑兵护送，去到通润镇他原来的老部下、伪淳化县三区民团团总马云从处，以便在活动中取得他的支持。不料被马出卖。1934年3月3日，泰吉同志在西安从容就义，年仅二十八岁！

泰吉同志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先后三次领导和参加武装起义，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泰吉同志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刘志丹同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①

刘志丹同志牺牲整整五十年了，虽然他与我们永别多年，但他的形象和业绩，仍时常闪现在我的眼前，铭刻在心中，永远不会忘记。

志丹出生在陕西保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上中学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他到黄埔军校学习，不久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参加领导了渭华暴动，以后领导了创建陕甘边、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抗日东征等。他艰苦奋斗十余年，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我党久经革命锻炼，胜不骄，败不馁，多谋善断，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共产主义坚强战士，是深受西北人民群众爱戴的领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早在1931年，我就知道了志丹同志。那时，我正在陕西讨逆军部队的一个营里搞兵运，听说志丹在陕甘边打起红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深深受到鼓舞，曾两次准备拉出一部分人、枪去他那里，皆因领导上考虑距离太远、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

1933年8月，当耀县党在王泰吉耀县起义时搞起的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与抗日义勇军、红四团，在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打开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胜利返回照金根据地的时候，正值阴历八月十五，恰巧志丹等同志这天也从终南山辗转回到这里，大家相见分外高兴。由于我是头一次见到志丹，心情格外激动。他的回来，使我们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更加充满了胜利的信心！特委遂即任命他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从此，我在志丹等同志的指挥和边特委的领导下，同大家一起战斗，度过了几个艰苦的春秋。在这期间，志丹同志的思想、品德和军事指挥等才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适时总结斗争经验打开新局面

陕甘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曾经历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战和流血牺牲，既取得了许多胜利，也遭受过不少挫折和失败。对于这些，志丹同志一向是非常重视的。

1933年夏，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执行“左”倾路线，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志丹等同志的反对，迫使红二十六军二团脱离照金革命根据地南下渭华地区“开辟新苏区”，致使这支年轻的革命武装在终南山遭受失败。之后不久，当重新成立的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主力部队取得张洪镇战斗胜利转而攻打合水县城时，敌人乘机集中一个团兵力和民团数千人“围剿”我照金根据地，使照金失守。面临这种情况，我主力部队在攻克合水县城，打了庆阳三十里铺、城壕川、毛家沟门等战斗，消灭了许多敌人，加强了部队力量之后，于11月间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根据志丹同志的意见，重新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并认真总结了以往作战的经验，特别是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邻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即所谓“狡兔三窟”，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的余地，积极地配合各地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遂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招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并相应组建三个游击队指挥部，以当时随主力部队一起行动、战斗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为第一路，陇东为第二路，关中为第三路。此后，除第一路游击队遭到大的挫折外，第二、三路地区的游击队在红军主力的大力帮助下，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地日益扩大，许多县以上的革命政权相继建立，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运用毛主席战术思想指挥部队作战

在当时敌大我小，双方力量特别悬殊，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经常遭到敌人“围剿”的情况下，志丹同志运用毛主席战术思想，指挥部队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其不意，攻其不备，诱而歼之，以计取之，夜间长途奔袭，主动灵活地打击消灭敌人。

1933年秋至1934年7月间，我主力红军先后打开合水县城、黄堡寨子等几个城镇，进行了毛家沟门、葡萄沟口、马子川反击战和杨家店子、西华池、三里塬等歼灭战，打破了敌人多次对我部队的围追堵截和对根据地的“围剿”，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其中西华池战斗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记得在1934年4月间，我军由耀县向北连续打了瑶曲、店头、五雷镇、无城子、李家梁等地的敌人后，遂配合二路游击队进至合水县城，装出要打的样子，以调动庆阳之敌，乘机夺取庆阳县城。庆阳之敌闻讯即派团长王子义带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赶来增援。这时我军已向西南方向转移，敌随后尾追，两军在西华池相遇。在此情况下，时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志丹同志，当即抓住战机，乘敌立足未定，迅速指挥骑、步兵从三面包围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仅一个多小时，便将敌全歼，缴获枪、炮、弹药、骡马甚多。广大指战员们欢欣鼓舞，无不交口称赞志丹同志用兵巧妙，指挥有方。

利用各种关系建立统一战线

为便于发展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志丹同志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关系和敌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统战工作。他曾通过当地的“哥老会”（旧社会秘密结社组织）、旧同事、老熟人等，先后与庙湾的夏老么、建庄的贺世兴、小石崖的罗连城、蒿咀铺的贾生才、太白镇的李绪增等民团首领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建立联系。我不打他，他也不打我，我们将缴获的大洋、烟土、牲口等送一些给他们，他们帮我们购买些子弹、医药，掩护伤病员，探听敌情，允许我们的部队从他们的驻地周围通过等。这对于便利我军行动，克服某些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

记得1933年冬，我们部队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经过长时间连续作战，许多指战员体力减弱，染上了伤寒病。我在部队于合水附近消灭了惯匪杨谋子数十人后也发起高烧，既无法行走也不能骑马。志丹同志得知我的病情后，利用自己过去的关系给蒿咀铺的民团团总

贾生才写了一封信，通过当地老百姓把我和另外五六名战士介绍到他那里，由他派人暗中将我们安排到深山密林中的一个山窑里，并派人送水送吃的，使我们很快病愈，回到了部队。

密切联系群众与战士同甘共苦

志丹同志是一位非常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在生活上从不特殊，与战士同甘共苦，大家吃啥他吃啥，冬天常穿着没面的羊皮袄，头上扎着“虎包头”式的白毛巾，分不出他是指挥员还是战士。由于工作需要，部队专为他配了马，可他却常让给伤病员，自己很少骑。平时对同志们没有任何架子，平易近人，许多人都不称他的职衔，而亲热地叫他老刘。

每当部队行军到一地宿营时，志丹总是要找当地群众或曾熟识的人谈话，一方面询问周围敌情，另一方面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豪绅、地主压迫剥削和群众生活等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往往部队准备宿营时，他提前就把各团、连的驻地分好了，使部队能很快进入驻地休息。

志丹同志对部队的纪律要求也很严格，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凡是吃了老百姓的米、面等，必须付钱或给大烟土，即使群众不在家，也得将钱留在容易看见的地方。记得部队在打开合水县城后，曾分发给每个指战员三元钱，我把它缝在衣袋里，一个也未用，最后都是在紧急情况下替部队给群众付饭费了。对于群众的东西，一点也不准拿。有次部队驻在正宁县的一个地方，司令部的一个马夫在部队临开走时，拿了群众的一条布腰带，抓了一只鸡，群众随后跑来告状，志丹同志于第二天部队行军路过一个村庄时，即召开全体军人公审大会，宣布了这个马夫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并根据他过去一再违反纪律、表现不好的情况，经战士讨论，决定立即予以枪决。

由于志丹同志平时严格要求，使部队能很好地遵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声誉很高。部队开到那里，群众只要听说是刘志丹的队伍来

了，都非常高兴，热情地为部队腾房、做饭，有的还四处打听谁是刘志丹，盼望着见上一面。

以革命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

志丹同志在创建西北红军、根据地中尽心竭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得失，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革命家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品质。

1934年六七月间，陕北军阀井岳秀对陕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围剿”，志丹同志的亲密战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和其他同志率领三支游击队和部分赤卫军南下陕甘边地区，与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会合，并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除谢子长同志以中共北方局代表身份传达了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工作的指示外，着重商讨了如何帮助打破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志丹同志当时担任陕甘边军委主席，尽力支援陕北的革命斗争，当即调给枪一百多支，并确定由子长同志担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率领四十二师三团开赴陕北安定、清涧一带，协同当地游击队、赤卫军打击消灭敌人，从而取得了陕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5年10月，有些同志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思想影响下，在陕北进行了错误的肃反。10月上旬，志丹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并与红二十五军取得崂山、榆林桥胜利后，他奉命去北线，当由洛河川行至安塞途中，偶然从一个送信的通讯员手里发现要逮捕部队许多高、中级指挥员和他本人的名单。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逮捕这样多的同志将会给革命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于是，他临危不惧，毅然骑马赶赴陕甘晋中央局和保卫局所在地瓦窑堡，力图说服当时的负责人予以制止。但是他的努力未能起作用，自己仍被逮捕了。接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同志闻讯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几位同志去做工作，才使志丹等一批革命同志幸免于难。事后，志丹同志未表示

任何不满，而且还说服其他同志要顾全大局，听从中央安排。许多同志都被他这种宽阔的胸怀和坚强的党性原则所深深感动。

1936年春，中央红军进行东征，争取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志丹同志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从北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阻拦。4月中旬，他在指挥部队进攻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这一不幸的消息传到西北许多地区时，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无不感到万分悲痛。志丹同志的牺牲，是革命的一大损失，使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指挥员，使党失去了一位有作为的领导人。

志丹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英雄业绩，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今天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学习他识大体、顾大局，时刻以革命利益为重的高尚思想品质；学习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以激励我们努力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刘志丹同志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①此稿是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五十周年而撰写的。

缅怀欧阳钦同志二三事

欧阳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马列主义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曾同周恩来总理等人一起在法国进行勤工俭学，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党的重要职务，他生前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含冤去世。而他革命的业绩将长留人间，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尤其是我们以往共事多年的战友、深知他的同志，永志不忘。

回想在抗日战争年代的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时，调欧阳钦同志任副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我任组织部副部长，在延安一起相处甚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地区时，欧阳钦同志也奉命前往。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距离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我也早已年过古稀，而欧阳钦同志那种为人忠厚的道德品质，耿直爽朗的性格，热情洋溢的革命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常常浮现在眼帘。记忆犹新的是他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军民团结中，做了许多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没有纸张等用具。为了渡过边区这一经济困难，党中央在1939年2月2日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毛泽东主席生动、形象地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因此，边区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欧阳钦同志作为西北局的副秘书长，在大生产运动中，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按照西北局、边区政府发展生产的指示精神，积极发动、组织西北局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并协助边区一部分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进行生产，着重是开荒种地、纺线、养羊、养猪等，以解决吃饭穿衣的困难。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战士，人人动手。欧阳钦同志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一面尽力同机关同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农作物的耕种、锄草、收割以及纺线等活，他都干，不愿落人后。记得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时，他的身体很不适应，以致在一次生产中，满头大汗，手上打起了泡，但他一声不吭。当大家休息时，提及至此，他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哈哈一笑而已。另一方面，他很注意检查、了解生产情况，研究总结经验，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及时地把机关生产工作推向前进，取得了良好效果。

1937年当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的几年间，虽然陕甘宁边区仍在国民党的大军包围和日寇的威胁下，但基本上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人民群众平时听不到枪声，看不见国民党的包围和日本鬼子对我国其他广大地区老百姓的残酷蹂躏的整个情况，于是一部分人忘记了人民军队同他们之间的切身利益关系，产生了轻视人民军队的思想。加之，长期以来边区处于经济困难，物质供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也有一部分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往往仅看见自己的困难，而意识不到人民军队的困难。把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不去很好地帮助解决。当然，也有某些部队同志对地方、老百姓的困难体会不深，态度生硬。以致军民、军政之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误会、纠纷和互相责备的现象，影响军民的团结。欧阳钦同志很重视这一情况，并在中央和西北局“军民一家人”的精神指导下，经常主动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向有关部门或会上反映，采取适当措施，尽快予以处理。在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开展边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上，欧阳钦同志无形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了拥军决定。不多时，由边区政府、西北局协同中央办公厅和延属地委、专署等组织劳军团，

慰问在南泥湾生产的三五九旅。参加劳军团的边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以林伯渠为团长，成员有西北局欧阳钦和我（当时调任延属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以及边区政府有关厅、局的柳湜和群众团体的高长久等负责同志，还有延属专区曹力如专员，延安、安塞县县长等共二十五六人。由欧阳钦同志任劳军团秘书长，负责劳军团的具体慰问工作。事前，他除积极和有关部门的同志筹集锦旗、书籍、现金和其他慰问品外，还精心安排劳军团的慰问活动日程，抽调民众剧团、秧歌队等文艺团体前去慰问演出。大家对他进行劳军的组织准备工作十分满意。

2月17日，劳军团从延安乘卡车抵南泥湾。19日上午，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林伯渠主席、王震同志、欧阳钦同志和我们劳军团成员一起检阅了南泥湾生产部队。广场上，旌旗飘扬，军号嘹亮，一队队威武雄壮的战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主席台，林伯渠主席向全体指战员讲了话，群情振奋，揭开了拥军序幕。次日，三五九旅又举行了拥政爱民大会，从四五十里以外赶来参加大会的群众络绎不绝，五六千军民汇集在广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把拥军爱民活动推向了高潮，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全边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发展，加强了军民的团结。

在此期间，劳军团的同志们还同南泥湾生产部队一起举行了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等各种座谈会，并察看了田地、工厂、农具等。欧阳钦同志在对三五九旅的战士们讲话时，说：“我们为什么要慰劳你们呢？因为你们是既能打仗、又能生产的模范！”使战士们很受感动。他在短短的几天慰问活动中，不怕疲劳，与一些连队的干部、战士促膝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返回后，撰写了《南泥湾劳军观感》一文，对三五九旅的干部、战士在南泥湾生产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以后部队的生产、军民关系等提出了真知灼见。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于次年冬因调去新疆工作，乘隙到东北参观学习。当时，欧阳钦同志任中共旅大市（今大连市）市委

书记。虽然彼此多年不在一起工作，而革命的情谊却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两人久别重逢，感到特别的高兴。他那热烈之情，溢于言表，真可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这时又遇安子文同志也来参观，欧阳钦同志不仅热情地招待我们，而且亲自陪同我们参观工厂、市容，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了旅大市在日俄占领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况以及现在的工业面貌。继之，又参观了东北其他一些地方。使我这个过去长期在山区进行革命工作的人，大开了眼界，增加了不少工业方面的知识，这是很难得的。

1961年，我在华北局工作。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党中央决定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垦部分荒地，以解决天津市20亿斤吃粮的任务。华北局指定我负责这一工作。在去呼伦贝尔盟调查土地状况，途经哈尔滨时，欧阳钦同志正在黑龙江省作省委第一书记，得知我要来，他在百忙中亲自到火车站接我到省招待所，安排食、宿。还邀我去他家同他夫人黄葳一起吃了顿便饭。他的这种热爱同志的精神，令人非常感动。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欧阳钦同志在生活上、衣着上仍然和解放前一样，艰苦朴素，工作上更加谦虚，严格要求自己。在谈到当地工作进展情况时，总是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缺点很多，工作做得不好。从这里可以看出，欧阳钦同志是我党和人民一位坚强而有革命修养的领导者，虽死犹生。

回忆老成友龚逢春同志

龚逢春同志于1978年12月1日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距今十二年了。他的音容仍然萦绕在我们的脑际。逢春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坚强的革命老干部。无论在人民革命战争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他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从事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工作，工作中认真负责，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了半个世纪。

我们和他最早相识，是1933年7月21日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我党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率全体官兵，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在耀县举行起义的时候。当时逢春同志被陕西省委派到王泰吉起义部队中工作的。当起义部队进至三原辘轳坝地区，与进剿之敌遭遇失败后，余部转入照金革命根据地。为了统一领导当地各革命部队，集中力量打击消灭敌人，8月14日陕甘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不多时刘志丹同志由终南山返回照金任参谋长、继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下辖红四团、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为主力部队。那时，逢春同志在总指挥部及以后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任宣传鼓动科长。我们在一起生活、战斗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以后，我们虽然不在一块工作，但彼此的情况还是知道的。他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龚逢春同志是陕西城固县人，生于1908年3月。青年时期他就立志救国救民。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在陕西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便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在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下，他于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他的夙愿。当祖国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蹂躏，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际，他又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1932年初，

逢春同志受党组织派遣，在西北军杨虎城部五十一旅一〇二团（驻汉中南郑县）团部任中尉文书、干事做掩护，积极而慎重地做士兵工作。他主编了《奋斗》刊物，向官兵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由于该旅内部矛盾斗争，怀疑有共产党分子，逢春同志不便继续工作，于是他遵照党的指示，于5月间离开了五十一旅一〇二团。

以后，逢春同志通过在杨虎城警备第一旅旅部任职的同学关系，到该旅继续作士兵工作。1933年春，他趁为该部在洋县办小报的机会，办了个“新民周刊”，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多时，随警备第一旅辗转西安，并想方设法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同年夏，在陕西省委的指示下，毫不犹豫地脱离原来部队，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耀县王泰吉部抗日武装起义。这对于逢春同志这样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可贵的一步呀！

逢春同志参加革命武装部队后，身体有点瘦弱，而他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使人十分钦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在部队转战陕甘边南北，频繁的战斗、行军中，总是穿着一件国民党下级军官用过的黄呢子大衣，带个手枪，提个小墨桶，背着一大包文件材料，和战士一样步行，跋山涉水，很少见他骑马。有时掉队，我们就陪着他坚持走到宿营地，休息之后吃饭时，他又唱起了他喜好的秦腔，显得十分乐观。每当部队到达宿营地，或夺取一个城镇，他经常迅速地出现在主要街巷中，以其擅长的书法，书写革命的标语、口号，在群众中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称赞。后来，为了加强对部队和群众的宣传教育，调逢春同志到陕甘边区特委办了个刊物。当时，由于人员缺乏，他既是编辑又是通讯员，积极主动地搜集情况，编写的稿子短小精干，通俗易懂，又有哲理性，颇受战士、群众的欢迎。对于鼓舞部队士气，发动人民群众拥军、支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建立根据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随着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区域扩大的需要，逢春同志于1935年春被调任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政委，经常活动在庆阳、环县、合

水、赤安等地，配合其他革命武装或主力部队不断打击消灭敌人。由于他经受了以前火热的斗争和工作的锻炼，加之他又是一位平易近人、善于思考问题、团结同志的人。因而在这一期间，对于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改进游击队的思想作风和建立当地党、政组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逢春同志任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政委期间，正逢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到登峰造极。当时，一些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认为陕甘边区等地有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外进行肃反，并逮捕了刘志丹等党政军（部队连以上干部，地方县以上干部）大批革命干部，杀害了二百多名革命同志。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使一些革命同志和群众对红二十六军产生了怀疑，甚至个别地方在坏人借机煽动下，发生了叛乱，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陷入危机。

1935年9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区吴旗镇。龚逢春同志得悉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他率先迎见中央红军，并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言不讳地反映了陕北肃反以及肃反中把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同志逮捕入狱等严重情况，使毛主席、党中央对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情况有所了解，尤其是对陕北进行的肃反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毛主席当时就认为肃反是错误的。当中央红军进至甘泉下寺湾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与陕甘晋省委负责同志会面后，决定成立了以王首道为首，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参加的审查小组，负责调查肃反情况，迅速处理了这一问题。从而驱散了笼罩在陕甘、陕北军民头上的乌云，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

逢春同志在革命危急的关头，能够站在党的立场上，顾全大局，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为党中央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起了帮助作用。

以后不多时，逢春同志就调到赤安（保安）县任中心县委书记。在陕甘边区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同赤安等地的党员、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在对敌斗争、进行生产克服困难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936年夏曾任陕北省委宣传部长，“双十二”以后，随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逢春同志被派往国民党榆林地区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驻榆林特派员，进行统战工作。1937年冬后，任晋察冀区党委、晋绥分局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宣传部长等，做了许多艰苦抗战的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又再次相逢。逢春同志任晋绥分局党校校长。那时，正是晋绥分局延安整风、审干即将结束，他同党校干部一起住在兴县以西黄河沿岸的一个大村庄里。他的身体不如过去，在生活上仍力求同大家一样。而为了坚决执行党在抗战胜利后解放全中国的新任务，他一面加强干部的政治形势思想教育，一面抓紧为干部做结论，使在校的干部尽快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由于逢春同志长期经受革命斗争锻炼，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水平。因此，全国解放后，他曾在西南地区党政领导机关担任过好些重要职务和中央八届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把很大精力放在做党的教育工作方面。曾任中共西南局党校副校长、四川省委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党的教育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方针和路线。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逢春同志由于长期为革命工作，积劳成疾。去世前卧病在北京的北医三院时，我们去看他。当提及以往战争时代艰苦奋斗的革命情景时，他像无病似的，很是激动。对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为是非常正确的，衷心予以拥护；他总是关心党和国家的事，而对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诬陷、迫害的问题，则不愿谈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老干部的高尚品德和不计个人得失的宽阔胸怀！

（本篇作者为张邦英和张策。张策原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
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副书记）

难忘的黄罗斌战友

黄罗斌同志是我党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我的一位老战友。他曾在党政军，尤其是部队中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党和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虽然已经远离我们一年多了，而他的言行，他的业绩将永远为后人所尊敬。我这里仅就对他印象比较深刻、难忘的几件事情做点回忆，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黄罗斌同志 1916 年 12 月出生于陕西蒲城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 13 岁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家庭贫困，债务压迫，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与其兄黄罗武一起参加了渭北游击队，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兄弟为“大罗”、“小罗”。随后参加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团。1933 年 4 月间，跟随部队南下开辟新的渭华革命根据地。失败后，他不被当时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所吓倒，一个人坚决回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战斗。

我和黄罗斌同志是 1933 年 8 月初，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相识的。当时是杨虎城部队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同志率部在耀县起义时成立了耀县游击队，以后改为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我任党代表，独立行动了好几天进入了照金革命根据地。这时候正是他从南下失败回来的时候，彼此就相识了。不多时，我们三支队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二连，黄罗斌同志被任命为四十二师红三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成为部队骨干。从此我们即在刘志丹、王泰吉同志的领导下，转战陕甘边南北，打击消灭敌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在敌人的一次围剿中，我们两人并肩战斗在一起，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1934 年 4 月，当红四十二师在取得了西华池战斗的巨大胜利，继而又取得了淳化十里塬等战斗的胜利后，陕甘之敌动员马公章、冯钦哉的部队对红四十二师进行大围剿。在正宁五顷塬我军与敌人相遇。在阻击战中，我军被马公章的骑兵冲击分为三个部分。我同

黄罗斌，还有王伯栋同志带一部分骑兵，一方面整顿部队，鼓舞士气，一方面注意了解敌情，相机而行。在几天的行动中，仅和敌人进行了一次小的接触，胜利地在东华池与其他两支部队会合了。

1934年7月间，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同志带领陕北三支游击队，在闫家洼子与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同志会合，并在刘志丹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期间我调任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长。不多时，又调任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兼游击队总政委。黄罗斌同志担任了红三团政委。在谢子长同志的指挥下，与团长王泰吉同志一道带领红三团去陕北，在安定、清涧当地游击队、赤卫军的配合下，积极打击消灭敌人，取得了很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从此，我们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见面了。

当我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同志领导下，于1935年取得了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的胜利，解放了六个县城，继而又同红二十五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包括陕甘边区）的执行人，进行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许多同志，黄罗斌同志也是其中之一。他和在押同志受到了不白之冤，吃了很多苦头。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率中央红军到陕北及时予以制止，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时我正在陕甘边南区工作，肃反的时间推迟了一步，正在自上而下逮捕人的时候，恰好中央到达。否则，早已上了黑名单的我，也很难幸免。以往每次谈到此事，他总还是有些气愤，不免多说一些话。

全国解放后的1954年，对黄罗斌同志的一次工作调配上，我们两人想到了一起，不谋而合。当时国家正处在建设初期，经济战线需要大批比较年轻的干部。同时，这年的下半年，中央决定撤销全国六个大区。其干部除在本地区进行调整外，需要抽调出一部分去非经济战线上工作。此时我担任西北局组织部长，负责进行西北这方面的调配工作。当时适逢国家要在甘肃设立白银厂，急需一位主要负责人，我一下就想到了黄罗斌同志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不仅年轻，而且经

过战争锻炼，并且本人很希望从事这一工作。于是就很快地决定他担任白银厂的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四年艰苦奋斗，在一片沙漠山丘的不毛之地上建设起了一个现代化的白银厂。这是很不容易的，功劳很大。白银厂建立之初，我曾去甘、宁、青调查了解当地情况，路过白银厂还专门住了一个晚上，看到他们条件很差，生活非常艰苦，夜间点的是煤油灯。而在他离开白银厂的 1962 年困难时期，该厂因电供不上，一度停产。当时有关部门错误地认为，白银厂已经“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企业”了。并以此为名，把他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受了迫害。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损伤。直到 1978 年才给予平反，这是很不应该的。

黄罗斌同志能武又能文，他于 1988 年搜集整理了自己几十年来写的 300 多首诗词出版了一本诗集。这对于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仅说明他是很重视学习的，也是很有教养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一生中走过的具体革命道路，以及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艰苦的革命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开拓进取的思想境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黄罗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怀念拓夫老战友

贾拓夫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财经工作者。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 25 年了，而他的光辉形象，光辉业绩，将永留人间。为后人所敬仰，为我们这些老战友念念不忘。

我早在 1932 年夏，就闻拓夫其人。当时我在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准备到刘志丹、谢子长的革命部队中去，参加工农武装斗争。经党组织批准我返回家乡耀县，去中共渭北特委所在地三原接党的关系时，听说有个贾红光（拓夫的别名）在中共陕西省委、渭北特委工作。但只知其人，未见其面。

1933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拓夫冒着生命危险，经北平、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向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的情况。此后即留在中央苏区工作，1935 年 10 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回到陕北。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了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原陕甘边南区的基础上成立了关中特区，任命拓夫同志为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他是 1936 年春到职的。这时，我任该地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两人初次见面，如同故知，感到他很热情、亲切。闲谈中，他对我说，他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杜衡（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叛变后写的一篇《立在三民主义旗帜下》，文章中供出了 5 个县委书记，其中有我，问我是否知道？我很愕然！遂相互谈了各人过去的一点工作情况，谈得很融洽，很高兴。两人并一致表示对叛徒的愤恨。随后两三日即召开了全区干部会议，由拓夫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为了积极贯彻执行中央会议的精神，他亲自主持办了个《关中小报》，办得很出色，深受干部、群众的欢迎，对加强当地干部的宣传教育和对敌斗争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工作是很活跃的。如此，经过大家 5 个月的艰苦努力，工作有了进展。这时我中央红军

东征回师后，正在开始西征，中央命令关中特区主力部队和特区许多重要领导同志一同进行西征。为执行这一任务，以江华为司令员，贾拓夫为政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率关中红一、三团两个团，在东北军的严重“围剿”下，经与敌军进行短期周旋，胜利地转移至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不多时，部队遂另行改编，又调拓夫同志去三边特区任中共特委书记兼做内蒙工委工作，争取内蒙民族团结抗日。工作很有成效。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央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的需要，重建了中共陕西省委，调拓夫同志任省委书记。以后他调回延安工作，先后任中央西北工委委员、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兼秘书长、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我俩曾几次在一起工作，深悉他在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发展陕西和西北许多地区党的组织，以及恢复与发展西北地区的财政经济等方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贡献是很大的。全国解放后，1952年拓夫同志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央财委、国家计委、国务院四办等部门做领导工作，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了大量的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工作，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重大作用。我们多年在一起工作，深感拓夫同志为人热情、坦率，作风正派，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顾全大局，精明强干，很有才华。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得党的信任和干部、群众的爱戴。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拓夫同志被林彪、“四人帮”、康生等迫害致死，时年仅54岁，令人十分惋惜和悲愤！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伸张了正义，这对死者是很大的安慰，对生者是很大的教育。

今值拓夫同志去世25周年之时，我们深深怀念拓夫同志。我们要学习他那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深切怀念蔡子伟同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年是我的老战友蔡子伟同志诞辰 90 周年。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近 9 年的时间了，而他的为人、他的言行，尤其是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品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蔡子伟同志的音容笑貌还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闪现在我的眼帘里，历历在目。

蔡子伟同志 1908 年 6 月出生在陕西蓝田县一个农民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1927 年 8 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西蓝田、河南信阳、北平等地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934 年因他所在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由北平来到陕甘边苏区参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我和蔡子伟及其夫人高敏珍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相识的，并且见面时还分别同他们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插曲。1934 年 5 月间，我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五顷塬打了一次失利仗后，红三团与骑兵团分开行动，刘志丹同志随红三团东进。我当时任红三团二连政治指导员。当部队进入保安县境途中，因为才下过雨，道路泥泞，部队行军非常困难。走着走着，我骑的马突然滑倒，将我摔下来。当我很快从地上起身，准备继续前进时，抬头看见一位好像从白区新来的知识分子，随即意识到这一定是已经听说、但还未见过面，刚从北平来到边区工作正在随军行动的蔡子伟同志。连忙同他打了个招呼，就匆匆地走开了。同年在我调任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政委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后的 11 月间，我带着中宜、富洛游击队去淳化、旬邑地区检查工作并相继打击对根据地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反动民团，当部队进至旬邑县境在一个山坡上休息的时候，又巧遇了来边区根据地的高敏珍和另外一位矮个的男同志。高敏珍同志也是刚从北平来，身穿旗袍，一副学生打扮，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当我得

知她是蔡子伟同志的夫人时，心情格外兴奋，为了鼓舞士气，我特意让她给部队讲几句话。高敏珍同志十分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你们要好好打仗，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可以住洋房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用机器种地，飞机还可以下雨……”战士们为她热情洋溢、充满革命激情的话语所鼓舞，响起了一阵掌声。然后，我派人将她们护送去当时南梁陕甘边领导机关所在地，仍带队伍继续向预定地区前进。这样两次皆在行军途中同子伟同志夫妇初相见的情景，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是难以忘怀的。

蔡子伟同志到边区后，随军行动不多时，即担任了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兼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在恢复陕甘边区中心区的集市贸易、创办列宁小学、编写文化课本、扫除文盲及至发行边区货币、活跃经济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苏维埃政权建设以及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5年9月，蔡子伟同志在王明“左”倾路线在西北地区的执行者的错误肃反中，同刘志丹等一批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一道遭到无情打击，被诬陷为“受张慕陶指使，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并被施以向鼻中灌辣椒水、吊到空中毒打等各种刑罚，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挽救了陕北革命危机，也使蔡子伟同志得以重新工作。同年底，蔡子伟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秘书长，后又担任代理部长，协助毛泽民同志为发展边区经济和改善军民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蔡子伟同志创办了陕甘宁边区中学并担任了第一任校长。他克服困难积极工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

1939年秋，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陷害，使蔡子伟同志再次蒙受不白之冤，同夫人高敏珍同志（一直在陕甘宁边区、中央妇委工作，当时任边区妇委会委员、组织部长，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女参议员）一起身陷囹圄长达五年之久，他被认为是“久已混入党内的奸细，因此决定永远开除党籍，并交政府处以极刑”。他尽管身处逆境，却

始终对党忠贞不渝。直到 1944 年，边区保安处经过多方查证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做出了“蔡子伟不是特务分子”的书面甄别结论，才予以释放。当时蔡畅同志陪同高敏珍同志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对高敏珍说：“我们没有经验，上了敌人的当，你们受苦了。”毛主席的这句话，对蔡子伟同志也是一个安慰，使他非常感动，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从事党分配的工作。1946 年任延安大学高中部主任，继续从事培养干部的工作。

我虽然自 1936 年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边区、西北局工作和学习，尽管我们之间比较熟悉，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见面的机会却很少。1948 年 4 月延安收复后不多时，中央调我任中共西北局秘书长，此时蔡子伟同志已在西北局任办公厅秘书处长。两人一见面，都很高兴，一起在西北局工作了段时间。当时正处于西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地区进军，西北局的任务很重，工作很忙。蔡子伟同志作为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长，责任心很强，工作也很努力，总是力争尽快完成领导上交给的任务。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同年 12 月，中央调我去陕南任中共陕南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临走的时候我还和蔡子伟同志一起在西北局驻地王家坪的一所窑洞前合影留念，以后就没有在一起工作了。

全国解放以后，蔡子伟同志长期在农林部门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虚心钻研有关农业政策和畜牧科学，主持编纂和撰写了大量的农业经济和畜牧科学的理论文章和专著，为我国农林事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普及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记得 1986 年我任中顾委委员期间，去甘肃定西、会宁干旱贫穷地区调查了解当地政府怎样鼓励农民种草、植树造林，搞梯田、防止水土流失，增产增收改变贫穷面貌时，曾听说蔡子伟带了几位同志在当地走了好几个乡镇，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研究，刚走了不多时。这说明子伟同志是很重视调查研究、切实做好工作的。蔡子伟同志还

是中共八大的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蔡子伟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他一生光明磊落，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对党和人民襟怀坦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计荣辱、矢志不渝、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立党为公、严于律己、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令人钦佩。在我和他相识的几十年当中，从没有听他讲过有关个人的恩怨得失，即使是在受到错误关押、历尽磨难，甚至面临生死考验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是很难得的。正因为他以往从不提及上情，因而在其受害的情节上，我一直是很模糊的。直至今年夏，当和其子女谈到子伟同志过去的历史时，才知道的比较清楚了。他一贯勤奋学习、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而且严格要求子女，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作一个普通劳动者。

值此纪念蔡子伟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就是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学习他对党赤胆忠心和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对于启迪后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有益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 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到现在已整整的三十周年了。党的三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斗争史，也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获得辉煌胜利的斗争史。

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算起，到现在已经一百一十多年了。在这百余年中，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与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但在开始的前八十年中，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虽然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一直没有取得胜利，人民的政治地位毫无改变，全国人民依然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在这种压迫剥削下陷入饥寒交迫、贫穷破产、流离失所的境地。自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全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以蒋介石匪帮为其最后代表的反动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消灭了或正在普遍彻底消灭着封建占有的土地剥削制度，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自己国家政权，从此使几千年的封建压迫，百余年的帝国主义压迫与数十年的官僚资本压迫下所造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灾难重重的旧中国宣告结束，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其三十年的伟大而艰苦的斗争中，曾经经历与领导了伟大的四个革命时期。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及其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了争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阵线，与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先后领导了京汉、上海、青岛、天津、广州等地工人反帝大罢工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举行暴动，取得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拥护，并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人的英勇前进，打败了北洋军阀，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背叛革命，使国共分裂，大革命遭受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革命利益，批判了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继续领导人民进行了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举行了震动全国的“八一”南昌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创造了许多苏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的“围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华北危急，共产党为了挽救这种局势，于1934年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相继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动修改了苏区的某些政策，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逼迫下，停止了内战，又与共产党实行合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中国工农红军改成为八路军，进入华北抗日前线，进行了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了许多胜利。但国民党却暗中与日寇勾结，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制止了国民党的投降危险，最后在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的有利形势下，举行了大反攻，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寇投降后，中共为恢复人民在战争中的创伤，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为实现和平而努力，但国民党为了独吞人民八年流血苦战得来的胜利果实，企图恢复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动统治。不仅在其占领区残酷的镇压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了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又领

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从 1946 年以来的解放战争，消灭了由美帝直接武装的八百余万国民党匪军，完成了除台湾以外的全国的统一，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我们的力量是在和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进行长期、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中，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渐壮大起来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一个久经考验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政党，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所一致信赖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所一致拥护的执政党。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多次的农民起义的结果，不是被封建势力扑灭，便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贵族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曾多次领导过革命，从康、梁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都遭受了失败，而当中国革命一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就使中国的革命面目为之一新，逐渐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就拿新疆来说，当盛世才尚未公开叛变时，其所以能提出六大主张而轰动一时，给新疆人民做了一些有益事情，获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代表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的领导与许多共产党员的努力，是绝无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它不仅是
中国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而且它代表了中国各民族与人民的利益，它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因此它能够获得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就是我们的党所以能够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所具有的无穷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除了我们有一个党所领导的军队与我们党领导的一个各革命阶层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外，特别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这个党它是有纪律的，它以无产阶级的纪律保持自己队伍的意志统一，行动统一。这个党是以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及阶级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判明局势，它能预察事变的进程和掌握运动

发展的规律，正确的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这个党是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它能站在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以公开的、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经常的检讨自己的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并及时的予以纠正，使我们党能够不断地获得前进，这是其他任何政党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它能够倾听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的迫切要求，经常地紧密地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巩固的联系。这个党有着自己近三十年来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迅速地走向胜利。

中国人民在百余年的斗争中，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才能拯救千百万劳苦大众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并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新中国。

为进一步巩固与壮大党的组织而奋斗

我们的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经过近三十年伟大的革命斗争，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始了伟大的建设工作。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巩固与壮大，又是决定中国人民今后继续走向胜利的保证。

从我们党领导全国革命所获得的光辉成就来看，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的和肯定了的一方面，决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但从全党今天的状况来看，除了上面肯定了的主要的一方面外，在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和一些党员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优秀的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大量的党员，但是有一部分党员是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或有较严重的毛病或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另外一部分则是觉悟不高和群众差不多的不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人。甚至有些党的组织中混进了极少数的政治面貌不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

表现了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新疆地方党的组织虽极为薄弱，党员很少，然而上述情况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些党员虽然在我们党内占着极少数，然而却严重地损害了党与人民的利益。

为什么会造成党内的这种情况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在过去对于接收党员的工作没有实行严格的控制与检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原则未能很好的掌握，致使过去接收党员的工作在某些地区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自流的状态。在吸收党员入党时，降低了党员的标准，未能履行严格的入党手续，某些地方存在着吸收进来再教育等错误想法，致使一些落后分子、假积极分子、投机分子与阶级异己分子，乘机混入党内，他们企图获得党员的荣誉、地位，保护其财产，谋取个人利益，而那些暗害分子则企图长期潜伏，窃取党的秘密，进行暗害活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党的教育不够，对吸收进来的新党员没有加以有系统的教育提高，致使许多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甚至落后于群众。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党虽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但距离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却还很远，正如毛主席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现在已完成的任务是小的，将来未完成的任务是大的”。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而奋斗，而且要为最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而伟大的。同时还须看到当前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安全，隐藏在各地的反革命间谍分子仍在进行破坏活动。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长期而艰巨的各种建设事业正强迫我们去做。这就要求我们坚决克服今天的党内存在着的许多缺点，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原则与党纲党章的规定，对党来一次认真的很好的审查整顿，以保持无产阶级党的纯洁性与更进一步增强党的战斗力！

整党的主要目的，在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所有共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以便继续提高到些好的党员，发现与清除混入党内的不良分子，对于不够条件或不具备标准的

党员，加以教育、改造、提高。因此在整党中，必须采取严肃而谨慎的态度，首先清除混入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有内奸嫌疑的分子，在重要情节上隐瞒、欺骗党的不忠实分子，屡次违反党的政策与人民政府法令，并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或用恶劣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以及严重的堕落腐化而不能改正的分子。对于那些不够标准的党员，我们党应该是满腔热情的、耐心的并用充分的时间去教育改造与提高他们，以便使他们能够获得改造与提高的机会。经过多次教育忍耐等待仍不够条件时，则应最后请他退党。总之，对不够条件的党员绝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去处理。

发展党的组织，接收新党员入党是党的经常工作，是我党对劳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长期而有效的思想教育和考察工作的结果，特别是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的地区，是今后长期而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必须在中央及中央局的严格控制下，采取谨慎的方针，个别的吸收合乎党员标准的分子入党。这里必须指出，由于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掌握了全国政权，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在这种情形下，过去对革命抱有怀疑的，怕变天的，怕危险的，不愿加入我党的那些人们，他们看到今天的现实情况，但又抱着各种不同的动机与想法，竭力企图加入我们党的组织，以遂其个人欲望。因此我们就必须严格的按照党纲党章的规定办事。今后接收的新党员必须是工人和劳动人民中最优秀的人物，都应当是经过考察，经过教育，成分好，觉悟高，历史清楚，对党忠实，愿终身为党的事业奋斗并能够遵守党的纪律的人物。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必须是抛弃了剥削阶级的观点和作风，并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人。为此，除了在群众斗争中，通过党的支部，通过党所领导的人民团体，进行一般的政治教育与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外，应系统地进行党纲党章的宣传教育工作与考察工作，经过一定时间的教育，并在教育中加以认真的考察，其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切实提高到党员水平时，然后才能按照入党手续吸收入党，务使入党者真正能起到党员应有的作用。在我们新疆虽然很多地方还没有党的组织，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只能在城市产业工人及经过一定时期考验的

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按照上述要求标准，适当的个别的发展一些外，而广大农牧区目前只能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提高群众觉悟，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团员。普遍发展党的组织一般均应放在发动群众完成土改后，并经过一定时期的党的宣传教育，然后再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

我们新疆是一个在过去长期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与才解放不久的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除了关内来的某些党员中还存在着一些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残余与缺乏长期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打算外，在当地民族中的一部分新党员，觉悟不高，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与阶级立场，看不到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上，缺乏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因而常常做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大土耳其主义的尾巴。因此在党员中经常的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加强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经常地严肃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及时的克服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是十分必要的。既要经常的克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更要克服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倾向，以增强党的团结。在这里工作的汉族干部中的共产党员，首先应把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当作党员的义务，而本地少数民族中的共产党员，也应把反对本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当作共产党员的义务，否则就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今后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时，除了一般的条件外，还必须具备这样一条：这就是必须要反对本民族中的民族主义与封建反动势力，坚持与汉族干部合作，反对民族分裂。因为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国际主义——是相互敌对而不可调和的。

只有进一步巩固与壮大党的组织，提高每个党员的政治质量，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巩固党与各族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今后新的更伟大的历史任务。

继续开展三大运动，做好群众工作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今天正在运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势力，消灭封建，解放农村生产力，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的三大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继续发展，也是巩固已得胜利并使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三大斗争任务，我们新疆的党应团结全疆各族人民群众，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努力。

新疆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开展以来，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与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激发了各民族各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增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对我们的各项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经过志愿军归国代表来新疆的报告，与“五一”各地举行了游行示威，发动了和平签名运动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投票运动，已使全疆的抗美援朝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日益走向普及和深入，好多地方群众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自发的进行了捐献。为了加强国防，增加生产，更有效的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取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人民普遍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与作好优抚工作。这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动员全疆各族各界人民响应这一号召，结合各地具体情况与当前生产、学习、工作等任务，普遍订立各地区、各行业、各机关团体的爱国公约及个人计划，在增产与适当节约的基础上，并根据自觉自愿的原则，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经常而切实地做好优待烈属、军属与优待残废军人的工作。总之，抗美援朝运动已经成为我们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教育，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各地党委必须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紧密地结合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使之成为一个经常的持久的运动，直到最后胜利为止。

为了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与

帝国主义的间谍分子，为了统治新疆各族人民，挑拨各族人民的团结，曾在各族人民内部建立许多反革命组织。在新疆和平解放以后，这些反革命分子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大土耳其主义者，纠合当地封建恶霸与反革命残余势力，继续危害人民生命财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挑拨民族团结，并千方百计阻挠各族劳动人民的翻身运动。这些反革命分子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最近一个期间，曾经大张旗鼓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获得了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宽大无边的错误思想开始得到纠正。但运动发展很不平衡，好些地方根本未动。各地必须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方针，结合当前生产与今后减租反霸的任务，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发动广大群众检举隐藏在各地的反革命分子，做到家喻户晓，各族上层民主分子皆知。并须做到处置恰当，罪有应得，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屈一个好人，把镇压反革命变为各族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使反革命分子身无所藏、技无所施。

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霸运动，这是彻底消灭封建，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步骤。新疆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经作了决议，新疆分局已经向各地党委发布了指示，确定在全疆九个分区五十八个县约近四百万人口的农业区域内，普遍开展减租反霸与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是全疆党政军民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

我们必须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不但在历史上长期受着反动统治阶级及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而且受着当地民族内部的地主、恶霸封建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这些地主封建阶级，不仅依靠其占有的大量土地对农民实行着高租额与无偿劳动的超经济剥削，而且有些地区的地主至今仍采取古代奴隶式与中世纪农奴式的手段，压榨着无数的劳动人民，使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新疆解放以来，我党政军民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团结了各兄弟民族，进行了剿匪、生产、合理负担、抗美援朝等许多工作，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群众觉悟相当提高，提拔与培养出一批本地的民族干部，

我党我军取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信任，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普遍组织起来，打倒恶霸地主封建势力，开展减租反霸的翻身斗争。我们适时的颁发了发动群众减租反霸的指示，不仅完全适合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也符合共同纲领的精神。

减租反霸乃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与震动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我们必须很好的掌握政策，运用策略，贯彻群众路线大胆放手的充分发动群众，紧紧地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联合一切赞成反封建的人们，组成一条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恶霸、不法地主与反革命分子，把敌人孤立到最大限度，将打击面限制在最小范围，使劳动人民得以在经济上获得利益，在政治上树立自己的优势力量，为下一步土地改革铺平道路。我们应当明确认识，不大胆放手，群众就不能充分的发动与组织起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不能形成；只大胆放手，忽视了掌握政策与运用策略，就会使运动走弯路，造成不良后果，两者应密切结合而不可偏废。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各级党与人民政府必须抓住中心，分清工作缓急，摆脱事务主义的圈子，下定决心，抽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去参加与领导这一工作。所有党政军民的干部与共产党员，都要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踊跃参加这一运动，这对于每个干部特别是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及留用人员，是提高政治觉悟、培养群众作风、树立群众观点的最好学校，也是锻炼与考验自己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所有的下乡同志，以愉快的心情接受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员更要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遵守下乡纪律，坚持到底，为新疆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翻身事业而努力奋斗！